雄·汉武大帝新传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何新 著

何新是名振中外的著名学者，
其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方面的
研究早已素为人知。
他在中华古典文化方面的研究，
更为独树一帜。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收入近二十年来
何新研究古学的全部重要著作。
何新认为：中华乃是"日华"、贵胄。
惊世之论，石破天惊。
欲寻民族文化之根者，
不可不读这一套千古奇书！



时事出版社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雄·汉武大帝新传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雄:汉武大帝新传/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雄… Ⅱ.何… Ⅲ.汉武帝(前156~前87)-人物研究 Ⅳ.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4507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88547595
传　　真:(010)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本书印张:13.75　本书字数:240千字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236.5　全套书总字数:4100千字
全套定价:680元(15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

本书对汉武帝一朝政治史事中若干历来难解之疑谜给予了解析。58集电视剧《汉武大帝》，是作者授权江奇涛先生使用作者这些研究成果根据《史记》及《汉书》，构思创作的。

本书诸篇初稿都曾在《深圳特区报》"何新读史札记"及《香港商报》"何新异论"两专栏发表过。原曾收入《圣与雄》* 一书。此次新版，作者修订了一些讹误，并补充了一批新的史料。是为序。

何 新

2004年10月12日记于京

---

* 北京金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毛泽东论汉武帝

“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毛泽东1957年6月17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目录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 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 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

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 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 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 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 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 岁从政,33 岁早逝。生前曾多次向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①] 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

①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

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 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拔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 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

人。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是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

董仲舒与武帝之元光决策

1

中国秦汉时代,发生了两件对此后二千年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的建立。二是汉武帝确立儒家政治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项措施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背景和原因何在,历来一直没有讲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五月,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再次诏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年,他作出了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将亲姊妹隆虑公主远嫁匈奴的同时,汉武帝也作出了准备大举反击匈奴的决定。在这一年夏,他派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率军屯驻云中、雁门,准备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在内政上,则锐意发动一场新的改革。史称这一系列新政为“元光决策”。

而从理论上和战略上为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董仲舒。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自从受命登上帝位以来,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觉。“今朕获承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任大守重,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莫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由此可见,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2

刘彻对董仲舒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

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建议进行意识形态改革,确立以儒家的政治和历史思想作为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建立一套考试选贤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历来论者多将董仲舒看作“地主阶级思想家”。而我则以为未必然。董仲舒反对豪民兼并土地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依附于国家土地的自耕小农的利益。《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上武帝书云:“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罪徒)充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他的建议是,必须抑制豪强与豪商兼并田地。“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业僮仆,皆入之于官。”“以塞兼并之路”。

我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庶民知识分子(士)的政治思想代表。而汉武帝出于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的需要,也有意要扶植从庶民中出身的一个“士”阶层,以他们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用以贬抑和削弱横行不法的诸侯贵族、大地主(豪强)和大商人。其政策倾向也具有庶民政治的明显色彩。

3

天人关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过去一直被指责为“神学目的论”。其实，天人感应论是一套约束皇帝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权理论。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与否，体现了帝王政德的好坏。政德坏则导致滥刑，酷刑生成冤厉之气，影响天象。天象以灾异示警，警诫帝王必须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无效，即会导致天命的改变，导致王朝的灭亡。此学说之流弊是西汉后期盛行的谶纬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无上威权。

这一理论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大臣经常以“天象示警”的灾异理论对帝王进行告诫。表明这个理论工具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

汉武帝重视董仲舒的对策，基本采纳了其全部建议。但是对董仲舒其人，刘彻却并没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欢这一套“天人”理论。

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窃其讲稿报告刘彻。刘彻阅后以妄言诽谤罪将其下狱，几乎杀头。

但数年后，淮南王与田蚡政变的密谋暴露，证明董仲舒对田蚡的指责是对的。武帝表示歉疚，又派董仲舒的两位学生根据《春秋》经义审治刘安之案。董仲舒一生梗直，始终是一个直言快语不识时务、认为原则比现实更重要的迂夫子。

董仲舒是孔子以后，自秦汉至清代二千年间，对中国政治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西汉学者刘向指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刘歆亦云：“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但是，在现代，他所受到的误解似乎也最多，至今仍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焚书坑儒及秦汉之际意识形态转型

1

战国之际社会激烈动变，庶民议政，百家蜂起。春秋时代，政治中之主要矛盾启因于贵族政治。王权泯丧，政入私门，“陪臣执国命。”各国遂分裂为政，战乱频仍。战乱动变中形成新的强势轴心国，即所谓“五霸”，竞争导致七雄兴起。

新兴政治力量为巩固政权，皆积极吸纳社会人才及智力资源。

春秋后期，孔子聚徒讲学，成为一代“素王”。孔子死后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援引子夏众弟子参政，改革政治，形成魏之“西河学派”。[①]继之齐威宣王建稷下学宫，燕昭王建黄金台，秦国亦设博士官招揽关东人才。[②]

博士制度与齐国稷下的学宫制度，都是由国家奉养学者的制度。当时各国贵族有招客养士风气，但养士者多非国家，而为私门贵族。

先秦学术一主于史官，一主于博士官。史官自商、周以来有之，此乃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之旧传。

博士官则自战国始设，盖相应于平民社会自由学术之兴起。诸子百家既盛，乃始有博士官之创建。博士官与史官分立，即古者“王官学”与后世“百家言”相对峙一征象也。

春秋之际，孔子以首兴私学知名，[③]传授先周之国家经典即六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百家之学，多源出于孔子之门徒，其学则变异出于六经。传六经者，则为孔

---

①西河地在卫、齐、魏交界处，非秦魏交界之西河。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续志：“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博士亦称弼士，博，博通诸学；弼，辅弼天子也。孟子云：“外无强敌外患，内无法家弼士，国恒亡。”

③实际当时邓、析、少正卯皆亦有私学。

子及其弟子。故诸生皆尊孔子为祖。

《汉书》艺文志以六艺与诸子分类，六艺皆古学，其先掌于史官。诸子则百家学，乃战国以来诸子自创之学。战国博士立官源本九流百家，然《汉志》则列儒家为九流百家之冠，诸子学则不列于六艺。

2

荀子乃子夏三传弟子。青年时曾主持稷下学宫。秦昭王时，荀子曾访秦。其后，其弟子李斯及韩非见重于秦王嬴政。秦王嬴政始则尊儒，用儒生为博士。灭六国后则轻儒，以至焚书坑儒。其间转变之奥秘，历来说不清楚。

秦始皇早年好学，对儒学中尚法术一派，颇为尊礼。战国法家之学，本与儒家共源。子夏西河讲学，魏文侯、李悝、吴起俱曾出入子夏门下，商鞅则为李悝弟子。晚期荀子倡导礼法，是儒门中之法势一派，其学亦出于子夏之门弟子。故荀子曾入秦讲学，其弟子韩非、李斯皆得嬴政之重用，是为证。然儒学非仅荀子一端，其所遭禁灭者，乃诸儒异端也。

3

焚书与坑儒，实乃秦始皇整饬意识形态之运动，所针对者，一为儒者以古制非议新法。一为儒生民间议政，批评秦之政令，所谓“处士横议”。其事盖分两阶段：

初，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为寿。（何按：寿古音铸通祝。）仆射周青臣进颂曰：“陛下神灵，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自上古不及。”始皇悦。

博士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愿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非忠臣。”始皇下其议。

丞相李斯奏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然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事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事，何足法？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奢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羽)成乎下。禁之便。”

此乃李斯建言首倡为适应君主专权而统控意识形态之理论。上古及三代本有庶民或贵族议政之传统。《尸子君治》篇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殷人曰阳宫，周人曰明堂。"曰："尧立诽谤之术。"《管子·桓公》亦言："黄帝立明台之议，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不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评谣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五有灵台之复，贤者进也。"《吕氏春秋·自知篇》亦言："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术。"孔子之后，百家蜂起，战国之际，处士横议。此自由议政之传统，至此而中断。

4

李斯原为荀卿弟子。先倡议废除周代封建制，于中国建立郡县行政区，其治权统一于中央而开秦大一统帝国之局。

由于李斯上议主张禁民间议政，由政治专制转向箝制舆论之思想专制。其具体措施，则为"禁私学"、"焚百家言书"及禁民间"偶语"议政也。秦始皇以李斯之议为可，遂由此发生焚百家书之运动。

焚书办法，李斯上议曰：

"臣请：

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即烧毁除秦史之外的诸国历史记载。烧毁除国家博士官署所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

李斯除请焚书外，又拟定控制思想及言论之法：

"一、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三、令下三十日不烧书，黥为城旦。

四、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准许民间藏用)

五、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禁闭私学传授法术)

此即秦廷管制意识形态及学术之禁令。其最要者三:(1) 三十日不烧私家藏书者,黥为城旦(官奴隶)。(2)以古非今,其罪"灭族"。(3)"偶语诗书",杀戮弃市。

5

至焚书令下后又过一年,乃发生坑儒之事。事变起因,则为方士欺骗秦始皇。

秦皇欲求长生术,一度广招列国方士。方士侯、卢两生,为始皇求仙药。方药炼制无效,二生恐惧,亡去。

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炼求奇药。今闻韩夫去不报,徐市(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间)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悉案部(捕)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告之以惧。余众后复发谪徙边。

秦始皇由惩罚方士而祸延儒生。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始皇不听。

于是,将有犯禁之言的诸儒悉坑之,其罪名二:

一曰"诽谤今上。"

二曰"兴妖言以乱黔首"。

而所坑之诸生,悉乃"文学方术之士"。

所谓术士,即胥士(儒士),即学士也,[①]亦即当时之知识分子。然诸生所操之学术乃百家之学,非后世所专言之儒学也。

6

意识形态之争论,往往牵连政治。儒生反秦,陈涉起兵,有孔子后裔抱《诗》《书》从军。刘邦军中,儒者亦不少。

---

①《说文》:"儒,术士也。"术、需、胥、学古音转通,士、需(儒)士、胥士、学士,皆同源异文之名词也。

然而，汉立国之初，刘邦与儒者颇为疏远。刘邦本起于市井无赖之徒，不学无文。楚汉相争之际，恶见著儒服者，以儒生为无用之辈，甚且抛儒冠而溺之。

得天下后，刘邦方意识到礼制德教之重要，乃命叔孙通与鲁儒生为订朝仪，朝纲制度赖以建立。其后，高祖过曲阜乃以太牢祀孔子，此为历代帝王尊孔之始。

高祖死后，惠帝主政日浅。文帝表面推行黄老，实际已欲行儒家政治，故重用师出儒门之贾谊及晁错。以晁错为太子师傅。贾谊、晁错皆尝从学今文《尚书》于伏生。伏生者，汉初一隐逸民间之高人而堪称两代帝王(景、武二帝)师之师也。

景帝即位后，从晁错之议用贾谊昔日建议于文帝之"治安策"，欲削藩国而集权于中央，引出七国叛乱，一度分崩离析，有割据之忧。

乱平之后，景帝重用儒士卫绾为丞相。刘彻未立为太子前，窦太后欲立梁王为君，景帝乃命袁盎往说太后，袁盎援引《春秋》公羊经义而阻太后。①

窦太后好黄老之术，不喜儒学。命景帝会集儒生与黄老之士论辩，儒生博士辕固雄辩力折黄老诸生。。

太后召见辕固。辕固自以治诗书，乃古者王官之学，而轻鄙老子，谓其乃晚出家人之言，太后怒，欲杀辕固，景帝救之。[《汉书》儒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博士辕固生问《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大怒曰：'安所得司空城旦书乎！'(秦法，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汉以司空(官奴隶)主罪人，贾谊云"输诸司空"是也。)乃使固入圈击彘。景帝知固直言无罪，而为太后怒，乃假固利兵。彘应手而倒，固得无死。"]

由是之后，景帝更重儒学，以与辕固出同门之儒士赵绾、王臧等为太子属官置储君左右。②

武帝继位，乃重用卫绾、王臧、赵绾等儒门人士，延请鲁儒申公。又接受治公羊《春秋》之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学为官学，为"五经"立博士，从此而儒学得以大兴也。

---

①"家人言"即对王官之学而说，犹云民间私家言耳。杨雄"博士箴"云："诗书是泯，家言是守。"以"诗书"、"家言"对文，正犹《七略》、《艺文志》以王官六艺之学与九流十家对列也。

田《世家》："齐侯废为家人"，"家人"即"庶人"也。家人言，亦即谓"平民私家"之言。秦博士鲍白令对始皇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家"对文，官言其公，家言其私。

崔浩引袁生语："老子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锺繇以《左氏》为"太官"而公羊为"卖饼家"，此皆尊官学，蔑家言，与辕固意相似。

②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外交官(大行人)必学《诗》。故学《诗》亦为仕宦之途。

今古文经学分野与汉初政治斗争

（今文经学之兴起）

经学今古文两大学派的兴起及纷争，乃汉代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至为深远。但其由来及始因则一直论述不明。

今古文之争一直被认为由于经书书写文字（小篆及隶书）之不同，造成经书内容的理解歧义而导致的学术纷争。

汉代的今、古之争，实际是关系到政治理念的意识形态之争。廖平曾指出，古文的根据是“周礼”，今文的根据是“礼记”中的“王治”，由此引申出对于政治制度及礼教和一系列政策的理解不同。学术文字之争，只是工具而已。

1

今文学术，西汉时盖分五脉。《书》学尚法术本荀韩之义。《易》学主预兆谶纬天人之学。《春秋》学主授“公羊”一派讲“大一统”之法。《诗》学则主微言大义以诗为伦理设教。

而考其源流，则实出一脉，即齐儒伏生及浮丘伯之学。伏生尝为秦始皇博士。焚书坑儒，伏生归家，而仍秘藏《诗》、《书》。

汉初，伏生已年九十余，于济南传授《尚书》，贾谊、晁错俱出其门。[①]鲁儒申培公亦尝从伏生游。

申公名培，鲁人，少与楚元王刘交同受《诗》齐人浮邱伯，故其所传称“鲁诗”。汉时《诗》说分四家，“鲁”、“齐”、“韩”、“毛”也。“鲁”、“齐”、“韩”皆为今文学，唯“毛诗”为古文学，晚出[②]文帝时申公尝为博士，武帝为太子时，景帝为其所择师傅王臧、赵绾

①“教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诏以为太子合人，由大夫、迁博士。”后又拜为太子家令，人号太子“智囊”。汉初儒士兼学法术。晁错早年学申商刑名于儒生张恢。晁错自负病况“术数”。术数者，张晏曰：“刑名也，” 曰：“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汉书》师古注）。

②三家诗皆自称出于子夏。

皆申培公弟子。

武帝立，以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极信用。齐学鲁学乃见重一时。①

武帝欲立明堂，不明古制，乃遣使束帛加璧，安车蒲轮以迎申公。授为太中大夫，议明堂事。

申公家居设教，远近争赴其门，辗转相传。其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跻显官者亦不乏人。

2

景帝时，辕固为博士。窦太后好《老子》，召辕固论学，固曰："《老》学乃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辕固入圈刺豕。帝知辕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矢。固刺豕，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此儒道两家斗争之一趣史也。

武帝即位，时固已九十余，公孙弘被征，严事固，固谓之曰："务正学以言，毋曲学以阿世！"盖弘颇为趋合，固因警之。

汉初新兴儒学，其源实本于荀子之学。荀子曾入齐主持稷下学宫为祭酒，齐人颇受其学。唯齐稷下学中又有邹衍神秘主义一派，恢奇驳杂，好言灾异。武帝亦好此术，固之武帝时代之新兴儒家大兴其术。董仲舒袭墨子"天志"思想，大言天人交感。

汉初之儒学颇杂阴阳异学，后来演为京房一派易门谶讳之学。

3

学术为政治服务，政治助学术发展，经今文派之在西汉，所以能如日中天者，以其适合政治之需要也。

伏氏《尚书》及公羊《春秋》乃今文经学主要典籍。伏生《尚书》始传自济南伏胜，其高足最著名者即为贾谊、晁错。

---

①《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即《鲁故》二十五卷），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三家皆立于学官。"

申公弟子中，以辕固、瑕丘江公及王臧、赵绾为最著名。

文帝时，贾谊为太中大夫。刘歆曾说：在汉文帝时"在汉朝之儒，贾生而已。"后来文帝使"掌故"（官名）晁错亦从伏生受学《尚书》。《尚书》初出于壁中，竹简朽折散绝。字皆已不可识，伏生以口传授之，而晁错记之以汉隶，带回藏于中秘，成为学者之范本。

故汉初《尚书》之学，实乃本于伏氏及晁错传授之学也。晁错学成后，文帝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及太子令，传授《尚书》中之帝王术数于太子，太子后即汉景帝也。伏生传《尚书》，特重洪范五行，亦为后儒言五行灾异之祖。

4

景帝时，窦太后欲立景帝胞弟梁王为嗣，袁盎乃以《公羊春秋》经义挫太后兄终弟及之议。景帝由是立刘彻为太子，继位为武帝。

武帝登基后，所重用之大儒董仲舒及公孙弘，皆以治公羊《春秋》学知名于时，而公羊学术遂成武帝一朝佐治之工具。

汉初匈奴久为边患，前有高帝白登之围，后有单于谩骂吕后之辱，武帝闻《公羊》经师阐述"大一统"、"复九世仇"及"尊王攘夷"诸义，正触动武帝心事。元光后武帝挞伐匈奴，攘夷拓边，中国疆域赖以粗定。

公孙弘、张汤皆以《公羊春秋》为律典，据其义例而折狱。清儒唐晏《两汉之国学案》云：西汉时，"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公羊说）为断。"

武帝崇儒术，立五经博士，广设弟子员，建立学官作为取士选官吏之途。《尚书》以伏氏，晁错所传今文学为本。《春秋》在战国荀子、公羊氏所授之今文学为本。《诗》则取鲁、韩、齐三家诗说。公孙弘治《春秋》杂说，以布衣而为丞相，封平津侯，创白衣晋公卿之局。

5

今文学派见重于武帝朝，但其本源，则始出于文帝之世，又见重于景帝一朝。

今文家喜言所谓"微言大义"，微言，"隐微不显之言"也（《汉书》注引李奇说）。孔子修订《六经》，据说事秘旨奥者皆亲口授弟子，师徒单传，不轻易著之竹帛。故说经者须标其所自，远溯尼山，以足取信，是谓"独门师承"。所谓"微言大义"，正可为后儒

之迎合时主自由发挥提供广阔天地。

《汉书·艺文志》:“《春秋》所贬损大人当时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事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大义本于微言,即其旨而引申之。《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今文经学,蒙文通说是平民之学,有庶民参政和革命的意义。如周人创立封建世卿之治,旨在维持贵族世袭统治。故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又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而公羊《春秋》讥世卿,主张“大一统”,倡言削贵族而张王权。以君主专制抑制诸侯擅权,以加强王权抑裁私门,正是针对春秋贵族、世卿及家臣主政之乱局。

尊王攘夷之义倡于孔子,传于子夏,成为后期法家之主要宗旨。经荀子传于韩非、李斯,而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制度所全面实行。汉初之公羊学,受之子夏、荀子,正亦本于此义。故为汉武帝欣赏。

6

武帝时代,儒学与前世之“私学”不同,乃区别于百家而专立为皇家所尊之国家意识形态,而其议则发自于董仲舒。

仲舒应贤良对策,请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明孔氏,抑黜百家。”[①]于是武帝立太子学而“尊五经”(诗、书、礼、易、公羊春秋)。[②]

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武帝时,公羊学《春秋》文派中,江公与董仲舒齐名。上使江公与仲舒廷议,江公呐于口。武帝以为不如仲舒。董仲舒对策引《尚书·太誓》“白鱼赤鸟”之论,引灾异以发明公羊。而丞相公孙弘亦为公羊学弟子,比辑其议,遂重用董生。武帝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之学大兴。

武帝任法,常引《儒》学经训以资点缀。公孙弘善迎合之,建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大扬儒风,立制度而导学者皆习儒学以求利禄,遂开读书入宦之途。

---

①董仲舒对策详论春秋谓“一”为“元”之说,知其倡议之时在建元元年。又按: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考弘卒元狩二年,年八十,上推二十年,正值建元之岁,公孙与董氏并举。第二次对策则在元光耳。

②《六经》排列,今、古两家不同:《易》、《书》、《诗》、《礼》、《乐》、《春秋》,古文家之排列法也。《诗》、《书》、《礼》、《乐》、《易》、《春秋》,今文家之排列法也。古文家以书籍时代先后为序,今文家以程度浅深为准。孔门教人,普通讲授,限于《诗》、《书》、《礼》、《乐》;若《易》与《春秋》,非高材不得闻也。

7

汉武帝时所立十四博士，无一例外，都是今文派。十四博士的次序，依周予同《经今古文学》里的排简化如下：

《诗经》有鲁（申公）、齐（辕固）、韩（韩婴）三家。鲁诗、韩诗，文帝时立博士。

《尚书》三家同出于伏胜。武帝时立其弟子欧阳氏为博士。（宣帝时增立大、小夏侯。）

“礼经”有大戴（德），小戴（圣）二家。（此外还有庆普一家，因庆普未立博士，故略去）诸家同出于高堂生。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为二家。）

《易经》有施（雠）、孟（喜地）、梁丘（贺）、京（房）四家，四家同出于田何。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为施、孟、梁丘三家，元帝时又立京氏。）

《春秋》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二家同出于胡母生、董仲舒。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

康有为指出，孔子学说中有经世变法之微言大义，是春秋时一个改革家。蒙文通云：今文学的理想是一个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全国普遍建立学校及选举、任贤是在受教育和作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禅让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议论政治上的平等。

在这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再以才德的高下来判分其地位，才德最高的人可以受命而为天子，其次可以为诸侯、卿、大夫、士，其不称职者可以黜免，同时又还有辅助政府的议政机构。从形式上看，应当说这是一个气魄雄伟、规模宏大的有理论根据有具体办法的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

今古文经学分野与汉初政治斗争

（古文经学之兴起）

1

武帝时为今文全盛时代。而古文异说，始皆出于诸侯王者，一出于鲁恭王，一出于河间王刘德。

后人看汉代今古学争，皆以为文字学派之争。实际上，今古学争源自政治斗争。古文学派之发端，源自刘姓封王贵族借古书之出土，立异端而反对武帝集权之新政也。

汉初《尚书》之始传，本于伏生之口传，乃今文学派。而鲁恭王称于孔子故居壁中发现古文本原始《尚书》，遂另立宗派，而孔子后裔孔安国则自称古文《尚书》之首传者。

景帝时梁王刘武广招文士。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亦好读书，所招致学士率多浮辩，而以黄老道术杂以阴阳方术之学为主，汇为《淮南王书》，于建元之初进献朝廷。其时朝政仍由窦太后主持，刘安实欲以黄老学与武帝所倡之儒学相抗礼也。

元光以后，淮南王以谋反诛灭，黄老之学遂告式微。道术之士嗣后乃转入民间，沦为山野河上之道，诸侯皆不得不从武帝而尊儒学。

2

河间献王刘德，栗妃之子，其兄临江闵王刘荣乃栗姬所生。初，栗姬有宠于景帝，刘荣得立为太子。后以枝节小过被废，于是刘彻立为太子，而为武帝。

刘德乃废太子刘荣之弟、武帝异母兄弟。武帝削诸侯权、兴开边伐匈奴等新政，刘德多所腹诽之词，不敢见诸奏议，乃借儒者之口笔而发泄之。

刘德不喜仲舒、公孙弘之今文学，唯以其为武帝所好，不敢公然诋忤，乃潜心收集先秦儒学旧典，实欲以之立异说而辟今文家论也。

尤可注意者，刘德竟于其封国中为传古文经术者（毛苌之诗学、春秋左传）立博士，[①]而与朝廷中之今文博士分庭抗礼也。《艺文志》记："河间献王为儒，与毛生（苌）等采《周官》及诸子方乐事者以作'乐记'（《礼记·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古制不相远。"[②]但武帝不予采用，其所用者，为李延年之流的郑卫民间之声。

毛苌为河间王博士，遂立古文派《诗》学，托其说谓出于子夏，以标正统。其《诗》说即所谡"毛传"。毛苌所传之"诗序"，将三百篇古诗几乎全部说成讽骂政治之作，特别反对"奢侈"、"淫荡"以及"穷兵黩武"——都是直接针对汉武帝的讥讽。夫以区区藩国，竟为《毛诗》、《左氏传》自立博士，显然有另立学说，挑战中央意识形态之势。武帝乃绝顶聪明之人，岂不知其心事？然献王素有贤名，又行事谨慎，颇得士人之心，故一时难除之。

史载刘德独好古文经传，尤喜周礼乐及《周礼》（"周官"）。古文经学之重籍实在《周礼》。《周礼》非先周古书，或说出自战国旧籍，实即刘德所召诸儒生，据先秦旧典所纂辑。《河间献王传》谓"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河间王事云：

"（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进）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刘德以古文儒经献武帝，实欲以古文经典为讽喻立异说而影响时政。

3

武帝元光年间，献王来朝，献雅乐，对策答立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词"推道术而言，得事多中，文约指明，"而与朝中今文儒者所言之义多相违。又"得（古）

---

①郑玄《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曰（毛《诗》）"。

②"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多有名。……周襄俱坏，乐无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古制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礼乐志》："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双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之事，稍稍增辑，重五百余编。"

书多,与汉朝等”,“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

因之,今古文之争,实乃汉初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之继续。古文经学实创立于武帝异母庶弟河间王刘德也。以刘德为首的各国诸侯大量收集古文旧典,多次向朝廷献古文经,目的是希望武帝据古之“周礼”即分封贵族之封建制而立制度。而武帝冷遇之,将其所献经典皆束之高阁。公羊学喜讲势利法术名分,《周礼》、《左传》则喜言仁义礼制,政治方向大不相同。古文难学。盖今文之学,平民庶士进身之学。古文之学,乃学官贵族之学。其倾向,实代表当时诸侯王对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即“尊王攘夷”政策之不满。因此献王所倡导之古文学术,遂被武帝视作政治思想之异端。

武帝讥讽刘德说,“汤武周公,都起家于百里之地,你努力吧! ”献王闻言惶恐忧惧。由于遭受武帝疑忌,河间王最终郁郁而死。此乃今古文斗争之发轫。故今、古之争,非仅文字学术之争,实映现中央与地方诸侯政治思想对立取向之斗争也。①

刘德死后,终武帝一朝,古文经学遂被冰藏,操古学者亦多投闲置散也。

4

今古文之异,首先在于道统之不同。今文推尊孔子及孔子所传之学术“六艺”,而古文则推尊周公。谓“周公制礼作乐”,上溯于周公,实乃以周公为教祖,而暗中贬抑孔子为周礼之传述者。

周之国学,周公所传,汉古文家之前身也;周之私学,孔子所传,汉今文家之大本也。

今文学上承孔子、子夏、荀子,传自先秦儒家,其学术各有师授。古文学上承周公,鄙薄孔子;创自西京末叶,其讲论是笃守旧典。故今文学所讲是理想制度,古文学所讲是历史陈迹,两者迥然不同。然而却又都在六经的旗帜下讲论学术,当然就要形成誓不并存、互相攻击的局面了。

古文学家抓住旧史来批驳今文学,说今文学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怪旧艺而善野言”。但是,正是这些“口说”和“野言”中包含着不敢公开宣讲而抨击时政的微

---

①西汉人杜业云:

“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成为一代精神政治之领袖)。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主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而有天下。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

言大义。

六经是“旧法世传之史”，六经之能脱离旧法世传之史而上升为“圣经贤传”，成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的学术体系的经学，则正是由于今文儒生们依附六经灌注了自己的思想，依附六经寄托了自己的整套理想制度。

荀子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按谓说经者)，一义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真本说。仲尼邈而靡质，先师没而无闻，将谁使折之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申鉴·时事篇》)荀氏于汉末，亲见今古两家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故慨乎而言之也。

5

要之：(1)今古字派导因于汉代儒经有今文及古文两大系统。

(2)由于文字不同，故发生之经义解读及释义不同。

(3)释义不同，则传授异，自然发生真伪及孰为正统(“正经”)性之争。

(4)由正统性之争，而产生讲述资格之争。

(5)由讲述资格，而产生利禄之争。

今文、古文争得很剧烈。西汉立的十四个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时才立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对古文经学成为官学。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曾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博士。

古文派主张封国的大小不能变更：一定要分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

今文派注重现实，主张分三等，把公与侯的封国面积一律缩小为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与男的一律缩小为方五十里。

古文派坚持山泽皆入官，自然资源如山林川泽地利，他人不能利用，平民或工商业者不能采取。今文派主张山泽无禁，自然资源公开。古文派重传统形式，举行丧礼，不惜尽量铺张浪费，也就是主张厚葬。今文派反此，主张薄葬；而且把日期缩短，也就是所谓短丧。

古文派主张封国割据称伯(霸)，各伯(霸)一立。今文派与此相反，主张统一尊王，也就是所谓“王天下”。

古文派既主张各伯一方，则天子巡视各国的次数，便愈少愈好，主张十二年才巡视一次，也就是十二年中，上级只巡视下级一次。今文派认为上级巡视下级的次数要多，主张五年巡视一次。古文派凡高位如“卿”之类，主张世袭，也就是权利不外溢，父死子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且卿的名额乃至大夫、士的名额都可以无定。今文派不然：既反对“卿”的世袭，要用选举；而且要限定卿、大夫、士的名额，不许增多。

古文派既重割据称伯，地区较小，所谓社稷之祀的对象，便多带地区性，以“人鬼”为对象。今文派是主张“王天下”的，要用代表性的较大的“天神”代替“人鬼”，作为社稷之祀的对象。

古文派重传统的形式，所谓七庙之祭，日、月、时（四时）都要举行。今文派不然：反对传统的形式，尊重当前的现实，对七庙的祭祀，大加简化，只要时祭一种。

[（廖平（季平）在《今古学考》里列举了五个不同之点。我们加以归并，成为上面的三类九项。）]

6

今文尚义理发挥，以切时用，古文重传古事古言古义，所谓“实事求是”。实事者，实际发生之事，指古史、古代之事也。今文家以古事为粗迹，古文家则标榜求古，蔑今文之义理为妄言。

源头不同，流派各异，师从不同，相互竞立，歧中又有歧。司马迁初习今文经义于董仲舒，不甚好之，复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兼通今古两家之说。其实所宗者则为古文。故迁曰：“以不离古文者近是。”

古文经说于汉武一朝乃边缘学派，而今文为当时显学，居主流学派，古文学派倍受排斥。则武帝晚年，卫太子好儒，不喜公羊之学，乃私问《谷梁》之义而善之。复苏谷梁学实开古文学派之先声。

巫蛊事变卫太子死之，谷梁学亦告式微。惟鲁荣广、皓星公尚传焉，[1]沛人蔡千秋等人犹习之。

---

[1]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

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1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①] 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②]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③] 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

①《说文》:"枭桀死之鬼亦为蛊。"

②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③《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

2

巫蛊之乱的发生，包括四个阶段：

(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8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①]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②]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

①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②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

3

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 103 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4

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

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5

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

"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醊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①

6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

“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可矫以节收捕(江)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并指出卫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师傅:“我是皇上的儿子,不能这样擅自去做。我还要见皇上陈情。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

---

①《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

“(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太子仍想面见武帝，陈情辩白。但是，太子晋见武帝的途径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则通过他们不断诬陷太子，向武帝报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当发现自己已无可能面见皇帝后，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刘据不得不采信了石德的话，下决心除掉江充。“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江)充等。”发使前，太子调动了宫廷卫队，“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诈称武帝使者，带兵将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韩说拒捕被杀死。

太子将全部怒火集中于江充，亲自监临，将其斩首。“乃斩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临刑前，他责斥江充：“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邪！”与此同时，又将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①]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蛊一案中扮演了一种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们今日也难以深考。但是，通过胡巫所带来的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萨满巫术，介入上层权争，乃是巫蛊之案的显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个助手御史章赣在混乱中受伤突围，逃到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太子杀掉江充后，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后指使江充的丞相刘屈氂。

但是，刘屈氂逃脱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长史)乘驿站车马直奔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7

整个事件的最高潮，是卫太子、皇后卫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剧。

武帝在甘泉宫起初听到章赣等来告变，尚不认为是太子发动叛乱，而认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过甚，所以太子杀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刘屈氂来报，他才相信太子实际是谋反叛乱，可能要篡位夺权。

于是，武帝下令丞相刘屈氂率正规军杀回长安，讨伐太子。武帝为此赐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

①颜师古注：“服虔曰：作‘巫蛊’之胡人也。炙，烧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蛊状，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实，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接着，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宫来至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亲自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武帝下诏发三辅近县兵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统由丞相统帅，讨伐太子。并遣使收缴卫皇后玺绶，迫使皇后卫子夫含愤自杀。

太子除长安宫中卫队外，手中并无正规军队。他曾派人调任安指挥的北营军马，但任安接受调令后却紧闭营门，拒绝出兵。[1] 太子手中无军队，只能以皇帝名义"矫制"释放长安中都官狱中关押的数万罪徒，散给武库兵器，命石德统帅，与刘屈氂指挥的正规军对战。

卫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间是比较得人心的。他杀江充的举动得到长安市民的支持，许多市民参与了太子的军队。太子军与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刘屈氂传》)，一时间，长安城内，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血肉纷飞。经过五天的动乱和厮杀，太子被击败，不得不逃离长安。汉武帝下旨严令各地缉拿。

太子带着家人逃亡至湖县(今河南灵宝西)，藏在泉鸠里一户友人家。主人家贫，让家人织草鞋，"卖屦以给太子。"为了生计，太子使人去寻觅一个富裕的故人，结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发觉，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围捕。县卒张富昌破门而入，太子不愿被捕后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户自经"。其友人与来兵格斗而被杀害，跟随太子的两个皇孙也在混乱中被杀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寿及张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变的结果，是整个卫皇后家族及其与武帝所生的几乎所有儿女、孙子，除太子之孙刘病已被侥幸隐藏获救外，尽皆死于非命。

---

①任安也是卫青旧部将领。由于他接受了太子的调令，尽管没有出兵，武帝认为他首鼠两端，后来还是杀了他。临死前他曾写信给好友司马迁求救，司马迁回信即著名的《报任安书》。

巫蛊之乱背后的外戚集团斗争

1

导致巫蛊之乱爆发的因素极为复杂，略言之有以下五端：

1.武帝晚年多病，孤立，多疑。

2.朝中形成了分别以武帝为中心和以太子为中心的两个政治中心、两种政治势力。

3.为监督和制约刘姓及卫姓亲贵，武帝扶植了以江充为代表的超常规监察势力。

4.朝中还出现了试图取代卫太子、卫皇后的刘屈氂（丞相）、李广利一派新兴外戚势力。

5.匈奴背景的胡巫。

巫蛊之祸发生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不仅存在政治理念的分歧，而且在朝中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

卫太子是卫皇后所生。元狩元年（前122年）刘据被立为太子。当时他是武帝下诏预立的法定继承人，布告天下，在全国臣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此时卫子夫贵居皇后，太子之母，其弟卫青在太子出生前已任车骑将军，全面主持对匈奴的军事。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升任大司马大将军，不仅掌有重大兵权，而且成为武帝新设立的朝廷最高决策机构中朝的首领，卫氏权倾一时。

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积极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即“大有为”路线的一派朝臣，如桑弘羊等。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主张温和路线的所谓“宽厚长者”一派。

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关系，而具有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和政治路线的性质。

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

2

在武帝执政初期、开边攻伐匈奴的战争中，卫青立有大功。但随着其权势的加重，也引起武帝的猜忌。十多年的对匈奴战争，使汉皇朝取得了开疆拓土的巨大胜利，也造成了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军人权势集团的崛起。

卫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六千三百户；封三子为侯，一千三百户，并之二万三百户。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①

霍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②

在卫青、霍去病两位名将周围聚集了一批战功卓著的军人，包括：李广、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朔、苏建、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赵信、赵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皆有名于时。他们或出将入相，或为九卿郡守，成为朝廷政治中的股肱之臣。

而这一军事集团，通过卫青与卫皇后及太子以母系血缘纽带而相联形成了特殊的关系。③

有这样的权力集团为后盾，刘据作为储君，太子地位之巩固，自不待言。

但是，卫氏亲属皆拥重权，且多跋扈，早已引起武帝警惕。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破格擢拔年轻的霍去病任骠骑将军。不久又擢升二十岁的霍去病与卫青并列大司马、大将军，分掌兵权。虽然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但此举显然也有制衡和牵制大将军卫青之意，分其军权，防止军权集中于卫青一人之手。“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才为校尉。已而皆为大司马，青日衰，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

但对于卫太子，霍去病则也是其舅表兄弟，仍属至亲。

---

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②《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③西汉政治中母权影响甚重，表现为后妃干政，如吕太后，窦太后，王太后，卫皇后。

卫霍集团的势力都环绕聚集在太子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核心。这个集团中还包括部分刘姓诸王，权贵子弟。因此，在元狩、元鼎、元封年间，以太子为中心，事实上形成了足以牵制影响武帝一些重大决策的以卫霍集团为后盾的一种新兴政治力量。

3

围绕在卫皇后周围的卫氏集团之所以遭到武帝的疑忌和翦除，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个集团与卫太子具有特殊关系。

对此，谨慎而聪明的卫青并非全无知觉。有一次卫青部将苏建（苏武之父）劝卫青召士养客。卫青说："过去魏其、武安侯多养士，上为之切齿。我作为臣下，只应当恭敬侍奉皇上，召士养客何为？"①

惟名器与位不可久居。元狩六年（前 117 年），卫青的长子卫伉"坐法失侯"。五年以后，卫青的另外两个儿子，阴安侯卫不疑、发干侯卫登，"皆坐酎金失侯"。这显然是武帝对当时权势盛大的卫氏的一种警告。

卫青死后不久，其内亲、老部下公孙贺即被灭族。武帝对公孙贺将取先予，先扬后抑。公孙贺对此似也已有所察觉。当公孙贺被武帝任命为丞相时，他不喜反哭，拒绝受印，说：这下我家完蛋了。② 后来果然巫蛊狱兴，"卫氏悉灭"，而事因起于公孙贺。武帝在杀公孙贺后曾说："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占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

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实际都是针对削弱卫太子及卫氏集团而发的。所以《汉书》记江充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侵犯卫皇后和太子，正是因为他已预先"知上意。"

4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死。此前霍去病及名相公孙弘、大儒董仲舒也皆已死。董、公、

---

①实际上，卫青对于这样一种权势集团的形成，是存有顾忌的。苏武的父亲，苏建曾告司马迁这样一件事："吾常责大将军至尊重，宜择贤。"大将军谢曰："自昔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带常齿。彼案附干大夫，招贤屈不肖者，人在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仿此意。"

②太初二年，公孙贺被任丞相。"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苛严。公孙贺大哭，不受印绶。顿首涕不肯起。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受。"出曰："我从是殆矣！"

卫、霍四人对武帝元光以后的新政影响极其重大。他们的去世令刘彻感到孤独和失落。

天汉年间，武帝再次下诏辟征才士，谓“名臣文武欲尽”。他在诏中说，马有性烈奔踢不服人者却能驰聘千里，士有背俗特行而有奇才者可立奇功，他要求举荐这样的人。“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云云。

这一求贤诏，显示了武帝试图再次拔擢新人的雄才大略，但也表明了他对已存在于朝中的旧官僚权贵集团的不满意。

武帝感到需要更新一批新的政治血液，来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彻底消灭匈奴的宏图远志。对朝中已存在的旧权势集团，汉武帝则决心不断任用酷吏，劾之以峻法，力求加以抑制。

武帝一朝，始终大力拔擢重用来自下层社会平民出身的文法酷吏，利用这种人对贵族势力的嫉恨，来抑制朝中的权臣、贵戚和王侯。

天汉年代以后，武帝重用江充，首先是看重他敢于出首举劾赵王，不畏诸侯权贵。同时也是为了让他能作为鹰犬来抑制太子周围的亲王、列侯、贵戚。因此他授予了江充很大的信任和权力。

5

天汉年代以后，随着汉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张，由于对外不断用兵，国家财力匮乏，人民的负担加重，社会中的不满在上升。

元封四年，黄河水灾，关东流民二百万，流离失所，天下不安。天汉二年，山东流民暴动，群盗蜂起。

与匈奴的长期战争，汉军节节胜利。特别是元狩四年漠北大战后，匈奴王庭远遁贝加尔湖。汉军已控制过去在匈奴境内的大片地域，汉对匈战争由此已由自卫战争变成侵略性的。

持续不断的对匈奴战事和开拓西部新疆域的屯戍运动，已变得日益劳民伤财，其意义开始受到质疑。在天汉年间匈奴单于向汉庭示好以后，朝中要求停战和绥靖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随着朝野上下内外批评声音的上升，卫太子周围的军功封侯集团也已厌烦艰苦的远征。他们的呼声无疑影响到太子的政治倾向。

在这种内外形势下，卫太子提出对内与民休息，停止酷敛，对外与匈奴和解，停止征伐四夷的新政方针。迫于舆论和形势的压力，武帝一度也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

6

天汉以后，武帝乃以“征和”为新年号。征和，有息征和平之义，也有政通人和之意。以“征和”为年号，显然表明武帝也有转变内外政策之意。此时刘彻已年逾花甲，他将部分权力和政事授予了太子。特别是在他外出巡狩期间，由太子监国。

《资治通鉴》记“征和二年”后，武帝“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而太子刘据“性仁恕温谨”，“宽厚”“守文”，与汉武帝政治风格多有不同。在其主持政务时，对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的做法“多所平反”，于是“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

“及太子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显然，刘据身边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而政治观点与主流观点不同的人士。

“上每行事，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对此，了解刘彻性格极深的卫皇后知道是不行的。故她常对太子有所规劝，不愿他立即改变武帝的既定方针。但武帝知道后，反而说皇后错，太子做得对。

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武帝已意识到太子政策与自己的分歧。但他反宽慰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①]

7

实际上，正是由于与太子政治方针和理念的分歧不断扩大，武帝晚年以后明显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

地疏远于卫皇后和卫氏集团，转而移情于其他宠妃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

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仍一直保持，但贵为皇后想见武帝一面则日渐困难。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已是67岁高龄，太子也近不惑之年，连孙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继承皇位的不确定因素却越来越增多。

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朝臣中也分成了拥太子和反太子的两派。“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与太子间的分歧与矛盾日渐加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开始重新考虑卫太子的继承权问题。卫青临死前，显然已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帝与卫青曾有这样一番谈话：

“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①] 大将军顿首谢，卫皇后闻知皇帝的告谕后也为此向武帝“脱簪请罪”。

武帝还亲自安抚太子，“我为其难，你为其易”，你就安心等着做一个守成之主吧！“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也就是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江充为代表的反对卫氏集团的一派新兴政治势力看到了机会，乘机挑拨离间。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由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政治理念有重大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最终转化为政治危机。于是，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投机之心，又一度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这种矛盾而制造了“巫蛊”变乱。

8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即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家族的崛起。李夫人原是一个美丽的歌伎，通过其兄乐师李延年来到武帝身边，深受武帝宠爱，但李夫人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

不幸早死。她只留下一个王子刘髆,封昌邑王。李夫人有三个兄长:李广利、李延年、李季。李延年是音乐家。李季是一个市井无赖。李广利后来成为贰师将军。

武帝对李夫人爱得至深。以至李夫人死后常幻见其倩影,并且为了她写了一篇充满深情寄托怀念的"秋风辞"。李夫人临死时以儿子和兄弟相托武帝。但是,尽管武帝一生都是情色中人,却从来不会让情色或情欲操纵他的政治。像拿破仑一样,女人只是他用以调节紧张政治神经的药剂。以至他尊宠某个女人的家族,重用其亲戚,包括早年之重用卫青及霍去病,其中都往往是出于政治方面必须依靠谁的深层考虑。

霍去病、卫青死后,李广利逐渐取代了卫青的大将军地位。与主张改弦更张的卫太子不同,李广利积极支持武帝的对外扩张路线,成为武帝后期对外用兵的主要统帅。

但是,随着李广利军事地位的上升,新的李氏集团开始兴起。

太始元年,卫青旧部宿将公孙敖因妻子从事巫蛊连坐被腰斩。征和二年,族灭丞相公孙贺。而公孙贺是卫青和卫皇后的姐夫,卫太子的姨父。这实际是对太子身后的卫氏贵戚集团沉重打击的开始。与此同时,武帝则擢拔与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刘屈氂出任左丞相。

刘屈氂是巫蛊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武帝的侄子,其父为中山靖王刘胜,是武帝的庶兄。但是,刘胜"好内",夫人众多,生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刘屈氂仅是诸子之一,原来只任涿郡太守的小官。在公孙贺遭巫蛊案被罢相后,刘屈氂却平步青云由涿郡太守被调任中央,担任左丞相。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一任命,关键原因是因为他与李广利的关系,"贰师(李广利)女为屈氂之子妻。"因此必然是出于李广利的引荐提携。

对这一牵涉裙带的任命,汉武帝实际仍是有所保留的。①他认为这种任命只是临时的安排,同时决定对丞相一职分权为两,"分丞相、长史为(左、右)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

《汉书》记:"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其实,江充只是一个打手或鹰犬而已。利用巫蛊推倒卫氏集团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其实正是这位新丞相刘屈氂和背后的李广利。

①"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公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东,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事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作为诏书,以奸传朱安安,狱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贤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

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稳步己之诏

1

巫蛊乱后，武帝曾对田千秋反省说："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武帝的这番话古今之研究巫蛊事件者几乎都没有予以注意。所以过去一直认为巫蛊之乱的祸首只是江充，而不是刘屈氂和李广利集团。相反，甚至认为刘屈氂是站在刘彻一边受命平定了这场动乱的功臣。

实际上，刘彻检讨这个事件的始末时还曾说过："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侍、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

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令)余巫颇脱不止，阴贼及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

史料中这一段话的交代不是很明白。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左丞相与贰师谋逆乱，巫蛊之祸才流及士大夫。"武帝又指出，巫蛊之案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实际并不是江充，而是亲掘兰台(即太子宫)验蛊的左丞相刘屈氂与御史章赣。而江充又曾陷害公孙贺之子敬声及部属李禹与匈奴有勾结("谋入匈奴")。所有这些大案，并未经有关检察执法机构举证核查("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问也")。因此，武帝不再信任这些执法机构，而只信任刘、章、江组成的专案小组。

还值得注意的是，"巫蛊案之初，廷尉所治未及九卿。"本来廷尉是没有权力直接审治公卿的。只有丞相得到皇帝授权，才可能审理王公大臣们。那么正是刘屈氂指使江充(抛开了"廷尉")，然后才与胡巫设谋，而把椒房中的公主们、公孙敬声及李禹之属牵连陷害，甚至诬陷他们与匈奴勾结。又是刘屈氂亲自去兰台掘地，寻找证验，才制造了这起大祸乱。

由此可见，正是李广利身后的刘屈氂所代表的新兴李氏集团(丞相御史)，伙同

江充以及来自匈奴背景的胡巫势力,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默契与合作,才能以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政治势力。

而对于李氏集团来说,搞垮卫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废除卫太子,改变继承皇位的人。这是巫蛊之变之所以引发的重要原因。

2

在卫氏集团被粉碎后,李氏集团开始着手筹谋夺取皇位继承权。征和三年(前90年),在李广利受命率兵出征匈奴的前夕,刘屈氂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史载:

“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此言颇耐寻味。屈氂时任丞相,本来又有什么忧虑呢?只能是担忧陷害太子的阴谋被皇帝醒悟发现罢?))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之子也。”

然而,这一密谋却被内者令郭穰听知并密报武帝。郭穰又举报丞相夫人因为丞相曾遭武帝谴责,使巫师“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武帝于是明白了真相,乃命有司案验,查证后属实。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李氏集团制造巫蛊事件的真正目的。因此,王夫之《读通鉴论》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

王夫之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在李广利与刘屈氂阴谋暴露后,武帝可能由此意识到,巫蛊之乱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征和三年,刘屈氂“坐谋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诅”。武帝毅然将李氏家族全部消灭了。刘屈氂被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同时李广利的妻子亦被收入狱,“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兄长、昌邑王刘髆的舅父。而李广利又与丞相刘屈氂为儿女亲家。阴谋被告发,刘屈氂被杀,于是李广利在前方投降匈奴。

但是这个叛徒被匈奴所轻蔑,不久就被卫律、阏氏找理由杀死。而曾积极参与江充陷害卫太子事件的武帝近侍马何罗,在江充被灭族后,又试图行刺武帝而被诛杀。

征和四年(前84),汉遣使人匈奴,单于使左右以巫蛊乱事难汉使者。曰:“汉,自以为礼义国也。然贰师将军降匈奴言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干。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而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留使者,三岁乃得还。

此事对武帝的震动是极其巨大的。

3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汉武帝“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不敢向盛怒中的武帝陈明,只有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的三老令狐茂最早上书,说: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

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所生也。

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小,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这位三老的上书,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于理性思考。但是,当时刘屈氂、李广利的阴谋尚未彻底暴露,因此武帝仍未下定为太子平反的决心。

直到李广利叛变,马何罗谋刺,江充胡巫阴谋集团陷害太子的罪案逐渐一一暴露出来后,武帝重新反思,终于知道巫蛊事件是一场大冤案。

恰在此时,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以此为契机而彻底感悟。于是,武帝亲自召见这位人微言轻的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即晋升他为大鸿胪。

紧接而来的就是为卫太子彻底平反昭雪。于是,他“族灭江充家”,将江充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开始“怜太子无辜”,在刘据自杀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

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天下闻而悲之”。

不久，武帝即任命田千秋代替已灭族的刘屈氂为丞相。

其后，武帝开始重新思考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停止对四夷的用兵征伐以及转变政策的问题。

马通、商丘成、景建等在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者，包括当年积极搜捕逃难中的卫太子，将其父子逼死而立功封侯的新安令史李寿及县卒张富昌，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年内，全部一一被杀或被逼自杀，以至灭族。

他们之死，史籍中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其实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和复仇，同时也为转变大政方针扫清道路。

4

问题更复杂的一面还在于，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始终忠实于武帝路线的重臣如桑弘羊等，他们也反对太子与匈奴议和的新政理念。因此，他们虽然并未参与江充的阴谋，甚至与李氏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一直支持武帝的开边征战路线的。

武帝临终前的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桑弘羊曾建议在西域轮台扩大屯戌，修建亭障，将开拓西域战争向前推进。修亭障，包括修成以后置卒戍守，这两者本来都是剪除匈奴右翼西进方略中的大计。但是汉武帝却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建议。他由此而发布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轮台罪已诏”。

在这个诏书中，武帝公开对天下人作自我谴责：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诏可见，武帝已决意把施政重心转移到和平与生产方面来。为了推行亲民政策，武帝册封谨慎温和的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晚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5

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后，决心改变君臣、君民，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会中借祝寿向武帝进言，提议武帝退到二线去“玩听音乐，养志和神”。

“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

面对这一寓劝于颂的祝祷，武帝并未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自白和反思：

“朕之不德……朕日时弃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他拒绝了大臣们的颂贺之辞。

征和四年（前 89 年），武帝封泰山时，又一次对群臣谴责自己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后元元年（前 88 年）七月，武帝准备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是，在武帝下诏公布天下之前，他却下令将其生母、年轻的钩弋夫人赐死。此一举措又一次将朝野惊得目瞪口呆。

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表明武帝对未来身后之局是有深谋远虑的。

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七十一岁高龄的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册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任命车骑将军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授予了军国大权。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霍光乃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异母兄弟。

一天后，武帝崩逝。临终遗命，命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为监护小皇帝的托孤大臣。这四个人的安排也是作了精心选择的。

在这四个人中，被授予主要军政实权的霍光是卫霍集团的代表，田千秋是新进大臣，桑弘羊是一直忠于武帝军政路线的老臣。

而金日磾则原是匈奴休屠王王子，而休屠部则是匈奴右路之大部落。东汉末（公元 202 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收编匈奴王部，其中最大一支即是“休屠胡”，这一支匈奴的首长当时已被赐汉姓“刘”。此事表明，直到东汉末年休屠部匈

奴仍是南归匈奴中的一支强大势力。因此汉武帝在临终前安排休屠前王子金日磾为托孤大臣，显然寓有安抚强大的南匈奴部落的深刻用意。

6

汉昭帝刘弗陵八岁即位，在位仅十三年，在二十一岁的青年时期病死。他没有后嗣。主持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倡议推立故昌邑王刘髆之子刘贺继位。

霍光在诸王中提出这一人选是颇为奇怪的。刘髆是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刘屈氂当年就是因为策划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被武帝识破其有篡位阴谋而灭族的。刘髆早死，其王位由长子刘贺继承。

霍光招刘贺入京的方式也是极为奇怪的。名义上是让他进京当皇帝，但采用的是武装征招的方式，“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由宗王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陪伴，实际形同武装押送。半夜朝命宣到，日中即起行离国，下午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实际在途中刘贺已失去行动自由。[①]

这个新皇帝仅在位二十七天，实际是在皇宫中被软禁了二十七天。仅二十七天，霍光就指责其“淫乱不孝”，召集群臣廷议，向孝昭皇后奏废贺“归昌邑”，但已撤销其王国，改为山阳郡。

消除了昌邑王刘贺这一政治隐患之后，霍光尊立卫太子唯一的遗孙刘病已为宣帝。(这位新皇帝的命运也是颇为奇特的。他是卫太子家族中唯一存活的遗孤，被狱吏丙吉所救，自幼变换姓名而匿藏生长于民间，至霍光主政时方得复出。于昭帝夭死后被立为皇帝。)

“大将军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大将军)心内(仍)忌废帝刘贺。元康二年霍光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谨备盗贼，察往来宾客。毋下所赐书。’”即要当地官员密切监视刘贺。为此，张敞给朝廷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表明刘贺已无能作为，“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朝主政者中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田千秋等武帝旧臣为另一方；前者是卫氏集团中人，后者是追随武帝多年深受信任的重臣。二者同

---

①“大奴善以衣载女子人侍王，郎中令龚遂入问王。即责善，交卫士长行法。”

为武帝临终受命托孤的股肱大臣，武帝显然是希望他们能捐弃前嫌而合作的。

7

但是，巫蛊事变中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积怨已经太深。这种矛盾终于在宣帝一朝彻底爆发。先有对桑弘羊直接发难的盐铁官营政策的质疑和辩论。始元六年（前81年），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事问题的政策性大辩论。

《盐铁论·轻重》记述文学言曰："大夫君（案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缕毫。"

桑弘羊是为武帝理财的财政专家。江充曾任水衡都尉，协助从事财政事务。所谓江充"言利末"，是指他准许犯罪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在昭帝临朝霍光当政之时，文学之士出来揭发指证桑弘羊与已伏法的江充曾属于一个团伙，这即暗伏了桑弘羊后来被昭宣时代的首席执政霍光清除而杀头的原因。①

支持辩论的丞相田千秋"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实际是支持桑弘羊但又不敢公开表态。

盐铁辩论的最后结果是霍光推翻了武帝的这一政策。接着，就发生了扑朔迷离的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

在武帝朝中，桑弘羊自少年入宫，从十三岁为侍中，自武帝即位初年起，长期侍从在武帝身边，作为一个经济奇才而深受武帝信任。由搜粟都尉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对武帝忠心耿耿的兴利开边之臣的代表人物。

清洗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燕王，实际是霍光走向大权独揽的一次政变。通过这次政变，卫太子之孙得以继大统成为宣帝。通过彻底为卫霍集团昭雪平反，霍光主持了昭宣两朝的大政。这些后继事件都可以视为巫蛊事件的余波。

---

①昭宣二帝的谥号是颇耐人寻味的。昭，昭雪也。宣，光宣也。

8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霍氏柄政的宣帝时代,霍光继续推行屯田、开拓西域打击匈奴右翼的路线,并最终实现了武帝所经营而未能完成的这一战略目标。

翦伯赞先生在分析“巫蛊之祸”前后的历史过程时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由此开启了昭宣两代的国家安定和中兴局面,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汉武帝抗击匈奴之十五战役

公元前202年刘邦即位，逾年（前200年）即被匈奴围困于平城（大同），七日始解。嗣后匈奴单于来信谩骂吕后。当日匈奴不仅据有蒙古高原，而且控制西域诸国，“引弓之民尽为一家。”建元三年（前138年）刘彻即遣张骞深入西域以窥匈奴，准备对匈作战，开凿空之业。前133年，刘彻组织马邑之战。前126年张骞归来。五年后，浑邪王降。汉人获得西域之重要据点。又三年，虏楼兰王。又三年，与乌孙和亲，遂切断匈奴右臂。再四年后（前101年），李广利伐灭大宛，置校尉屯田渠犁。自此以乌垒、渠犁为中心，转兵东向，与匈奴共争车师前王庭。及车师被征服，遂于乌孙设立都护治所，统管西域事务。

汉匈战争，是汉武帝一生中最辉煌壮烈的诗篇。自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始发，至征和三年发起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四十余年之间，武帝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十五次远征。其规模之大，气魄之雄伟，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尤以元狩四年汉匈漠北大战最为惨烈。此战后迫使大单于向西方远遁，匈奴内部发生分裂。由此开始了古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自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西去的匈奴人，汇合蛮族入侵，最终冲垮了西罗马帝国。但今人对此次伟大的汉匈战争之了解甚少。原因不仅在于史料语焉不详，有些记述错乱矛盾，还在于学术界至今缺少对此次战争有深度的研究。

1

匈奴，其种源据说与华夏本属同族。①“匈奴者，夏后也。夏桀败，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乐彦《扩地谱》）夏人拜龙，匈奴亦拜龙，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

①《史记·匈奴传》：“匈奴者，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秦汉之际，匈奴在北狄诸族中最为强大。建立了强大的部族和部落联邦，匈奴成为盟主。分为三大部，大单于居中，控制蒙古高原和大草原。左贤王居东，控制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及西伯利亚。右贤王居西，控制新疆及西域。汉高帝刘邦击匈奴，被匈奴困于平城。自后用刘敬建议，对匈奴和亲。匈奴由此轻视汉。汉遗单于书，辞甚谦曰：

“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赠物及言语云云。牍长尺一寸。而匈奴来书长大于汉文书，尺二寸，语气倨傲，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2

文帝 14 年，匈奴 14 万骑大举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众。转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烧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后骑至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击胡。尾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骄，岁入边，杀略甚多，云中辽东最甚。

汉患之，遣使复言和亲事。文帝死前一年，军臣单于立四岁，复绝和亲。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杀掠甚众。

汉使三将军：（燕）屯北地，代屯勾注，赵屯飞狐口（今河北蔚县东南），各置守以备胡。又置三将军，驻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

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和亲。终景帝世，匈奴仍时时小入盗边。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时往来长城下。

3

建元三年（前 138），武帝招募能出使绝域者，张骞应诏出使西域。在外历十三年，至元朔三年（前 126）归。“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经）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奴甘父俱出陇西。经

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然骞持汉节不失。”

此次出使，乃汉寻求盟友、战略侦察，为实施大迂回战略夹击匈奴所作的战略准备也。

4

汉军对匈奴反击战争之始，即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一击）

元光二年，武帝开始筹划对匈奴之战。

元光三年，武帝命朝臣议汉匈关系。朝中有和、战两派。大行五恢是积极的主战派，提出设计诱匈奴入塞，汉军伏击的战略方针。武帝采纳，王恢遂安排马邑（今山西大同）商人聂翁壹走私货物赴匈奴。

汉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关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山西左云县），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来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牧者，怪之。乃攻障，捕尉史。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乃引兵还。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盗路塞，往往入盗汉边，不可胜数。

［汉纪：于是上议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匈奴轻疾之兵也，至如飚风，云如流电，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亲举，深入长驱，从行则迫胁，横行则中绝，徐行则后利，疾行则粮绝，难以为功。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私怒伤天下公议。故高帝始结和亲，孝文遵其约，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各因时宜也。且言击之者，固非发兵而深入也，将顺单于之欲，诱而致之於边，选骁骑羽林壮士阴为之备。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必可擒也。”上从恢议。夏六月，护国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屯骑将军王恢、材官将军李息袭匈奴。阴使雁门马邑豪聂壹诈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以降，则物可尽得也。”单于爱信之，令归为间。壹乃诈斩死罪囚头，悬邑城上以示单于使者。使者边，单于乃将十万骑入武塞。是时汉兵三十余万伏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约从代出击辎重。单于未到马邑百余里，雁门尉吏行徼，单于大惊而还，曰：“吾得尉吏，天也。”以为天王。乃

远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罢。上大怒，恢首谋，不出兵击单于辎重也，恢自杀。时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胜必杀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

燕人徐乐上书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坏，是谓土崩。吴、楚七国之时，是谓瓦解。今关东比年谷不登，民多困穷，不安其处，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明主之要，其在于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临淄人严安上书曰："今天下奢侈，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夫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无已。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贫不相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

此三人同日上书。上皆召见，谓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举贤良，赴阙上书自者甚众。其上第者见尊宠，下者赐帛罢。若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忌等皆以材能并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论之，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甫五日。]

5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

（元光六年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二击）。遣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此次为汉军改变战略的首次主动出击。）

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卫青奴隶出身，被拔擢重用为车辕将军。首战小捷。

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

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

汉囚敖、广，赎为庶人。

[汉纪：卫青者，卫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初，季与主家僮卫媪私通，生青，冒姓为卫氏。青长姊君孺，即公孙贺妻也。尝有相者曰："贵人也，当封侯。"青曰："人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僮得幸于上，

立为夫人。陈皇后之大长公主捕囚青,欲杀之。公孙敖为骑郎,与壮士青。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子夫故与陈掌通。上乃召贵掌及公孙敖,卫青之宠始隆矣。其时诸将皆无功,唯青颇斩首虏,赐爵关内侯。而李广为匈奴所生得。单于闻李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广初被创,胡骑置两马间络囊盛之。广伪死,渐渐胜而上马,抱胡儿而鞭马南驰。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取胡儿弓射杀追骑,遂得免。后下吏,赎为庶人。]

冬,匈奴入边报复。渔阳尤甚。

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

6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二万骑攻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二千余人。

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韩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

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于是(元朔元年冬),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

将军李息出代郡,击胡。(三击)此役得首虏数千人。

7

元朔二年(前127),遣将军卫青、李息复出云中以至陇西,西至符离,击胡之楼烦玉、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余万。

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城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四击)①

封卫青为长平侯。校尉苏建有功,封平陵侯。校尉张次公有功,封岸头侯。

(此役为河南之战,第一阶段。)

---

①"河南"地是秦汉与匈奴争夺的第一焦点。

其地包括河套,"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乃赵武灵王所首开。(《匈奴传》:"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正义引《括地志》:赵武灵王长城在阙州善阳县北)。

造阳在今河北怀来(河北赤城北独石口),襄平在辽阳。

"河南地,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梁书·诸夷传》)指黄河第二曲之南伊克昭盟诸旗,以及榆林靖边绥德诸县之地。朔方,在今内蒙乌特拉前旗东南。

汉亦放弃上谷之什(音斗/担)辟县(汉书作“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汉击匈奴,除由传统的车步军团改为骑兵团作战外,为反制匈奴之擅长弓箭,而使用大量强弩、连发弩箭,以高射速之密集矢箭压倒匈奴骑兵。此种新弩,工艺复杂先进,非匈奴所能制造,是一种新的军事技术。其战术是以骑兵集团奔远袭击,以车步重兵运送后援及后勤辎重补给。由此遂取得了对匈奴的优势,转变了战场之主动权。李陵以五千步兵屡战匈奴数万骑兵,即靠此技术。后弩箭用完,遂被俘。]

元朔三年(前126)冬,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邪自立为单于,攻破太子於单。於单降汉。封涉安侯。

(三年)夏,匈奴数万骑入边,杀代郡太守恭及,掠千余人。

秋,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元朔四年(前125)春,匈奴大入代郡、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上郡,各三万骑。杀掠数千人。右贤王怨汉之夺河南地而筑朔方城,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掠甚众。

(欲夺回河南地,匈奴发动反攻。)

8

元朔五年(前124)春,汉以车骑将军卫青击胡。将六将军、十余万人。(五击)

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

骁骑将军公孙贺,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蔡出朔方,将军李息,将军张次公出右北平,凡十万骑,击匈奴右贤王。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长途奔袭。夜围右贤王部,右贤王大惊,乃将数百骑驰,溃围北遁,仅以身免。

汉得右贤王部众男女五千人,畜数千、万,裨小王十余人。还师屯塞上。

诏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封青三子为列侯。青固拜让诸子封,上不听。

诸将公孙贺、李蔡,护军都尉公孙敖、校尉李朔、赵不虏、戎奴都尉韩说,皆以功封列侯。卫青贵为大将军,贵宠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无礼,或责之,对

曰:夫以大将军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将军闻而贤之。(河南之战经此役而告一段落)

秋,匈奴万骑入边,杀代郡都尉朱英,掠千余人。

9

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击胡。(六击)

此役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长奔数百里击胡。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级。而汉亦亡两将军(苏建、赵信)。

右将军苏建得以身脱。

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

[汉纪: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凡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虏三千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赦天下。夏四月,卫青复出,将六将军逾绝漠北,大克获。苏建、赵信以三千骑独遇单于,战败。信遂降匈奴。建独以身免,归。大将军议其罪,议郎周酣等曰:"自大将军出,未曾斩一裨将,建弃军,可斩,以明军威。"军正闳、长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擒也'。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死,无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人无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待罪行阵之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军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宠不敢擅诛于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于是以讽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将吏皆善。遂囚建至长安。上赦之,赎为庶人,忧死。校尉张骞从卫青有功,封博望侯。骞者,汉中人也。初为郎,应募,使月氏。时匈奴杀月氏王,遂西徙。故汉欲与月氏击凶奴。骞行,为匈奴所得。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常持汉节不失。后亡到月氏,月氏未有报匈奴意。骞留月氏岁余,乃还,并南山,从羌中来归,复为匈奴所得。留之岁余,会单于死,国内乱,骞乃与其胡妻来归汉,拜为太中大夫。初,骞行百余人,十三年乃归,唯骞与邑氏奴二人得还。骞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国名,具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四国,皆在匈奴之西。

南北有大山;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岭。中央有大河,其河有两源:一出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

泽，去阳关三百余里，广长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道：行从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旁北山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鄢耆。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异俗，皆役属匈奴。匈奴赋税之，取给焉。](漠北之战由此始发)

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二号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绝北漠，以诱疲汉兵，相机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元狩元年(前122)，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10

元狩二年(前121)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胡。(七击)

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泽，攻祁连山，大破胡，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千余人。(八击)

(由此开始霍去病统帅指挥的漠北之战，此为第一阶段。奔袭作战，距离长安达一千里至二千里。骑兵军团实施无后方深入敌后的远途奔袭。)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

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

于是汉得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1] 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此战乃卫青指挥的河南战后，汉军对于匈奴的第二次决定性打击。经河南战役，匈奴右部遭受重创。大单于怒，欲责河西部浑邪王、休屠王，乃召二王赴龙城(今

---

①即“河南”地。

蒙古鄂尔浑河、和硕柴达木湖附近)。二王乃降汉,中途浑邪王杀休屠王,汉遣霍去病率部迎之。汉遂尽得河西走廊地。)

秋,匈奴左贤王部入代郡、雁门,杀掠数百人。

汉使博望侯张骞及将军李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

左贤王围李将军,率兵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将军救至,李将军得脱。但尽亡其军。

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敖后骠骑将军期,公孙敖与张骞皆当死,赎为庶人。

元狩三年(前120),匈奴大入右北平及定襄各数万骑。

杀掠千余人而去。

11

元狩四年(前119)春,汉(武帝)与诸将谋曰:"翕侯赵信为单于计,居漠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以粟喂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计其数焉。

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从东西二分军击胡。(九击)

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会于绝漠,夹击匈奴。

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漠北。与汉大将军遇,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北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杭爱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遁去,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不随单于。

李广兵失路失期,自杀。

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直单于复得其众。而右王乃去其号,复为右谷蠡王。

骠骑将军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左大将皆遁走。

骠骑封于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东之肯特山脉),禅姑衍山,临翰海(贝加尔湖)而还。

(此为卫霍联合统帅的漠北大战,此役完成第二阶段。汉匈大战经此役后,汉朝

取得决定性胜利。)

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设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至此,汉两将军大出围(即大迂回)单于,所杀虏八九万,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匈奴用赵信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怒,留之不遣。

汉方复收士马。会霍去病死。[1] 其后多年,汉久不北击胡。

(本年再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游乌孙,副使到大宛。武帝开始考虑实施第二个大迂回战略。)

元鼎三年(前 114),伊稚邪单于死,子乌维立为单于。

12

元鼎六年(前 111),汉灭南越国。遣公孙贺(太仆)将一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击胡,至浮且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十击)

又遣从骠侯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杭爱山南)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以见武节。而使郭吉讽告单于。郭吉至匈奴,单于见吉,吉曰:

"南越王头已悬汉北阙。今单于能,即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也。不能,即南面而臣,何但远走?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单于怒,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于汉,为辞言甘,求请和亲。汉使王乌、杨信窥匈奴。

---

①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前 117 年。

汉东拔秽貉、朝鲜立郡。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赵信死于匈奴。

元封三年（前108），汉遣赵破奴攻破楼兰国，汉使者王恢（又一王恢）助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此乃河南战役、漠北及河西战役后的开辟西域战役。）

元封四年，汉自酒泉至玉门始筑玉门障。（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障，终点在酒泉，至是汉边西延至玉门矣。）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门的亭障皆连以长城，即古"西塞"。

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卫青死。

13

元封六年（前105），匈奴乌维单于死，在位十岁。子詹师庐立，年少，号儿单于。

乌孙与汉和亲。

单于益迁西北。立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儿单于初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左贤王，以乖（睽）其国。儿单于扣汉使。

14

是岁（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使人间告汉。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受降城待之。

冬，大雨雪，匈奴畜多饥寒死。

太初二年（前103）春，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居延北，今杭爱山南）而还。（十一击）

左大都尉欲发兵袭大单于,单于觉而诛之外,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击败之,还兵,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重兵八万骑围之。断汉军水源,浞野侯夜出求水,为匈奴捕获,军遂没于匈奴。单于喜,纵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西域之战之第二役。)

太初三年(前102),单于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子年少,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句黎湖单于立。

汉使光禄勋(光禄大夫)徐自为(徐息)筑五原塞(榆林)数百里,外列城,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西北至芦沟山。(在今包头市西北,固原之西南。)

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卫青子)将兵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障于居延泽上(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

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杀掠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障。

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掠数千人。

将军任文率兵至,尽复失所得而去。

(时汉之战略为北守、西攻也。)

太初四年春正月,李广利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

[汉纪: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

初,广利将骑六千、步兵数万人至贰师城下取善马。西至郁(成)城,当道小国各城守,不肯给食,食乏而还。往来二岁,到敦煌,士卒十遗二三。上书请罢兵。

上大怒,乃益发兵卒六万人,负从者不豫。牛十万,马二万,驴骡驼以万数,多齐粮。转运奉军,天下骚动。广利遂进兵,当道小国皆送迎,给廪食。径到大宛城,围宛三十余日。

宛中贵人共杀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给军,悉出善马。汉择取其善马十匹,中马三千余匹。乃共(与)立宛贵人察为王,与盟而还。诸所过小国,皆遣子弟从入献见,因为质焉。

还玉门关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将吏贪,不爱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乃封广利为海西侯;封骑士赵弟杀郁城王为新寺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数百人,千户以下千有余人。

广利者，李夫人兄也。广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爱之。乃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丽，有宠。及夫人卒，上以厚礼葬之，图画其形于甘泉宫，而尊重其兄弟广利为将军，延年为协律都尉。]

其冬，儿单于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乃立为单于。

汉既灭大宛，威震西域。

太初四年，武帝复下诏动员击胡。

且鞮侯单于立，恐汉来袭。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得归。单于致书卑词自谓："我儿子，汉天子，我丈人也。"汉乃遣苏武为使，遭张胜之变，匈奴拘留而扣之。

其明年，赵破奴逃亡归汉。

15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十二击)(此乃西域之战之第三役。)

匈奴大围广利部，几不脱，汉兵物故十之六七。

[汉纪：天汉二年夏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斩首虏万余级。骑都尉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与鞮汗单于战，斩首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陵者，李广孙，敢兄当户之子。

上使陵为贰师将军督辎重。陵稽首曰："愿得自当一队。"上曰："吾无骑与汝。"陵曰："不用骑，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陵至峻稽山，与单于相遇，以骑三万攻陵。陵千余弩俱发，应弦皆倒。虏还走上山，陵追击之，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贤王，驰兵八万骑攻陵。陵且战且却，南行数日，抵山谷中。复大战，斩首三千余级。遂引兵东南，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烧陵部，陵亦令军纵火以自救。

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自步斗树木间，复杀虏数千，因发连弩射，单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单于曰：'此汉精兵也，晶夜引吾南行近塞，得无有伏兵乎？'诸军长皆曰：'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胜，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日，汉军与匈奴力战数十合，复力战，杀伤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退去。会陵

军中侯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汉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大喜，进兵使骑并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趋降！”

遂诸道并进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尽，即弃车去。

士卒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单于乃先入遮道，从山上坠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败，吾死矣！”军吏或劝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壮士也。”陵叹曰：“使人犹有数十矢，足以免矣，今无兵复战。”令军士人持三升火米，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虏鄣相待。

陵与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仅余数十人。虏驱千骑死追之，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以报陛下矣！”遂降。

士卒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边塞仅百余里。单于以大女妻陵，立为右校王。

武帝闻陵投降，大怒。大臣忧惧。太史公司马迁上言陵已立功，以陵若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遣贰师将军出时，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持，而李广利竟无功。上以司马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李陵闻之曰：“教单于为兵者，乃李绪也(汉军降将)，非陵也。”李绪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绪诛，乃使人刺杀绪。

秋，汉复使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路博德会涿邪山，毋所得。(十三击)[1]

以匈奴降将成娩为将，率楼兰国兵击东师。匈奴右贤王往援，汉兵不利，引去。

(此乃对西域之战役之第四役。)

16

天汉四年(前97年)春正月，汉使贰师将军将率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将军会师。

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武帝乃命因杅将军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十四击)

匈奴闻，悉远其辎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自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

---

①公孙敖屡次出兵不利，筑受降城死伤士兵甚多，下狱，为部属所救，匿民间。后被举报，再下狱。太始元年死。

汉军与单于相持连战十余日,伤亡略相抵。匈奴不胜,皆引还。

游击将军韩说无所得。因杅将军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此西域之战之第五役。)

太始元年(前96),且鞮侯单于病死,在位五年。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

[初,且鞮侯有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且病,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来至,贵人以为有病,乃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遂立为狐鹿姑单于。遂以弟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单于命其子先贤掸转任日逐王,贱于左王,而自以单于子之子为左王。]

新单于既立第六年(征和二年,前91),匈奴左部大入上谷,五原,杀掠。

征和三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17

三月,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十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击胡。至浚稽山,多斩首虏。(十五击)

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弃其辎重,徙赵信城北抵郅居水(色楞格河,在今杭爱山北麓,流入贝加尔湖)。左贤王驱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百里,退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杭爱山东南)。

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

匈奴乃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与李广利部会战(今杭爱山东南),转战九日。汉兵陷阵却敌,杀伤胡虏甚众。至蒲奴水,匈奴不利,还去。

[贰师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邀击贰师将军于夫羊句山峡(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城西)。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夫羊句山东北),匈奴奔走,莫敢与敌。

重合侯马通军至天水,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邀击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

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归道,乃遣闿陵侯成娩(原是匈奴人)将兵围车师国。马通至天山,虏引去,因招降车师,引还。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李广利部归汉途中,会贰师妻子坐巫蛊及刘屈氂案发,全家被收。李广利闻之忧惧。其掾胡巫夫亦避罪从军,乃游说贰师降匈奴。贰师狐疑,欲深入立功自赎,乃旋师北至郅居水上,匈奴兵已去。

李广利遣护军将二万骑渡水追击,逢匈奴左贤王、左大将,率二万骑与汉军合战终日。汉军杀左大将,胡虏死伤甚众。

广利军长史与都尉、辉渠侯共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立功,恐必败。"乃谋共执贰师。谋泄,贰师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杭爱山)。

大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道击汉军,相杀伤皆甚众。匈奴乃夜挖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汉军阵乱败,贰师将军被俘,投降。(河西战役,第五役)

大单于素知李广利乃汉之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武帝下诏捕太医令随旦,以其泄言贰师妻子事,促使广利降匈奴也。)

贰师入匈奴岁余(征和四年),卫律害其宠。会单于母阏氏病,卫律饬胡巫言欲激单于怒,曰:"胡战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祠社,今何故违誓?"于是命收贰师。贰师恨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

"会连雨雪数月,畜产多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乃为贰师立祠社祭之。"

18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无力复出重兵。

是时下民疲于兵革,国内方经历巫蛊之乱,创痛甚深,上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奏言:

"故轮台以东皆故国处,有既灌田。其旁小国少锥刀,贵黄铁绵缯,可以易谷。

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轮台,置校尉二人,通利沟渠,田一岁,有积谷。募民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产业,稍稍筑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

奏上,上乃下诏拒之,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以助边用,是困老弱孤独也。今又请田轮台。

曩者,朕之不明,兴师远攻,遣贰师将军。古者出师,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

不行。乃者遍召群臣，又筮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曰：‘匈奴困败。’方士占星气，大卜蓍龟，皆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失。卜诸将，贰师最吉。

朕亲发贰师，诏之必无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谬，贰师军败，士卒离散略尽，悲痛常在朕心。

今有司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唯益扰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农，无乏武备而已。”

由是此后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而劝耕农，自是田多垦辟，而兵革休息。

《汉书》曰：“孝武之世，图利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关，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隔绝南羌、月支。单于失援，由是远遁漠北，而漠南无王庭。”

后元二年(前 87 年)，武帝崩。

19

昭帝时，汉匈复和亲。

宣帝地节二年，汉军出车东师。

匈奴击乌孙，欲复收汉两翼。汉乃救乌孙，破匈奴。

匈奴力衰，丁零，乌桓皆反。人民死亡三成，商户亡失过半。匈奴大困。

元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时，虚闾单于死，匈奴分裂，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据单于庭，归降汉为藩臣。汉以昭君嫁呼韩邪。郅支单于部西迁中亚，漠北空虚。

(前 46 年)，单于舆死，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境大旱，大疫，人畜多死。乌桓复叛胡，匈奴北徙。公元 48 年，遂王比自立为单于，率部至五原(今包头西北昆仑召一带)，归降汉朝。东汉册立其为南单于，北部匈奴另立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部。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汉与南匈奴出击北匈奴，北单于大败，三年，北单于部西迁乌孙，又徙至中亚，遂人欧洲。151 年，汉灭西域匈奴自立不服诸残部。

自此后，曾经作为中国北部一个强大草原帝国和联邦体的匈奴遂告灭亡。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 china 即"秦人"之称的起源),[①] 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

①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53—54 页)此即英文 chinese 秦尼斯之语源。

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①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

---

①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 10—20 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 171 年、173 年、179 年、182 年、185 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 182 年）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 183 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 265 年）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 157 年）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

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

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 323 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 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

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盻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

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 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

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 165 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2003 年 4 月 25 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附录]

匈奴单于世系表

据《史论》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的后代,名叫淳维。自淳维至头曼单于史家无考。匈奴贵族诸姓以挛鞮氏为最贵,单于姓氏当出于此。

头曼单于,公元前?——前209年在位。

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年——前174年在位,头曼之子。杀父而自立,统一匈奴各部,大破汉高祖刘邦。得姓挛鞮氏,国号撑犁孤涂单于。

老上单于,名稽粥,公元前174——前160年在位,冒屯之子。

军臣单于,公元前160——前126年在位,老上之子。

伊稚斜单于,公元前126——前114年在位,官臣之弟,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而立,於单降汉。

乌维单于,公元前114年-前105年在位,伊稚斜之子。

詹师庐单于,公元前105——前102年在位,乌维斜之子,因年少史称儿单于

句黎湖单于,公元前102——前101年在位,乌维之弟。

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前96年在位,句黎湖之弟。

孤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且鞮侯之子。

壶衍鞮单于,公元前85——前68年在位,孤鹿姑之子。

虚闾权渠单于,公元前68——前60年在位,壶衍鞮之弟。

握衍朐鞮单于,名屠耆堂,公元前60——前58年在位,乌维之后。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58——前31年在位,时握衍朐鞮暴虐,民不聊生,众人推举而立。前33年,汉帝赐王昭君,生一子。

屠耆单于,名薄胥堂,公元前58——前55年在位,握衍朐鞮之兄。握衍朐鞮死后自立。前55年被呼韩邪剿灭。

呼揭单于,公元前57——前56年在位,自立。前56年去单于号,尊车犁为单于。

车犁单于,公元前57——前55年在位,自立。前55年降呼韩邪。

乌藉单于,公元前55——前53年在位,屠耆从弟,自立。前53年被郅支剿灭。

郅支骨都侯单于,名呼屠吾斯,公元前55年——前36年在位,呼韩邪这兄,前36年在康居被杀。匈奴重归一统。

复株累若鞮单于,名雕陶莫皋,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呼韩邪之子。复娶王昭君,生二女。

搜谐若鞮单于,名且糜胥,公元前20——前12年在位,复株累若鞮之弟。

车牙若鞮单于,名且莫车,公元前12——前8年在位,车牙若鞮之弟。

乌累若鞮单于,名事囊知牙斯,公元前8——13年在位,车牙若鞮之弟。

乌达鞮侯单于,46年在位,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之子。

浦奴单于,46——? 年在位,乌达鞮侯之弟。上继北匈奴。

落尸逐鞮单于,名比,48年——56年在位,乌珠留若鞮之子。起兵自立。此为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

丘浮尤鞮单于,名莫,56——57年在位,比之弟。

伊伐于虑鞮单于,名汗,57——59年在位,莫之弟。

僮尸逐侯鞮单于,名适,59——63年在位,比之子。

丘除车林鞮单于,名苏,63年在位,莫之子。

胡邪尸逐侯鞮单于,名长,63——85年在位,适之弟。

伊屠于闾鞮单于,名宣,85——88年在位,汗之弟。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名屯屠何,88——93年在位,长之弟。

“单于”(失号),名安国,93——94年在位,宣之弟。

亭独尸逐侯单于,名师子,94——98年在位,适之子。

万氏尸逐鞮单于,名檀,98——124年在位,长之子。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名拔,124——128年在位,檀之弟。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名休利,128——140年在位,拔之弟。140年被太原太守陈龟逼死。

“单于”(失号),名车纽,140——144年在位,休利死后自立。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名兜楼储,143——147年在位,汉帝立。

伊陵尸逐就单于,名居车儿,147——172年在位。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172——178年在位,居车儿之子。

“单于(失号)”,名呼征,178——179年在位,屠特若尸逐就之子。179年,被张修斩杀。

“单于(失号)”,名羌渠,179——188年在位。

持至尸逐侯单于,名于扶罗,188——195年在位。羌渠之子。前赵刘渊之祖。

“单于(失号)”,名呼厨泉,195——216年在位。于扶罗之弟。前赵刘渊之叔祖。216年被曹操留邺。遣去卑代理,去卑乃夏赫连勃勃之先祖。

至此匈奴遂弱。至西晋惠帝时复兴,304年,于扶罗之孙刘渊(元海)反晋建汉,后改前赵,329年被后赵石勒所灭。后又有北凉和夏兴于一时。至431年夏亡于吐谷浑,史书不见匈奴也。

(编撰者:费铭)

[附录]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己。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都成了鲜卑人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 89 至 91 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 10 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 374 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 5 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

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报》李勇、冯国雷文)

[附录]

论汉武帝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天辟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汉武帝。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 15 年就灭亡了。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

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登基，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立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

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

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舳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服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划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亲自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充分表明其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广”。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宜，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诫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 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

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

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入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曰“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有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而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我编制《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的目的,就是试图对中国历史上这位极其伟大重要的帝王,从若干新的角度给予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附录]

汉武帝年谱①

何新 撰

[何按:汉朝之得名,旧以为源自"汉水"或"汉中",非也。刘邦始封"汉中王",初不欲就国。有进言曰:"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刘邦乃就汉中王。取天下后,国号称"汉"。汉者,天汉,银河之古称也。武帝年号有"天汉",盖以苦旱连年,欲"天汉"降雨,故名之。故汉民族之名,语源实来自"天汉"。]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甲申),太子刘启32岁。

夏6月,文帝病甚,托孤周亚夫、卫绾。以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嘱太子:"若有缓急,可用周亚夫为将。"]

乙亥,孝文皇帝崩。民出临三日,葬霸陵。

丁未,太子启即皇帝位,是为景帝。

尊母窦皇后为皇太后,立太子妃薄氏为皇后。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关于窦太后。窦太后,赵国清河人,《史记》《汉书》不传其名。"索隐"引皇甫谧云"名猗房"。

窦氏在惠帝时以良家子被选入宫侍皇太后。汉初时,国家经济不富裕,宫室开支很大。吕太后决定将部分宫人赏赐给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个。

窦氏也在列。她请托负责这次派遣工作的官员,将她的名册放在去赵国的人员之中,因为她是赵国人。

但那位负责人把窦姬托付的事给忘了,将窦姬的名册错放在去代国的人员中。这些名册都已经过吕太后的审批。无法更改。

---

①本表原收入拙著《圣与雄》(金盾出版社,2003),刊误殊多。因重作校勘及详细补充。

当时的代王是高祖薄姬的儿子刘恒，后来的孝文帝。

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窦姬给刘恒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景帝刘启。

刘恒做皇帝之后，窦姬成为皇后。

刘启即位是为景帝，窦皇后成为皇太后。]

封太后弟窦广国为章武侯。户11,869。太后兄窦长君(已死)子彭祖为南皮侯，户6,460。

[何按：西汉初叶，功臣(列侯)、外戚及刘姓诸王鼎足而立构成统治阶层的三大集团，皇帝亦受制之。

同时，在社会中，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的“小人”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边缘阶层，即“游士”(游学之士)。游士有文化知识特异才能而无财产及社会地位，往往寄食贵族阶层，成为其荫户为“客”。游士在战国争霸角逐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从事战略和政略设计、意识形态组织、舆论操纵。在始皇时代游士也已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边缘力量，可主导舆论威胁于政权，因而被秦始皇所压制(即“焚书坑儒”)。结果这一边缘政治势力，在刘邦起义和夺取政权及新制度构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韩信、陈平、叔孙通、陆贾之辈)。这一游士阶层，所操学术则颇不同，有黄老之学，有儒学，有方术之士，亦有习法术者。

贾谊、晁错正是汉初之际这个边缘层中的政治代表人物。]

[《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廿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何按：贾谊是汉初之政治改革家，然其学术来源于李斯(曾从学于李斯)。贾谊早夭，其志未酬，而晁错则是贾谊之同道，在政治上继承了贾谊的事业。汉武帝一朝之更制改化，其源实本于文景两代贾、晁始倡之新政试验。]

[刘邦是个实用主义者。轻视书本知识，不喜欢甚至是不尊重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儒士。

刘邦曾在儒冠小解，以示他对读书人的轻视。刘邦能成为气势恢宏的大汉朝开国皇帝，两个出身儒家的思想家，给了刘邦鼎力之助。一个是陆贾，一个是叔孙通。

陆贾是位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家。陆贾早就是刘邦的追随者，然而刘邦并没有重用他，经常拿他开心，天下初定，尉佗平定南越后，自封为王，意在割据。刘邦就派陆贾前往，授佗南越王印，陆贾的辩才使尉佗叹服，甘愿称臣。刘邦封陆贾太中大夫。

陆贾见刘邦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治国方略，便经常在刘邦面前称赞和引用《诗经》、《尚书》。

刘邦说："我坐在马背上能打下天下，靠背诵《诗》、《书》行吗"？陆贾反诘道："可以坐在马背上得天下，但可以坐在马背上治天下吗？"

陆贾将中国历代治国成败的经验教训，分析给刘邦听。陆贾说，商汤和周武王都是靠文武并用，才使天下得以长治久安。而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崇尚武力而灭亡的。如果秦王朝能在一统天下之后，施行仁义，仿效先圣治理国家。陛下，你能得到天下吗？

他也觉得陆贾说得有道理。于是，就说，陆贾，你就给我写几篇文章，帮我分析分析秦王失天下和我得天下的原因，跟我谈历史上治国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陆贾总共写了 12 篇文章。合订成书，名叫《新语》。《新语》实际上代表了汉初治国的大政方略。

《新语》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过度使用刑罚、傲慢自大以及奢侈无度。陆贾一方面尽力地说明汉朝如何避免必然的消亡，另一方面也旁敲侧击地大谈灾异现象和其显示的警戒意义。他更强调一个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必须要注重儒家的伦理道德。几十年之后，贾谊在其《过秦论》指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汉初另一位重要思想家是使汉朝政治确定统治格局、编订朝廷礼仪的叔孙通。重新整合而正式使用，中国的朝廷礼仪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叔孙通，秦始皇时的儒经博士。秦二世逃出秦宫，他投奔早已兴起于山东的义军，最后投靠到刘邦的麾下。在投靠刘邦之先，许多儒士都不喜欢他，说他只会讨好拍马，见风使舵，品德低下等。他发现刘邦不喜欢儒服后，他穿上楚制短衣。

叔孙通跟刘邦说："知识分子都是文弱书生，打天下的时候用不上他们，但是天下取得之后，治天下时，他们还是有用的。"刘邦未置可否。他还说，古代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总是根据不同时代的人的要求而制定的礼乐制度。因为时代不同啊！我愿意吸取古代礼制和秦朝礼仪中有益的成份，再结合当今现状制定汉代礼制。刘邦说："你去试试看。但原则是要简单明了，便于把握，利于适用。"

叔孙通找了 32 个鲁生，练习起朝廷上应该用的各种礼仪。刘邦检阅过之后，觉得并不像担心的那么难，就要求群臣随着学习。

高祖七年十月。汉朝沿袭历史上的纪年方法，仍是以十月为岁首。每年十月都是大汉帝国庆典之时，公元前 200 年，刘邦要求使用汉家朝仪。整个过程由御史大夫主

持，隆重而有秩序。整个过程庄严肃穆。

朝仪结束之后，高祖刘邦很兴奋。感叹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原来也是很威风的。"于是，高祖任命叔孙通为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为太常)，主持国家的宗庙礼仪。同时，赐他五百金。任命叔孙通弟子们全部为"郎"。他使汉代开始以礼治国，即以文治国。司马迁评价叔孙通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乙酉)，刘彻诞生。

7月7日景帝王夫人称言梦红日入怀，生刘彻于长安未央宫猗兰殿，乳名阿彘。后更名"彻"，字"通"。

[母王美人，共生三女一男。男即刘彘，后易名为"彻"。[1]汉制，美人俸比二千石。景帝共生男13子，彘为第9子。或言为第10子。时年，景帝32岁。]

5月，实行薄赋政策，复民田半租，三十税一。

匈奴入代边，劫掠而去。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与匈奴议和亲事。

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凯为廷尉，楚元王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以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申屠嘉为丞相。

[班固《百官志》："太中大夫，掌论议，无员，多至数十人。秩比千石。属郎中令。中大夫掌论议，属郎中令，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谏大夫之上。后武帝拨擢中大夫，更名曰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比千石如故。"(此元狩五年事。)]

诏减笞刑。

[文帝时以笞刑代肉刑(废除刖足劓目等残肢之刑)。本年又减少笞刑数，五百者减三百，三百者减二百。]

前二年(公元前155年，丙戌)，2岁。

冬10月，梁王刘武来朝。

3月，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余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

---

①《释名》："彻，达也。"达，即通也。通达智慧，故名为"彻"。

4月，文帝母、太皇太后薄氏崩。

令天下男子年20始傅(登籍征役)。(旧法依秦律，傅年为17。)①

[何按：傅者，夫也，父也。成丁曰夫，成年可为人父曰父。傅，夫，父字通。秦制男17而成丁，至此改之。男子成丁曰“夫”，未婚曰“匹夫”，已婚有子曰“父”。君子成丁曰士。士者，什长也。什长世袭。成丁有仪礼，曰“冠”。]

6月，丞相申屠嘉卒。

8月，以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上议削藩。

秋，与匈奴和亲。

削赵王邑，又削去胶西王六县。

以卫绾为河间王太傅。

与匈奴和亲。

前三年(公元前154年，丁亥)，3岁。

冬10月，梁王武、楚王戊来朝。

[时上未置太子，景帝与梁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窦太后喜之。时诸王有欲反之势，孝王乃亲弟，故景帝安抚之，非出帝之真心，乃抚络之术也。兄终弟及，殷商之制也。嫡长子继承父业，周宗法制也。儒家重宗法(礼)，继承主周制。道家法自然，不反对兄终弟及。]

[何按：《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记：“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亲亲者立弟，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

董仲舒云：“殷道亲亲，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周道尊尊而多礼文，故立嗣子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七代虽父子相传，所立亦非皆为嫡长子。殷代帝王相继，自商汤至于帝纣，十七世中之九世皆为兄弟相继。

《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比九世乱。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

---

①傅是一种户籍登记制。男子成丁登记曰“傅”，从此开始为国家服役。至五十六岁始免。秦简《编年记》，年十七傅，六十免。二十始傅，宽民政策也。

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见《公羊传》隐公三年)

徐中舒先生谓，兄终弟及之制，实乃氏族贵族选举之制，而有母系氏族文化之遗俗也。其说甚正确。故立子之争，涵有宗法权力之争。宗法制下，母以子贵。立梁王，则太后仍为母后，操权柄而贵。立太子，则太子母升为太后，太后成为太太后，其权削矣。

故景帝时立嫡之争，涵有母权残余与父权相争之涵义。汉世尚母权而重外戚。故《后汉书·荀爽传》云："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逆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

洛阳东宫大火，焚毁大殿、城室。

晁错更法令十章，诸侯大哗。

楚王与吴王阴谋欲反。

春正月，景帝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书至，吴王叛。

楚、赵、胶东、济南王，淄川、胶西七国俱反。发兵西向，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史称"七国之乱"。

景帝从袁盎议，诛晁错。七国兵不止。

2月，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平叛，破吴兵。

[以中尉条侯为太尉，击吴楚。曲周侯郦寄为大将军，击赵。窦婴为大将军。屯荥阳。栾布为将军，击齐。]

3月，平七国之乱。斩首十万余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其余六王自杀。

[吴兵攻梁，屡胜。梁孝王城守睢阳。周亚夫到洛阳，得游侠剧孟，大喜，谓得孟若得一敌国。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断其粮道。吴、楚军攻梁不能下，走下邑(今安徽砀山)，击太尉军。太尉坚壁不出。吴楚军兵疲粮尽，引去。太尉追击大破之。楚王戊自杀，吴王濞逃至东越，被杀。吴、楚叛三月而败。胶西、胶东、淄川三王以齐不肯同反，引兵围临淄。汉将栾布等破三国兵。胶西王自杀。胶东、淄川、济南三王被杀。汉将郦寄攻赵邯郸七月不下，栾布会师破之，王自杀。是年，长安列侯封君从军，借款治装，子钱家(放债取息者)以成败未定，多束手。惟毋盐氏以十倍取息，事平成巨富。]

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复封七国之后：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子胜为中山王，徙济北王志为淄川王，淮阳王余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齐王将庐，燕王嘉死。

[何按:吴楚及赵等发动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称:"赵王与匈奴单于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二郡,引匈奴铁骑入萧关,合击长安。"

萧关,地约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是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冲,文帝时匈奴南掠烧毁汉廷的回中宫,即自萧关入。所以,勾结匈奴共同进攻关中是七国反叛总体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七国之乱迅速被平定。匈奴只好放弃南下的打算。]

前四年(公元前153,戊子),4岁。

春,恢复过关用传制度。

4月己巳,立皇子荣为皇太子。

立刘彻为胶东王。

以窦彭祖为奉常。

[奉常即太常,汉之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百官志》:"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太常"二字又作太尚、大尚。汉无极山碑:"大尚承书从事。"尚书,是太尚之书,大尚又称大社,宗社也。太常之职有三(孙毓棠):一是礼仪祭祀,二是庙寝园陵,三是考试及招博士。太常之下有六属官:1.太乐令(乐府前身),2.太祝令,3.太宰令(掌祭品),4.太史令(掌天时置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记国之瑞应灾异),5.太卜令,6.太医令]

前五年(公元前152年,乙丑),5岁。

春正月,始建阳陵。

募民徙阳陵。

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这位公主为王夫人(后来被立为皇后)所生的南宫公主,系景帝第二女,武帝的胞姊。这是汉代以来以真公主出嫁匈奴单于之首例。]

前六年(公元前151年,庚寅),6岁。

夏4月,封卫绾为建陵侯。

[七王乱时,河间王太傅卫绾击吴楚有功,封为中尉。绾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谨无他。文帝临终,嘱太子曰:"绾,长者,善遇之。"故上亦宠任焉。]

时　间		出嫁者身份	出嫁对象	出　处
文帝	1.前176年	汉宗室女	冒顿单于	《汉书·匈奴传》
	2.前174年	汉诸侯王女	老上单于	同上
	3.前161年	汉宗室女	同上	《汉书·文帝纪》
	4.前160年	同上	军臣单于	《汉书·景帝纪》
景帝	1.前156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2.前155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3.前152年	汉景帝女	同上	《册府元龟》卷978

★

桑弘羊生(死于翁公元前80年)。

秋9月,以无子嗣,废薄皇后。

[刘彻金屋藏娇故事当发生于是年。陈阿娇乃长公主窦嫖之女。① 长刘彻一岁。窦太后外孙女也。王夫人谋与窦氏结姻,命田蚡往游说。王夫人出身微末,但生性聪明温和,巧于应付。她塑造了童年刘彻早熟机敏的个性。]

[何按:刘彻母氏出身微贱。故刘彻自幼蔑视出身显贵盛气凌人的诸异母兄长和权贵子弟。与其少年为友的是韩嫣、桑弘羊、司马相如一类贵族弃儿或边缘少年。]

[王美人微言讽告大行请立太子荣母为后,以窥帝意。帝以大行妄议,诛之。]

前七年(公元前150年,辛卯),7岁。

冬10月,梁王武来朝。帝使使持乘舆驷,迎于关下。

春正月,废太子荣为临江王。

太子太傅窦婴力谏不可得,乃谢病免归。

太子母栗姬恚恨而死。

★表据王川著《汉景帝传》。

①长公主,窦太后女馆陶公主。景帝之姊。嫁堂邑侯陈午。《后汉书·皇后纪》:"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藩王。"

2月，免陶青丞相。任太尉周亚夫为丞相，免其太尉。

调济南守郅都为中尉。

[窦太后欲以梁孝王武(景帝弟)为嗣，因大臣袁盎等反对而止。以刘舍为御史大夫，郅都为中尉。都行法不避贵戚，号为"苍鹰"。任济南守时，杀豪强间氏首恶，宗人三百余家皆股栗。]

["始，都为中郎将，敢直谏。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猪突入。上目都，都不动。上自持兵欲入救，都上前阻曰：'亡一姬，复可进。天下所少，宁贾姬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乃止，猪亦去。太后赐都金百斤。及为中尉，为政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嫉之，侧目以视，号曰'苍鹰'。"]

夏4月乙巳，立王美人(姞)为皇后。

丁巳，立刘彻为皇太子。

以中尉卫绾、王臧为太子太傅、少傅。两人皆出于儒门。

[何按：汉初儒家之始兴，乃由于叔孙通。"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至礼毕，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后刘邦过鲁，乃以太牢祭祀孔子。汉初儒者之受重视，以此。于是诸儒之学亦得传授于民间，但并未成为官方学术。官方学术，由于张良、张平等所尊崇者悉为黄老之术，故一直为黄老学也。]

[王臧，鲁儒申培公弟子。"申公，鲁人也，又称申培公。少从齐人浮丘伯[①]受《诗》。申公亦精《春秋》，受谷梁学于荀子、浮丘伯，而传于瑕丘江公，即《谷梁春秋》。刘邦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鲁之南宫。傅楚元王孙刘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七国乱后，申公杜门不出。"弟子自远方受业者千余人。兰陵王臧从之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代人赵绾亦尝受《诗》申公。]

[二人及穆生皆鲁儒生。初与刘交俱受《诗》于浮丘伯。刘交为楚王，以三人为中大夫。吴楚反，申公、白生谏刘戊。戊使二人囚服舂于市。]

[何按：值得注意者，武帝的两位师傅赵绾、王臧皆是儒生，且都是治《诗经》的学者。自孔子始，《诗经》即与政治和政教密切联系。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①浮丘伯，荀卿弟子也。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以《诗》艺作为政治寄托和讽喻的工具。(公羊学,今文家言尤重《诗》。)

汉昭帝死后,昌邑王贺立,旋被霍光废。责其师卜式。“何以无谏书”?或答:“臣以《诗经》三百五篇当谏书,是以无谏书。”使者具闻,得减死论。

儒家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焚《诗》、《书》,即因《诗》可以用作政治讽喻之象征。而《书》,即“周道”,重讲天命与人德,反对暴力与暴政,与秦道(以暴力取天下,以酷法治天下)大不合。儒家尤反对以暴政治天下,故始皇焚之。

儒家讲授有小学传六艺,大学传平天下之道,要学者以天下为己任。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彻少年时即以此言为自任也。]

[“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绾、臧自杀。”]《春秋》的“微言大义”不敢著于文字,正以迫于当世君主“臧权势力”。

擢汲黯为太子洗马,郑当时为太子舍人,二人俱从黄老之学。

[何按:汉初儒法与黄老学之分,不惟学术不同,亦有地域之分别。儒学乃邹鲁学。黄学乃齐学,老学乃楚学。黄学主神仙家言,即方仙道也。法家之学乃郑魏之学,起于子产。子夏传儒,兼授法术,其学成于李悝、吴起,再传于商鞅、荀卿、韩非,而尊盛于秦。

汉兴以来,以叔孙通辈之提倡,儒家势力已渐养成。武帝少时主学儒家,兼学道、法家言。其成年后治国乃以儒家董仲舒、公孙弘一派公羊今文经学为本,治术则兼行法家刑名,养生则亦杂信神仙黄老,并未尽废百家言也。]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主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郑章、王生、黄子、杨王孙等,皆宗仰之。东方朔戒子,亦有“首阳为拙,柱下为工”的话,是亦宗尚黄老之学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其意以其余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并致其不满之词;而独为推崇老氏道德,谓其能具有五家之长,而去其所短,且又特举道家之“指约易操,事少功多”,与儒者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两两相校,以明孔不如才。

西汉初年道、儒两家的斗争,不但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斗争。所以司马迁有“世之学黄老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的话。就事实来说,汉高祖时代自“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惠帝、吕后时代“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文章时代“好刑名之言”。武帝未即位以前,因“窦太后又好黄老之

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武帝即位以后,因"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以刘舍为御史。

中元年(公元前149年,壬辰),8岁。

关西地震。

夏4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齐儒辕固生治《诗》为博士,与黄老派学者黄生廷辩汤武革命事。辕固生面折窦太后,贬讥黄老之道曰"此(一)家人言耳"。太后欲杀之,为景帝所救。

[何按:汉初儒老之争,非单纯观念之争,而有重大现实政治之涵义。其所争要点之一,即老子主张不尚贤,而儒家则主张尚贤、传贤。

不尚贤,即听任自然,世官世守,世卿世禄,不变革贵族自然而传递的政治特权。

尚贤、用贤,即禅让制,主张实施权力财产调整(改制)与重新分配。意识形态斗争下掩藏着关于汉初诸王诸侯及世袭贵族制度合法性的重大辩论。黄老之学,汉初世袭贵族之学。儒学,游士寒素文吏之学也。老学主张顺应之道,儒家主张变革之道。故刘彻欲大有为,尊君权抑贵族权,乃弃黄老之道而采尊儒术也。]

[《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学,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语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勿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默,亡(无)以复罪。

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召固,以贤良征。诸儒多嫉

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年已九十余矣。

公孙弘亦征,固仄(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齐以《诗》显贵者,皆固之弟子也。]

[清河是窦太后的故乡。辕固就任清河王太傅不久,便借口生病,辞去了职务。

汉武帝即位后,辕固又以贤良被武帝征召。但是,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然而,他的秉性并没有改变。他常常教诲年轻人,要'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汉书·儒林传》)。]

[窦太后指儒学为'城旦语',本于秦之典故。李斯议焚坑疏云:'诗书百家语者,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故云。"]

[窦太后要求景帝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景帝只得在政治上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减轻百姓的田赋要求官吏不能夺"女红之利";在法律上进一步宽减刑罚,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崇尚黄老思想,将黄老思想作为社会的核心思想。正因此,景帝时的西汉社会在十分宽松的政策环境之下发展。]

["革命"学说,当导源于孟子。我们都知道孟子是"民本主义"者。他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既主张贵民而轻君,所以当君主严重违反人民意志、人民利益的时候,他便毅然地主张"诛放"(杀戮放逐)。《孟子·梁惠王》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五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喊捉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是和孟子齐名的儒家后劲,虽然他已改变孟子的轻言为尊君,但其贵民思想仍然是同孟子相同的,世俗之论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

中二年,(公元前148年,癸已),9岁。

2月,匈奴入燕侵掠。

[景帝闻报,下令中止与匈奴和亲,并命令边郡吏民予以抵抗。在汉郡抗匈奴战斗中,曾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名闻天下的卫尉李广屡立战功。李广,秦名将李信之后也。]

3月,临江王刘荣坐侵太庙地,3月景帝下诏征召之,命中尉郅都审案,临江王自杀。以太后怒故,帝免郅都中尉,旋改任雁门太守。

[何按:景帝以小罪任酷吏逼死刘荣,实欲为改立刘彻扫清障碍也。]

[临江王囚,欲得刀笔为书谢上,郅都禁吏不与。窦婴知之,使人与之。临江王作书谢上,因自杀。]

4月,立皇子越为广川王,皇子寄为胶东王。

7月,更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

9月,梁王恨袁盎,遣刺客刺杀之。并刺杀反对立梁王之大臣十余人。

景帝究治其罪,梁王客羊胜、公孙诡引咎自杀。

中三年,(公元前147年,甲午),10岁。

冬11月,罢诸侯国御史大夫官。

春正月,废皇后薄氏死。(注:据《景帝纪》臣瓒曰。)

夏4月,禁酤酒。

免周亚夫丞相,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以卫绾为御史大夫。

立皇子乘为清河王。

匈奴数掠扰汉地。景帝命中尉魏不害率车骑(骑兵)、材官(步兵)驻扎于代、高柳(今山西阳高县)等地,为备。

春,匈奴内共相杀。匈奴王子於单率部属来降。

9月,蝗灾。

11月庚子日,景帝封匈奴王子于单为安陵侯,户一千五百。此举打破了刘邦所定"无军功不得封侯"的祖制。

中四年(公元前146年,乙未),11岁。

4月,建德阳宫。

中五年(公元前145年,丙申),12岁。

立皇子舜为常山王,以《诗经》博士韩婴为王子傅。

5月,封王皇后兄王信为益侯。

8月,易诸侯国丞相改名为相,从此令诸侯王不得治国民。由汉廷为置长安。

司马迁诞生。

[注:一说迁生于武帝建元6年,即公元前135年。王国维谓当以本年为是。)迁

乃司马谈独子。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司马氏上承重黎祝融,在秦为名将世家,乃世袭而于汉初没落之贵族也。至谈、迁之世,世家已没落,亦成为布衣游士。]

[一是主张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为公历纪元前一三五年;一是主张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为公历纪元前一四五年。史记自序说:迁父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而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又当孔子作春秋后五百年,因此司马迁便论次功臣世家贤士大夫之业,而作史记。索隐在“迁为太史令”一语下说:“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案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末这为太史令除六百石之“三年”,明是元封三年了。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若上溯其生年,应是武帝“建元六年”。这是照索隐的推算而得出的。裴氏集解说:“李奇曰:迁为太史后五年,适当武帝太初元年,此时述史记。”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从裴氏集解诠释本文说,是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作史记。从正义诠释集解以明本文之义说,是司马迁年四十二岁时,适值太初元年,而始作史记。要从太初元年上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这正是照正义的说法推算出来的。这两种说法,相差十年,自然不可并存;其中必有一个正确,一个错误。]

匈奴东胡王卢它之(其父卢绾原为刘邦重臣,封燕王)来降。景帝封之为亚谷侯(封邑在河内郡),封户1500。

中六年(公元前144年,丁酉)13岁。

冬10月,梁王入朝。求人侍皇太后,不许,归国。

2月乙卯,行幸雍,祭五帝。

4月,梁王死。7月,追谥孝王,窦太后极悲愠。

[王为窦太后少子,有宠。赏赐极多,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筑东苑,方三百余里,扩建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喜招揽文士,淮阴人枚乘、吴人严忌、齐人邹阳、蜀人司马相如等都受礼遇。梁国四十余城,孝王死后,分梁地为五小国(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以孝王子五人为王。]

[“孝王死时,财物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足。”]

成阳共王、汝南王死。

夏,改官制官名。

[此前,汉官制官名皆仿秦制,而袭其故名。景帝欲开新气象,乃命廷尉改称大理,将作少府改称将作大匠,主爵中尉改称都尉,长信事改称长信少府,将行改称大长秋,大行改称引人,奉常改称太常,典客改称大行,治粟内史改称大农。]

6月匈奴入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至武泉(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入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取苑马而去。

[何按:此次匈奴入寇,汉军吏卒战死者达两千余人,是景帝在位时期,匈奴人入汉境劫掠规模最大的一次。景帝闻报,派遣了"中贵人"跟随名将李广训练军队,以抗拒匈奴。此时,受景帝任命的另一位著名将领程不识也在边界战备中立功。]

减笞数,并改笞背之刑为笞臀。

后元年(公元前143年,戊戌),14岁。

正月,下平冤狱令,赦天下。诏允审判不服者可上诉,直至廷尉。

条侯周亚夫因小过下狱,绝食5日,呕血而死。

[何按:注意此二事,可体现景帝治国政策之微妙。待民宽仁,而治大臣则苛严。]

3月,大赦天下。

5月,地动。

7月,乙巳,日食。免刘舍丞相。

8月,以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封建陵侯。擢卫尉南阳直不疑为御史大夫。

[卓王孙与程郑经营铁冶,为蜀巨富。卓氏家僮八百人,程氏亦数百人。卓氏之先世在赵经营铁冶,赵亡,被迁入蜀。程氏亦山东迁虏。舍(今安徽庐江西南)人文翁在景帝末为蜀郡守,兴学校。]

是年,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地震二十二天。

弛酒酤之禁。

后二年(公元前142年,乙亥),15岁。

正月,雁门太守郅都出击匈奴,有斩获。

太后仍因刘荣事憎忌郅都。以太后命,免郅都太守职,以冯敬继任。

太后杀郅都。以宁成为中尉。

[郅都死后,长安贵戚多犯法。是年以宁成为中尉。成执法如郅都,廉则不及。成,南阳穰(今河南邓州)人。郅都为济南守时,成为都尉,与都友善。]

3月,匈奴复发兵进犯雁门,冯敬战死。征车骑与步兵往屯雁门。

以岁歉,禁内郡喂马粟米。

[何按:卫尉一官,《百官表》云:掌宫门屯卫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颜师古引《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若今之仗宿屋也。卫尉所掌必为南军。

卫尉掌南军,而汉制尚有郎卫,为郎中令所领。《表》、《志》及《汉旧仪》,皆列郎中令于卫尉之前,其与卫士虽同为宿卫宫廷之职,所掌又皆宫门内外之事,故马端临《通考》(同上引)以为郎卫与卫士均属南军。南军有郎卫兵卫,掌天子宿卫,北军则止于护城。《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武帝初元元年更名光禄勋。臣瓒曰: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汉制宫卫凡四官,少府、光禄勋、执金吾、卫尉。

郎卫为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为郎者,郎中令掌之(《百官表》);卫士以郡国之材官骑士更给于中者,卫尉掌之(《盖宽饶传》)。郎卫初无定员,更直执戟,宿卫门户,出则充车骑。张骞、东方朔、扬雄皆以执戟为郎。

郎者,廊也。通道警卫曰郎卫。]

后三年(公元前141年,庚子),16岁。

正月甲寅,太子行冠礼。

下诏勉农重农。

[令郡国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征发人民采黄金珠玉。]

正月甲子,孝景皇帝崩于未央宫。卒年48岁。景帝体弱多病,又好色,多内宠,纵欲不止,故早逝。

[何按:文、景有清静恭俭、安养天下之称。《汉书·食货志》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母马)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传)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如仓氏、库氏)。"]

2月丙子,太子刘彻即皇帝位。

2月癸酉，景帝葬阳陵。

尊祖母前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皇后母王氏为皇太后。（王太后凡立25年，后景帝15岁，于元朔3年崩，与景帝合葬阳陵。）

3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阳陵。三月，尊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封田蚡、田胜为列侯。臧儿初为槐里王仲妻，生太后。后改嫁长陵田氏，生蚡及胜。”（荀悦《汉纪》）]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辛丑），17岁。

10月，以“建元”为年号。中国历史从此以年号纪元。帝王以年号纪元，创始于武帝。

[赵翼《廿二史札记》：“古无年号。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

[何按：建元寓有创始之意，表明武帝就位初始即有锐意变革之壮志也。司马迁后来评论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

又，赵翼认为：“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异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乃“元狩”后重建嘉号，追记其岁年也。”

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

[汉高祖11年下“求贤诏”：“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之不交故也。今贤人已与我共平定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武帝求贤意亦仿高祖也。[①]

《东方朔传》：“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待以不次方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

---

①贾山《至言》：“秦始皇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无养老之义，无辅弼之士，无进谏之士。”

[何按：武帝之招贤，意在复古选贤之政也。《周礼·乡大夫》：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国语·齐语》：“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好好学，孝慈于父母，联惠后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武帝命乡举里选荐贤良方正及孝廉之政，意当本此。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是能吸收被统治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它的统治越是巩固。”][1]

初次召见董仲舒。

[《资治通鉴》记武帝于本年召见董仲舒亲自策问。董仲舒乃西汉公羊春秋一派文经学之代表人物。其学兼采墨子“天志”及法家经世致用治国之术，甚为武帝所重视。

“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谨按《春秋》以观天人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灭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异以惊恐之，尚不知变，而后伤败乃至。自非大无道之世，天欲尽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强而已。’‘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工)具也。’天子善其对。”

时董氏年已近六十岁。]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生于高帝九年，以治《春秋》公羊学，孝景时征为博士。《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制曰“可”。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从政致仕之术。自此令始，学百家言者只能为杂家立说，不能作求仕之道。

此即“独尚儒术”之意。但并非灭废百家或不许民间研习百家也。国家官方之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非正统意识形态之区别，亦由此为始。

初征以公孙弘为博士，董仲舒为江都相，严助为中大夫。

[何按：至此，武帝乃一改汉初之宗黄老轻儒政策。]

(《史记·黥布传》记：高祖语随何，“为天下安事腐儒？”郦食其传记“高祖好溺儒冠”。陆贾传记“陆生时好前称说诗书，高祖骂曰：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汉书儒林传记“孝文本好形名之言。及至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博士具官，未有进者。”)

---

①《资本论》第3卷第780页。

举行皇帝大婚大典，册立陈阿娇为皇后。

2 月，行三铢钱。

夏 4 月行新政。诏立学校之官。

5 月，诏修雍之祠，开立乐府，征各国及民间乐曲入礼部。

[《汉书》卷二二："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赦吴楚七国奴输在官为隶者。

6 月，奉窦太后命，免丞相卫绾，退老归。

[荀悦《汉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刑名纵横之术，徒乱国政，罢之。"春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民年八十年二算，九十复甲卒。行三铢钱。

夏四月，诏：民九十年已上复子若孙，令奉供养。

五月，诏修山川之祀。]

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遂欲全面推行新制及儒家政治。

以桑弘羊为侍中，入宫主司财计，时年仅 13 岁。

[《食货志》："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善心计，年十三傅中。"洛阳乃周公所建居殷贵族之名城，在汉代亦为通都大邑。"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业最为发达。吕不韦失相后曾谪居洛阳。贾谊亦出身"洛阳少年"。]

秋 7 月，诏罢苑马以赐贫民。

议设立明堂，以朝诸侯。

为此征询百官及博士议。然皆不明古之明堂礼制，乃遣使征鲁申公。申公，宿儒，曾从学于荀子。通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从古制。申公乃赵绾、王臧之师也。

[申公，儒林列传作申培公。《集解》引韦昭曰："培，申公名。"]

[儒林传："武帝初即位，王臧乃上(尚)书宿卫。[①] 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引)及代人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用尊皇威也)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以迎申公。"]

①上书当作尚书，堂阁之号。

［何按：立明堂之制，欲以订诸侯朝觐之礼。盖武帝登基年少，诸侯王或为叔，或为从兄、兄长，蔑其年少而不尊。

建明堂朝觐之制，序上下尊卑之礼，有尊隆王权之作用。因之，要不要立明堂，此遂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之一大焦点。

又儒家尊周礼，尚宗法及父权。而道家法殷礼、宗法不明、母权舅权为重。此亦当时儒道间之一大争端。立明堂即立礼法，故明堂之制乃为当时政治斗争之焦点。］

［《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

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武帝即位之初，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

是年，内史宁成得罪下狱。旋逃去，在乡租陂田数千顷，役使贫民数千家。数年，积资数千万。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壬寅），18岁。

武帝于本年始，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新政。计其大者有：

（1）令列侯归就国；

（2）除关传，禁行旧制，各国交通可自由出入；

（3）仿周礼立汉制；

（4）贬谪诸窦宗室"毋（无）节行"者，削除其贵族属籍。

［《通鉴》记："魏其、武安侯俱好儒术。令列侯就国，除关（除割据）。以礼为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宗室，皆不愿就国。以故，毁新政日至窦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

冬10月，窦太皇太后数次折阻新政。御史大夫赵绾上书，请"诸政事毋奏东宫"（东宫，即窦氏太皇太后所居地）。太皇太后闻之大怒，密访绾、臧阴过以让上。遂下

狱,皆自杀。

继之而废王、赵辈关于立明堂等诸议。王臧乃武帝为太子时之师傅,帝竟不能保全之。王臧早年与赵绾同受《诗》学于鲁申公。申公亦得罪遭谴而免归故里。

[《汉纪》:

二年冬十月,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皆免。

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死。

蚡、婴、绾、臧皆用心,欲兴太学,建立明堂以朝诸侯。

而婴请无奏事太皇太后,又罢窦氏子弟无行者,绝属籍。故毁谤日至。(何按,《史记》谓赵绾、王臧。此谓婴。)窦太后怒,皆抵之罪。明堂遂不立。]

[《汉书·郊祀志》:"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殊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阴伺赵绾等奸利事,按臧、绾。臧、绾自杀,诸所兴皆废。"]

以太皇太后命,免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去官家居。

太皇太后乃以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

3月,以太常柏至许昌为丞相。(太尉一职空缺不置。兵权乃由窦太后自主之。)

始置茂陵。

[《汉纪》: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

三月已未,太常许昌为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

徙郡国豪杰于茂陵。

河内郭解在徙中,卫将军为言解家贫,不应徙。上曰:解布衣,极至使将军知之,此不贫也。(按:此纪有误。时卫青未为将军。《史记》记为解说项者乃王太后。迁徙郡国豪强事在元光元朔年间也。]

至此,武帝建元新政皆废,此乃"壬寅"间一次政变也。事变后,武帝易服外出游猎。不复问国之大政。

纳卫子夫为夫人。

[《汉书·外戚传》:建元二年上巳节,武帝拂霸上,过平阳公主。(主乃武帝姊,平阳侯曹寿妻。寿,曹参曾孙也。)主引见所侍美人,皆不悦。

既饮,讴者进,帝独悦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出欢甚,赐平阳公主千金。主因奏子夫入宫。

子夫上车,主抚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入宫岁余,以陈后妒,为宫婢,不复见幸。

后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召见其兄卫长君、弟青侍中。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据,遂立为皇后。]

以卫子夫同母弟卫青为"建章监"。(官名,武职。即皇宫侍卫队长。)旋迁太中大夫、典护军。

[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陈皇后,长公主女,无子,妒。长公主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宫,未知名。长公主执办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

[何按:建元新政仅行一年而失败。当时诸窦氏外戚及诸刘氏宗室贵族暗中向太皇太后提出了更换皇帝的要求。武帝之所以得到保全,主要靠窦氏长公主之迴护。]

[据《通鉴》记:"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渐衰。

母王太后谓帝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公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公主、皇后稍加恩礼。

[何按:以王太后之尊而必须面诫武帝,警示其不可忤窦氏而致"获重罪"。于此言可见当日武帝面临窦太后之下,所处局面之危迫也。]

田蚡以侯家居,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受宠信。数言事,多效。

4月,初置茂陵邑,徙郡国豪强于茂陵。①

[《平准书》:"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任司马谈为太史丞,督建茂陵。

[何按:太史令隶属太常(司徒)。司马氏世为史官,善占星风水之术,故以督造陵寝,掌风水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自述其学术由来云:"太史公学

---

① 徙豪强,没其田产,以其所占田非命(名)田也。所以田产得充为公田,后用以赐封军功得爵者。"命,谓爵命也。命家,谓受爵命一爵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优之也。""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公士乃武帝时二十等爵之第一级,是免徭役成为自由民之条件。

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扬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先世是世家贵族出身,其意识形态亦偏向于道家。]

[又,太史公亦掌天下财计,则相当于今之审计署长。财长事则丞相兼之。如淳引《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付上丞相。”]

以吾丘寿王为太中大夫,主中秘。

武帝与大臣复议晁错案,以为冤案,为之平反。(此乃武帝对诸侯势力的反击与摧抑。)

淮南王刘安献《鸿烈》书(即《淮南子》)(或说献书年为建元初年,不足信。)

[何按:刘安乃武帝之从父。约生于文帝元年(前179),文帝八年封侯。父淮南厉王刘长,为文帝所杀。安为长子,为人多才艺。文帝十六年继父号封淮南王。《鸿烈》此书系统纂述黄老派学术。“鸿,大也。烈,明也。”此书乃当时儒道激烈论争、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之产物也。故太史公言:“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

淮南王安来朝。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廿一篇,“外书”甚众。初入朝,献所作。其书称“欲以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

书中批评:“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主张:“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胡即匈奴,越即闽越。刘安不同意武帝所议将施行之内外政策,此言实即有所针对也。《淮南鸿烈》书原三部,今仅传内、外篇,佚中篇。[①]后刘向订书改书名为《淮南子》,置《诸子略》内。]

本年田蚡与淮南王刘安暗中策划政变事,未果。

[“刘安入朝,武安侯田蚡迎之霸上。谓安曰:‘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以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旦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刘安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付循百姓,谋为叛逆事。”]

---

①《汉书·楚元王传》记: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事,及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刘向父刘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刘向幼而读诵,以为奇。此书即《淮南子》书中篇也。

[何按:当时武帝方18岁,何言"晏驾?"晏驾者,欲废之也。则当时太皇太后及朝野诸王皆有废立之势志明矣。田蚡乃刘彻至亲,亦感帝位之不安,急欲投靠新主。刘安善黄老术,迎合窦太皇太后之心。故田蚡阿附于淮南王,欲求长自保也。由此可见当时淮南王刘安之位尊势大以及刘彻地位之危。]

[《史记》记:田蚡貌侵,生贵甚。景帝晚年,田蚡为太中大夫,蚡善辩有口才,学兼儒墨名法。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蚡弟田胜,封周阳侯。建元初,蚡欲用事为相,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建元元年,卫绾免相,上议置丞相、太尉。蚡从门客籍福说,微言王太后风上,让丞相于窦婴,自居主兵权之太尉。又以为诸侯王多年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屈之,天下不肃。

及交游诸侯。治宅甲诸第,田园膏腴,后房妇女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计其叛。]

[汉武帝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显示出他与先辈们不一样。他首创年号,称为"建元",即位第一年称为"建元元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他这一创建,以后的皇帝老儿没有不效仿的,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束,这才算告一段落。

武帝临政的第一件政务,就是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一月向全国发出通令: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向中央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卫绾针对天下贤良对汉武帝说:"重用贤良直言之士固然有各种益处,但是皇上不应任用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有学问的人。因为他们的思想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

在中国思想史上,申不害是注重权术的政论家,商鞅是法家,韩非则是将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商鞅的法作总结和归纳的思想大家,苏秦、张仪是研究纵横术的,是国际关系专家。

卫绾害怕苏秦、张仪的思想会造成各诸侯国力量的集结,终而联手反对中央。他意在重儒。

汉武帝采纳了重儒建议,并加以实施。武帝也喜儒学。但是,他对儒学的厚望,却落入失望的圈套。

这年秋天,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上书武帝,请武帝设明堂,以鲁申公为师,以朝诸侯。

武帝求贤若渴。同意了王臧、赵绾的请求，派人带了许多礼物，并以很高级别的礼节去聘请申培。所谓“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

申公，鲁人，姓申名培。少年时，他与高祖刘邦的小弟楚元王刘交共同跟从荀况的门人浮丘伯学《诗》，实是同窗好友。刘邦经过鲁地，还特别召见了他。文帝时，申公是当时学《诗》最有成就的，故被授予博士。申公治《诗》自成一家，从而申公所创《诗》学，在历史上称之为《鲁诗》。景帝时，儒学不倡，申公也归鲁，退居家教，跟从他学习的有上千人。

王臧、赵绾都是申公的学生。武帝即位后，他们就极力推荐鲁申公。

鲁申公被召来之后，武帝立即召见他，询问申公治国、治乱等国家大事。申培此时已届高龄，80 多岁了。一生的风风雨雨，使这位儒学大师长了些许道家风骨，他缓缓地说：“管理国家的人应该少说多干，多做实事。”

武帝深感失望。但既已招致，也不好不用。于是武帝就任命申培为太中大夫，而并不重用。

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建议武帝：皇上以后应自己做重大政治决定，不要万事皆奏明窦太皇太后。当时，郎中令王臧也支持这个主张。

窦太后知悉此事后，很是气愤。她即把汉武帝叫去，责备他说，你还想再扶出一个新垣平？新垣平，文帝时因欺骗皇上，罪名谋反。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 163 年）被诛杀。

武帝受祖母的气，又对儒士们的一些言行也不甚满意。于是，他听从窦太后的决定，撤了王臧、赵绾的职。二人自杀。

当时附议、支持此事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虽然他们都是皇亲国戚，也都不能幸免于难，皆被免去了职务。]

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己酉），19 岁。

春，河水决，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帝入终南山射猎，自称“平阳侯”。践踏农田，民皆呼骂，如跋扈子。

[是岁，上始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扶风槐里县）南猎长阳，东游宜春。与左右卫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称平阳侯。（平阳侯曹寿尚帝女弟平阳公主，见恩宠。帝以此暗结功臣子弟以制诸窦也。）常入南山下，亲射鹿豕狐兔。]

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建上林苑,傍南山而西向,周袤三百里,设离宫七十所,苑中饲养百兽,供皇帝秋冬射猎。

罗致文士司马相如、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东方朔等。并伺左右,每令与大臣辩论。

[何按:此时汉武帝之所以四出游猎,大建上林苑而广招文学之士,一是示诸窦诸刘政敌以驰骋游猎失志之态,二是为了争人才,造舆论。时诸侯皆好养士,尤好文学之士。(注意:"文学"概念今古不同。文者,文字也。学者,术也。汉言"文学"即今言"学术"也。文学之士即通文辞,有学艺之士。)

前此,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山东游士莫不至,如齐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汉书》卷45)公孙诡能文,作《文鹿赋》诵梁王谓:"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司马相如旧亦先从梁王游,作《子虚赋》。其辈梁王死后皆为武帝所招揽。]

[梁孝王好园林艺术,曾筑东苑,又作菟园,方百余里。①(《史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作菟园。园中有白石山(一作百灵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凫渚,宫馆相连,延亘数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靡不毕备。王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西京杂记》)

武帝造上林苑,仿之也。命枚乘作"菟园赋",相如作"上林赋"。

《三辅黄图》:"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广汉后有罪,诛。其地没入为宫园。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

上林苑中以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麋兔无数。飞具缯缴,以射鸟雁,应给祭祀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

上林苑中天子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徒置[苑]中养鹿。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汉官旧仪》卷下,页八)

---

①魏晋以前,除了帝王宫殿和苑囿以外,私家是很少有园林的。梁孝王的菟园是第一个。《史记》说:"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菟园大概就在东苑之内。

《说文》:"园树果,圃树菜也。"《周礼》:"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疏珍异之物,以时而藏之。凡祭祀宾客,供其果疏。"

“上林宛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兽。”（《续汉书·百官志》）

“西郊有苑囿，林麓薮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百余所。”（《三辅黄图》卷四）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四边。以郎为苑监。宦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汉仪注》，《三辅黄图》卷四引）]

帝勇武有猛力，于上林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乃作赋谏之。

［何按：《淮南子·主术训》：“桀之力，制觡伸钩，索铁胁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鳄）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龟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此言似即影射武帝为桀，而自喻为汤武也。］

［《管子·宙合》：“贤人之处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避罚，静默以谋免，避之也。夏之就清，冬之就温也，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武帝嬉戏上林，似采此道以避太皇太后。］

春，黄河决口，大饥，人相食。

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赐予“命田”）

7 月，闽越攻东瓯，告急于汉。

天子问计于田蚡。时田蚡虽以窦太皇太后之命，去官家居，但“太尉”之官号似仍未去。田蚡曰惧得罪太皇太后窦氏，乃云：“不足与救。”刘彻鄙之，云：“太尉不足与计！”

武帝乃与严助等相谋，阴遣严助发兵救东瓯。

［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独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

建元 3 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

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拒，不为发。助乃斩郡司马，晓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闽越引兵罢。］

［何按：此是建元新政失败后，刘彻所作为之一件大事。所谓“不欲出虎符发兵”，诡言托词也。当时虎符实并未在武帝手中。盖其时田蚡已废黜家居，太尉之职空缺。兵权在太皇太后及诸窦手中矣。借此，武帝乃取得征用天下兵之权，从而避开太皇太后之控制。］

9月,丙子晦,日食。

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史载:武帝招贤前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等多人,并引在左右。是时帝将欲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故国家急需人材。

上常令严助等与朝廷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帝特优礼其亲幸者,如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之属。相如有宿疾(焦渴症即糖尿病)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严助与寿王特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发布招募"使月氏勇士榜文"。

郎官张骞应募出使西域。

[何按:张骞此行主要使命是寻找大月氏,并探查西域之地理人文情况,为打击匈奴作外交准备。]

新建期门军,以卫青统帅之。

[何按:此又一件大事也。更改军制,任命卫青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新军。至此,表明刘彻已开始谋求恢复其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

[《汉武帝内史》:"建元三年,仲春,太后王氏偕帝登长乐宫游台,帝感极而泣,慷慨作歌。"

武帝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者以千计。上择其优异者宠用之。此后立为辟察举制,实际是有意培养一个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以事功封侯,形成后来之庶民封侯,布衣卿相。从此之后,读书士人出身之官僚阶层,乃形成古典社会中一个新阶级,而与世官世禄之贵族阶级成为制衡。]

[西汉初年,汉帝国之统治集团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是由创建西汉王朝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的,其主要成员,乃是刘邦军事集团的将校吏卒及其家属。这个社会阶层的中坚约有60万人,合其家属约30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0%左右。由于高帝五年诏等一系列优待军吏卒的法令之颁布及实行,他们得到了大量的爵位、田宅财产及特权,形成了一个以军功爵名为基础的,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雄厚的经济力量,高等的社会身份的新的统治阶层。

汉代行政为郡国制。西汉初年,以旧秦国之领土(关中)为基础的汉王朝与关东各诸侯王国并立,共同组成一种四级制联合帝国。中央政府所在的汉王朝,其政治权力的重心,在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即所谓三公九卿。诸侯王国亦皆各有其政府,其政治的运作,则以王及国相为中心。此以下,汉王朝及各王国之地方行政,皆为郡县制。各郡以郡太守为中心行政,其下则为县乡亭里。

从高帝到文帝末年的近五十年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支配着汉朝政权。据统计,其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在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太守三者之和中的占有率,均在50%以上,即高帝期的97%、惠吕期的81%、文帝期的50%。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势力,乃随时间之推移而逐渐衰退。其衰退,大体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即变动首先发生于政权下部,渐次波及于上。具体而言,该阶层支配汉朝中央政府最为稳固长久,直到景帝末尚占46%。在郡守中的占有率,开始就较低,衰退速度则较快,高帝期88%,惠吕期60%,至文帝期间,下降至40%,可以说已经不居支配地位。诸侯王国的状况比较特殊,文帝期间,该阶层在王国相中所占之比率突然下降(86-29%),这种突变反映了其间汉王朝之政策有重大变动。就其整体及部分的变动幅度而言,都以文帝期间较为引人注目。

秦有以军功为吏——即以有军功的军人补充吏员之制度。此种军吏与文吏相互补充的制度,皆为汉所继承。汉初,长年战乱之后,不仅中央、王国、郡之主要职位由军吏担任,县之主要职位,乃至郡县掾史乡亭里之吏也以军人出身者为多,应是没有多大疑问的。汉初之文职官吏常可世袭。

《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所载王嘉上疏中说,"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

景帝期,军功受益阶层出身者已从郡太守一职中消失,稍早于此,在文帝后期左右,他们就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县及县以下的官职的支配。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乃是在汉初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随着该社会阶层的衰退而出现的政治真空,将由谁来填补?汉武帝设立地方推选贤良及中央考试制度,以儒学经义立为取士之标准,培养了一个出身儒家的士人官僚集团。

汉代官僚,从其来源,即所以出仕任官的途径而言,不外亲缘型和贤能型这两种类型,即所谓"亲亲"、"贤贤"二途。亲缘型,即凭借与皇室的血缘婚姻关系而出仕任

官的类型。进一步可分为两类，即宗亲（皇室外戚）和宦官（拟亲缘）。贤能型，即凭借个人能力而出仕任官的类型。个人赖以出仕任官的能力，就汉代而言，从选举类的名目当中，如从军、明法、明经、德行、文学、出使、治河、射策等，即可见一斑。

持有各种可赖以出仕之术学的人，称之为士，贤能型官僚则简称为士吏。汉代士吏之中，主要有三大子类，即军吏、法吏、儒吏。]

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归降，处庐江郡。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甲辰），20岁

南越王赵佗死，孙赵胡立。

六月，大旱，有风赤如血。

擢江都王相郑当时为内史。（《百官公卿表》）“建元四年，江都相陈人郑当时为内史，每候上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其推毂名士，常以为贤于已。”“举荐桑弘羊，以赀为常侍郎官。”“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

[集解：《汉仪法》：“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以赀财多得拜为郎。”

[《食货志》：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子。孔仅，南阳大冶之子，弘羊，洛阳贾人子，皆郑当时进言之。]

[王利器考证：桑弘羊（-255-- -80），洛阳人。

弘羊出生于景帝二年（-155）。景帝后二年（-142），以赀入侍中。“获禄受赐”。为郎士（訾，万钱）。建元四年，郑当时入侍中。荐之为郎官。“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大汉取士于奴仆”（《金楼子·杂记》）盖武帝用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弘羊于天汉元年为大司农，时年五十五。后元二年，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时年六十八。始元六年以御史大史论议盐铁事。元凤元年被霍光以逆谋见害，终年七十五。]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乙巳），21岁

置《五经》博士（五经：易、诗、书、礼、春秋）。

（置“五经博士”，表明武帝再度推行重儒政策也。）

[何按:五帝所立五经,皆为今文。经文释义,本于子夏、荀子一派学说。不久,复有古文经书及传授出,形成古文学派。

儒家经典,内容复杂,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不是成于一个时代,很容易引起争论。到两汉末年,争论逐渐达到高峰,有所谓经今文派和经古文派。今文派和古文派中,又各自有派,尤其是古文派中的小派特别多。就经今文和经古文两大派而言,历来有学者加以研究。]

[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尊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

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

秦焚书,书藏民间。至汉初,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田何传《易》,伏生(伏胜)传《书经》。《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关于《书经》的记述,有两种,一本《书经》是口传的。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晁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另一本是鲁恭王在孔子故居中发现的古文传本。

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谷梁两家。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汉时各经都立博士。博士类似乎顾问。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伏牛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经》博士也有三家: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传礼的有三家:大戴、小戴、庆氏。《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周礼》从河间献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左传》由张苍所传。《公羊》、《谷梁》两传都写成书,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谷梁》立博士。

汉朝的博士,类似现代国立大学中国家所聘请的教授。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

《书》博士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

《诗》博士三: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

《礼》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

《春秋》博士二: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

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传》。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并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王正月。”则统一了起来。

《公羊》传又说“复五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

行三铢钱,行新铸半两钱,以此统一币制。①

[何按:汉初诸侯国有铜者皆可自铸钱,富民亦可私铸。币制混乱,轻重不一。至此国家收回金融权,统一币制。]

5月,大蝗。

秋8月,广川王、诸河王薨,国除。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丙午),22岁

彗星见。

太皇太后病危。

淮南王刘安见彗星以为“兵当大起”。乃私“治军械,积金粟”,欲乘天下有乱而起兵。

春3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庙便殿灾。上畏惧,为之斋戒素服五日。

5月丁亥,窦氏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6月癸巳,免许昌丞相职,以田蚡为丞相。

(“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

---

①《史记》将相名臣年表谓本年行三分钱。“集解”徐广曰:“《汉书》云半两,四分曰两。”

[“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

[田蚡聚财揽权，多任私属为重臣。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乃稍逊。”]

8月，闽越击南越。南越使求汉援助，武帝命大行令王恢等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

闽越王弟杀其王骆郢，汉兵还。

淮南王上书反对武帝用兵闽越。

遣司马相如入蜀告谕宣民。

[司马相如，蜀人。妻卓文君。卓氏先祖，蜀中之巨富，以盐铁致富。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

是岁，以汲黯为主爵都尉（司授爵事）。

[黯为人耿直，武帝为太子时，曾任太子洗马。曾当面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可得乎？]

任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封东越王。命唐蒙人夜郎。

[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奉命出使夜郎，招抚多同。多同的夜郎原处于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对中原不甚了解。问特使“汉孰与我大”？其实夜郎仅有汉一州之地那么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比喻人妄自大。唐蒙对多同晓喻大汉“威德”，并赠送丰厚礼品，双方约定在此地依汉制置吏。唐蒙回长安后，汉朝就在此设置犍为郡，汉对西南夷的管理也从此开始。]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丁未），23岁

夏4月，赦天下，赐民丧子者（无子者）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诏天下献书。命郡国举孝廉者为吏。每岁由诸州举秀才，成为常制。

[刘歆《七略》：“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纳秘室之府。”]

5月，诏贤良曰：“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生,广川董故庄(即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少治《春秋》(公羊学),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复诏举贤良、文学,亲策之。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得仕。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武帝诏曰: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何行可以率先帝之洪业休德?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略引)

《武帝纪》: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广川人也。景帝时为博士。"及其去位居家,绝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有大议,使者就其家而问之,国家大议多仲舒发生。"

董氏传详录此次对策谈话。略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主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复出焉。)"①]

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上书应对者百余人。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②

(4)限民命田,抑制土地兼并;

(5)以儒学思想统一政治思想。

["复召董仲舒对策,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又建议"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何按:儒言所言之"名分",以今语之即"所有权"(产权)之明晰也。所谓"名田",即田土之私有化。井田为公田。名田为私田。《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于上曰:"古井田法虽难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

①董仲舒对策事,一曰在建元初年(通鉴),一曰在元光五年(《汉书》),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及《吕思勉读史札记》"汉儒术盛衰"条。窃以为建元,元光各有一次。

②天人感应学说,非孔门儒家所固有,而乃是源于墨子之天志明鬼神之论也。

以赡不足。”上武帝书云:“(战国以下)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史记·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及僮仆,皆入之于官。”《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贞《索隐》注:“谓各随其家爵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

[何按:董氏之天人感应论实际是一种试图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其流弊成为言说谶纬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行为的舆论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的肆意和无上威权。

这个系统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又,武帝重用迷信方士,也与天人理论有关。天人理论用灾异吓唬皇帝。方士则称可用方术消弭天灾,消灾解难,助皇帝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故武帝一度多引方士之流为国师,直到死前方彻悟受骗而尽驱逐之。

武帝与董仲舒所讨论的第一问题是天人关系,即天命与自由人意(帝王)之关系。若必尊天命,则事事无为,一切顺应天意。若人意可选择,则当求大有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氏以天人感应提出“天命人为,天择人为”的一套新理论。主张:“刑罪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繁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何按:大,读为动词)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何按:径也),古今之通谊(何按: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

书》本传）

所谓除儒学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不使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主张禁绝百家言论也。武帝采纳其义，独尊儒术，但并不废百家杂言。]

[《汉书》：董氏对策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易王，刘彻异母，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之，王敬重焉。]

[何按：董仲舒学术，实本于齐学。齐鲁皆宗儒学，然学派有所不同。齐学中杂管子务实世用之术及墨子天志明鬼经世思想，又有邹衍五德终始之论。鲁学则宗纯儒以礼乐典章之学为重也。齐学者，今文之始。鲁学者，古文之始也。]

[《汉书·儒林传》：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证，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上卒用董生，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武帝大兴。然太子则不甚好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学，以问丞相韦贤。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谷梁之学重训诂，是古文学派之方法也。]

秋，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习胡事。提出拒和亲，倡议以兵击之。

韩安国以为“行数千里与之争，人马疲乏。不如和亲”。上乃许之。以宗室女子嫁人匈奴。]

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面对单于王廷）

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护卫长安）备边练兵。

[盖匈奴政属略分为三部：中央为单于庭，东为左贤王庭，西为右贤王庭。单于庭与左右贤王各有份地。匈奴乃游牧军事奴隶制帝国。汉初以来，虏汉地人民为奴婢者，几近百万。其军事力量匈奴左王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柔）以东，接岁貉、朝鲜。右王居西方，直上郡（陕西肃施）以西，接氐羌。而单于王庭在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内蒙绥远）。（控弦猛士）30万，汉人为奴隶者相当于其总人口之泰半。[1]

[“汉时匈奴王廷直代、云中。左方王将直上谷，以往至岁貊、朝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接月支、氐、羌。此其大略也。”（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①《史记》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钱穆估计其总人口不出一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其人众不能当汉一郡，而掠汉奴约百万。

以司马谈任太史令。

[何按:本年,乃汉武帝于建元改革失败之后,重掌权力而对内政外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之年,可称“元光决策”。

汉武帝之政略设计,一来之于汉初之贾谊,二来之于董仲舒。贾谊乃荀子隔传弟子。(荀子传《左氏春秋》于张苍,张苍传贾谊。)①

贾谊上文帝之“陈政事疏”,曾提议“更化”、“改制”。更化即悉更秦法,变法也。改制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生传》)。

贾谊还向文帝建议:(1)裁抑诸侯王国,(2)抗御匈奴(此二条为晁错建议汉景帝实施),(3)教育太子及王子(针对于当时贵族列侯家政之腐败),(4)尊礼大臣,(5)阐扬文教,(6)转移风俗(钱穆谓: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无自而美)。故武帝时代复古更化之变制,贾谊开其先声。

董仲舒建议武帝:(1)立五经博士,罢退百家杂学。(2)为博士立弟子员,启以学入仕之途。(3)设郡县察举官吏之制,(4)禁官吏兼营商业,(5)限民名田,强化土地之国有民营之制,杜塞土地兼并之途,(6)废除奴隶制。“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食货志》)

董仲舒闲居在家,凡朝廷有大议,武帝常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武帝命张汤受令更改制度律令也。]

鲁恭王刘余得古文经。

[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包括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何按:据《史记》恭王以景帝前三年徙鲁王,历 26 年,死于武帝元光五年。《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则其作宫坏壁发书,似应在元光年间。故系于此。]

冬 11 月,初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开其议。”

[何按:是为察举征辟制度建为常制之始。此制以才学引民间人士入于仕途。后来不断演变,成为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其基本命意在于举贤用贤,世官世禄的贵族制度遂被破除。]

[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设《春秋》、《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五经的博士。

---

①清汪中云:“《经典叙录》云:左丘明作传以传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张苍传贾谊。”)

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信号:重用儒士的时代来了。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五月,京城长安出现了武帝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天气。万物在这适宜的季节充满勃勃生机,长安的街巷里也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

这几天,京城显得尤其的繁忙。因为汉武帝改元之后,向全国发布了第二个征召贤良的通令。这是一个有为时代来临的预兆。全国各地成百的读书人,紧张地聚居京城的馆驿,等待汉武帝的考试。

所谓贤良,是指在某一方面治学有造诣的大家或饱学之士。他们中有一些人虽享受国家提供的很微薄的俸禄,但都没有现职。贤良是汉代进仕的一种资格条件。

董仲舒也在被征召之列。他接到被征召的通知后,即从家里出发,日夜兼程,奔赴京城,准备接受策试。

董仲舒清楚,这次策试不管从什么角度说都很重要。对他自身来讲,这是一次机遇。他早就是《春秋》博士,但一直未被重用,满腹的抱负至今未被明主发现,无法实施。对国家来说,这是西汉有为时代的开始,它将一改以往无为而治的清明如水的过谦局面,变成一个激进、拓展的大帝国。

这次策试对汉武帝也相当重要。它既是一种标志,也确是新时代的开始。策试虽然已被几代人所使用,但这却是他即位以来真正能按自己的意志来做的第一件大事;接待、考问天下贤才良能之士,以便找到适合的人物帮自己出谋划策。

董仲舒知道,汉武帝想破除先辈"清静无为"的治国宗旨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即位以来,汉武帝一直受到祖母——窦太后的牵制,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用人偏重道家思想家和学道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汉武帝想重用儒家的第一个念头在建元元年,但即刻就被窦太后掐灭了。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不受窦氏约束了。

汉武帝是个志在积极有为、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国举孝廉,以德高者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国征召治国安邦的专家。他在征召贤良的通令中诚恳地说:

……历史上的帝王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怪异诡谲、山崩地震之类的事发生。他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从即位以来,白天从一睁眼就开始谋求治理国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眠,思索着如何去治理我们这

个国家。我就像面临深渊、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在寻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辈们努力实现的大业,才能光大、彰显先辈们创立基业的美德呢? 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可以与尧舜时代相仿、与三王的统治相媲美呢?我深感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业、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这次请诸位来,是倾听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每人根据我出的题目,写一篇政论文。诸位交卷后,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从武帝的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露一手的机会。

策试的结果,董仲舒很满意,写得也很顺手。虽然这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策试时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他总觉得心中有些话还没有表述清楚。

汉武帝在审阅策试文章时,发现董仲舒的文章很对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蜻蜓点水,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有了再次策试董仲舒的意向。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武帝又连续两次向董仲舒提出问题,希望董仲舒具体一点,就一些社会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提供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份殊荣! 从全国各地赶来策试的贤良之中唯独董仲舒一人获得。董仲舒心醉了。他畅其心中所思,就社会中的许多现实问题,都上言不讳地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董仲舒还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推崇儒家生生不息的进取思想,贬抑、罢黜其他各家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天人三策》和《治安策》虽然对西汉之初的作用各有千秋,但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尤其是《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汉武帝一改前代"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积极有为,想成就伟业。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他所求的思想依据和精神支柱。董仲舒提出思想大一统,正可以作为政治一统和社会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

董仲舒的出发点虽然是为巩固封建大一统服务的，但同时，儒家思想却正好摇身一变而成为汉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还是综合吸收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家思想与道、法、阴阳学兼容。

刘向（汉代大学问家）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同上）也有人称仲舒为"儒者宗"，这是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关键人物。

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前就是社会中流行的一股思潮。在石渠阁考试，石渠阁是汉代政府的皇家图书馆，也是学术会所，是皇帝召集天下贤才、专家，集中研讨问题的地方。

汉武帝表现得很谦虚，他志在直接获得较为理论化的、系统的和完备的治国之策。]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戊申），24岁

冬10月，行幸雍，亲祭社神，祠五畤。

方士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遣方士入海求神仙。

[何按：方士之兴，是对天命论之反制也。方士可祈禳灾异，延长人寿，故人主信之。]

任公孙弘为左内史。擢拔主父为大夫，"岁中四迁。"

["主父偃欲因卫将军（青）人荐。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听。乃自行上书阙下，朝奏，暮入见，言九事。八事关律令，一事谏慎伐匈奴。

引《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其议备受重视，遂举为郎中。一岁中四迁。"]

[是时，徐乐、严安亦上书言世务，上召见三人。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何按：时武帝疏远亲贵，急于用人，求贤若渴。）]

夏6月，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伏击大单于于马邑。①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慢，侵盗

①干宝《搜神记》："秦时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季。有马驰去，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马邑，地在今山西省朔州市。

不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议宜击。汉匈数十年之战遂以此为序幕展开矣。]

[吕思勉云:

"匈奴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玁狁'(亦作'俨狁'),或曰'獯鬻'(獯亦作熏作荤,鬻亦作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史记索隐》:"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曰匈奴,荤粥其别名。"《诗·采薇》毛传:'俨狁,北狄也。'《笺》云:'北狄,匈奴也。'《吕览·审为篇》高注:'狄人,猃允,今之匈奴。'案伊尹《四方令》径作'匈奴'。又案《史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荤粥两字,盖系自注,史公非不知其为一音之转也。)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昆,又作混,作绲。畎,亦作犬。又作昆戎,犬戎。《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犬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昆夷也。'案《诗·采薇》序疏引《尚书大传》注:'犬夷,昆夷也。'《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索隐》、《正义》皆引'韦昭曰:《春秋》以为犬戎',足征此诸字皆一音异译。"(《遗文集》下,匈奴名号考)]

(何按:匈奴乃汉时匈奴人之蔑称。[①]日本学者内田吟风云:"匈奴两字古音被拟为 flong–nah,被认为与希腊语 phrounoi 之匈人有联系。4 世纪时粟特人称匈奴人作 xwn,拟汉音为胡。汉字匈奴与 phrounoi,xwn 音近无疑也。"(《匈奴史研究》,日本创元社,1953)

汉时匈奴称"荤允",或荤(读近"玉")。见《汉书》霍去病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史记》三王世家:

"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

[《汉纪》:

"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古曰淳维(混夷)。匈奴始祖名薰粥氏、山戎(鲜虞)、猃狁是也。始祖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徙,居无城国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法,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射猎,急则习战。长兵则弓矢,短兵则矛铤。见利则进,不利则退。食肉衣皮,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父死则妻其母,弟兄死则

---

①匈古音通浑、荤、胡。匈人即胡人。奴,那,匈奴语"人"也。"匈奴"即汉语匈人、胡人。然胡人实又为西域异族之总称。

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讳,无文字。自商周以来,世为中国患。至匈奴王,姓挛鞮氏,国人称之曰撑犁孤涂若单于。匈奴称天为撑犁,谓(男)子为孤涂,若言天子也。单于者,广大之貌,言其单于然也。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凡二十四长。其大臣皆世官职。左贤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之东北,接秽貊、朝鲜。右贤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西,按氐、羌。而单于庭直代郡、云中。岁正月,诸王少正会单于庭。五月,大会龙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会带林,校阅人畜。其法,拔刃者死,盗者没人家财。单于朝拜日,夕拜月。其座,尚左而北面。日尚戊已。

其送死者有棺椁衣衾,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人。举事常随月,月盛壮则进兵,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则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与之。得人因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趋利。秦始皇时,使蒙恬将数十万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临河,徙遣人民以充王。因山险溪谷缮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是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头曼太子名昌顿,杀父而立。东灭东胡,两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夺地,遂人侵燕代。高帝有平城之围。高后时冒顿为书戏慢,大不敬。自是数侵扰,寇边无已。”]

[考诸汉史,“匈奴”实非单一种族或民族之称,而是秦汉时代中国北部一个庞大的成分复杂之多种族之游牧民族之政治集合体。其众推之首领即大单于。其中有黄种民族如诸羌及东胡(鲜卑、秽貊、高句丽、扶余),亦包括非黄种之塞人(斯基泰)、苏末(突厥前身)、黠戛斯、柔戎等。①]

[Gavin Han 公元前 ly《中亚史纲要》:

巴克特里亚五国与印度——巴克特里亚在中国的蒙古草原边界,有一支以匈奴命名的强大的游牧民族。将匈奴比定为若干世纪后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匈人,对这种观点一般还存在争论,但我们认为匈奴即匈人这一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确切地说,匈奴人在语言和各族上究竟与哪个民族相近,目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一般认为,匈奴与突厥在某些方面有关系。在东西史料中,对于匈奴的记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即强调匈奴在战争中的极端的暴行。应该承认,史书作者们总是倾向于将

---

①《诗·六月》:“猃狁匪茹,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这是典籍中始见的匈奴之名(王国维以猃狁为匈奴号)。《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号亦其一也。”(北方名朔方,疑朔即索语转也。)

《魏志·鲜卑传》裴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兹,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魏乃鲜卑,则鲜卑实为匈奴之后裔也。

《晋书·北狄传》:“匈奴十九种,有翔渠(羯)种。”其人高鼻多须。陈寅恪谓即康居与月氏种。

匈奴给他们的同胞带来的灾难戏剧化,其中有些记载不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对匈奴暴行的描写如此普遍,读来又那样自然入理,所以这类记载中肯定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成份。

公元前3世纪,匈奴在蒙古草原的力量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很快就对中国北部的统治者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中国古代遗址中最著名的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而建造的。但是随着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的崩溃,削弱了中国的防卫力量。而与此同时,在匈奴的头曼单于(最高首领)统治下,匈奴的力量则得到了增强。到了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匈奴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冒顿征服了鲜卑、契丹以及东胡等与匈奴相邻的部落,成为蒙古草原的主宰。

在甘肃西部,也就是后来以敦煌闻名的地方,有另外一支被称作月氏的,成份相当混杂的游牧部落联盟。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了月氏,又复击溃北部的乌孙,并将乌孙赶到了西方。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再次向月氏发起进攻,击败月氏,并杀死了月氏王。最后一次失败,使可怕的月氏部落(他们是与匈奴相似的游牧民族)开始举族向西方迁徙。月氏人可能是越过伊犁河谷而下,沿着伊塞克湖南岸向西进发。在伊塞克湖地区,月氏击败了一支塞种部落,并将后者赶到了西南方。《前汉书》将这支塞种称为"塞王"。但是,月氏在进军途中,又与乌孙部落遭遇,乌孙这时转而在后方袭击了月氏。在乌孙的打击下,月氏落荒而逃,继塞种之后,被赶到了费尔干纳地区。这样,在公元前160年之后不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锡尔河边境地区,受到了来自塞种和月氏这两个强大的游牧部落的威胁。

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但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汉文史料中的月氏,显然就是西方文献中叫做"吐火罗"的部落。

到公元4世纪,蒙古草原的匈奴游牧帝国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各不相属的部分,它们就是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北匈奴这时都动乱不已。公元311年,南匈奴部攻陷和烧毁了中国北部都城洛阳。洛阳城当时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终点,在罗马人中间,洛阳城以"Sera Metropolis"(丝都)而著称。

与此同时,鲜卑部落日益强大,成为北匈奴的主要对手,并将北匈奴从贝加尔湖地区附近赶向西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北匈奴很明显地是向天山山脉北部迁徙,但是古代东、西方史学家对于北匈奴这时的迁徙情况,都没有加以记载。最终,北匈奴出现于索格底亚那北部的锡尔河草原。从公元350年以后,到达锡尔河的匈奴

中有许多分支入侵了萨珊帝国东方诸省，在这里，他们以“匈尼特”的名字为人所知；后来，其余的匈奴部落则出现于阿兰人和伏尔加河西部南俄草原的哥特人中，这些匈奴部落以欧洲“匈人”著称。

在公元360年，他又返回了西方，重新与罗马帝国开战，而匈尼特人的军队则作为沙布尔的同盟者，跟随伊朗军队出征。

这时在伊朗东部，兴起了股新的势力，这就是匈尼特人及其继承者寄多罗人和厌哒(Hephthalites 或 Ephthalitds)。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最初在呼罗珊地区出现的匈人，可能就是阿弥厄奴斯·马塞里奴斯提到的匈尼特人，他们的出现，比到过欧洲的匈人大约早25年左右。匈尼特这一名称可能是由中部伊朗的 xiy ō n(Hun)，加上希腊文部族的词尾——ι τ α ι 构成的。但是亨宁认为，Ephthalitds(厌哒)这一名字的词尾是粟特文的复数形式。当匈尼特人最终与沙布尔二世结成联盟之后，他们参加了沙布尔二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反对罗马帝国的战役。那里，匈尼特王伽楼巴提的儿子在围攻阿美达(Diyar 公元前 akr)的战斗中阵亡。

虽然从厌哒的名称与种族来看，厌哒人是匈人，但他们过的并不是游牧生活。厌哒人肤色白皙，王官端正；对死者实行土葬，而且厌哒人在埋葬他们的首领时，要埋葬20名生前好友来陪葬。与匈尼特人实行火葬的习俗有明显的区别。

公元5世纪与6世纪早期，即厌哒人在巴克特里亚占据统治地位的后期，根据印度史料记载，旁遮普地区频频遭到入侵，而且某个以“匈奴人”(Hunas)知名的民族也在这时侵入了西印度。

这些入侵者就是匈人，但他们究竟是匈人中的哪一支，目前尚不清楚。在这些入侵者中，最重要的一支是疾布里提。早在公元458年，笈多王子塞建陀笈多就被召来，抵抗入侵者的猛烈进攻。这些入侵者很可能就是匈奴人。

到了公元5世纪末年，笈多帝国就衰落了。到公元510年，匈奴人首领头罗曼已经在印度的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他的统治。

我们对于亚洲匈人的语言，像对他们欧洲同胞的语言一样，完全一无所知。究竟哪个民族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匈人相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现在有两种主要的假设。第一种假说是由科什曼和厌一雄主张的“伊朗语”说，这一假说的主要根据是草体希腊字钱币题铭。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新的发现所排斥，人们发现这些题铭实际上是

东部伊朗当地的巴克特里亚方言。苏科克塔尔巴克特里亚铭文的发现,使这一结论成为定论。毫无疑问,这种伊朗语言偶尔确曾被匈人为了管理的目的而使用过,但是匈人实际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呢?现在能够自圆其说的假设,是米诺尔斯基提出的"突厥语"说。然而,"突厥说"也并非尽如人意,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周书》说,厌哒人实行一妻多夫制,这一记载对于主张厌哒源于印欧语系的理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与其说他们接近突厥人,倒不如说他们接近藏族人。从大英博物馆一个银盘上所画的东部匈人(很明显是寄多罗人)的军事装备上,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他们的种族起源有关的问题。从银盘上所见,匈人的装备有一柄笔直的双手握宝剑和一张复弓,但是没有马蹬。匈人装备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特点,很明显地将他们与后来的阿哇尔人区别开了。阿哇尔人具有特色的装备是弯曲的剑和马蹬,而一般则认为阿哇尔人属于蒙古人种。

当众多东部匈人部落统治着巴克特里亚以及现代阿富汗的其他地区时,在蒙古地区的草原民族中,也发生了重大的王朝更替。实际上,正是蒙古草原的这些变动,最终导致了厌哒帝国的垮台。鲜卑将北匈奴从鄂尔浑灌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赶到巴克特里亚以后,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统治了蒙古草原。但是到公元6世纪,有一支称作柔然的部落在蒙古草原崛起。这些柔然人,可能就是后来以阿哇尔的名字在欧洲出现的部落。公元560年之后不久,阿哇尔人就已经君临匈牙利草原。虽然无论是对阿哇尔人在蒙古草原的情况来讲,还是就其到达匈牙利居地后的情况来讲,我们对阿哇尔王朝的历史都所知甚少,但是阿哇尔民族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具有某种强烈的兴趣,因为可能正是阿哇尔人,向欧洲传递了骑兵战争的两种重要器械,马蹬和马刀。公元5世纪时,大概在介于中国和草原之间的地区,发明了马蹬和弯曲的骑兵剑。当这两种发明被阿哇尔人传到欧洲之后,很快就被拜占庭采用了。像马蹬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象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蹬为何物,这一事实确实令人惊诧不已,然而看来实情确是如此。

突厥兴起的结果,将柔然王朝驱逐出了蒙古草原,在此过程中,突厥人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到公元552年,柔然已经完全败亡。突厥帝国的开国君主是汉文史料中称为土门(突厥文铭文中称作"布民"公元前 umin)的首领。突厥可汗的驻地位于库车北部的白山(Aq Dagh),但突厥帝国的领土则往西一直达到了阿姆河和里海。正如

我们所见的那样,突厥汗国的西部实际上是在土门可汗的兄弟,室点密的独立统治之下。]

夏6月,从大行王恢之议,令五将军伏兵三十万于马邑,谋诱击匈奴,计泄未果。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人聂翁壹,奸阑出物(走私)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万伏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

单于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保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

王恢以失机沮兵,下狱死。

[汉将军王恢谋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

自此与匈奴绝和亲。但边贸则未绝。

[自是匈奴绝和亲,攻挡路塞,往往入盗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嗜汉财物,汉亦尚炎帝不绝以中之。]

秋,诏全民大哺五日(过年)。

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已酉),25岁

窦、田为争夺田产相争。

[丞相遣籍福请窦婴城南田。窦婴怒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田蚡闻之,曰:窦婴子杀人,吾活之。何爱数顷田?]

[窦婴景帝时为大将军,田蚡当时位列诸郎。未贵,往来侍酒于窦婴,跪起如子侄辈。及元光后,田蚡借王太后之势,专权骄姿跋扈,遂蔑视诸窦。]

[何按:此案表明王(田)氏新外戚势力的兴起,旧窦氏势力已大削弱。而武帝正处于矛盾之中心。

武帝以"无为"(不介入)之道处之,此乃武帝以外戚制外戚之策也,甚高明。]

[《汉书·卫青传》记卫青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五月丙子,黄河于瓠子决口改道,注巨野,通淮泗,泛郡十六,改道从顿丘东南入海。

武帝命汲黯、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5月辄复坏。决口濮阳,淹十六郡。丞相田蚡反对治河,云: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史记·河渠书》)因其封地俞县(今山东平原)在河北,河夷南流对其有利。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庚戌),26岁。

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乃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阴谋语。宾客居间调节,暂和解。

夏,田蚡娶燕王刘泽子康王刘嘉之女为夫人。王太后诏,命列侯、宗室皆往贺。窦婴邀灌夫俱往。灌夫骂座。田、窦家族矛盾激化。

[《史记》: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父张孟,尝为灌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吴楚反时,从军平叛,有功,为中郎将。后家居长安,坐法去官。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不喜文学,好任侠。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资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宗族宾客为权利,横行颍川。民间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兴。颍水浊,灌氏族。”窦婴失势,乃与灌夫交,倚其客报复平生有睚眦,先慕其势后弃之者。灌夫亦倚窦婴,以结交列侯、宗室、亲王。两人相利用,其游如父子然,恨相知晚也。]

[何按:由此可知,灌夫本为颍川恶霸,窦婴则为失势之贵族。其与田蚡之争,实乃贵戚与暴发户之争也。]

主父偃盗书陷害董仲舒。

[“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火灾。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阴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免诛,复为中大夫。董氏告老免归。大臣皆畏偃口,赂遗累千金。”]

[是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火灾。上素服五日。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主父偃窃之以上奏天子。记中推说灾异天意,认为应诛刘安及田蚡。

武帝览之不悦,下董仲舒于狱,后复释之。(此似与田蚡授意公孙弘陷害董氏有关。)]

[最早建议武帝除掉刘安和田蚡的是董仲舒。事起于本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

先后发生两起火灾。[1]董仲舒著文论之。论收入《汉书·五行志》:“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不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而燔之,况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所言“在外而不正者”指刘安,“在内不正者”指田蚡。

草稿未上,主父偃私见,嫉之,窃其书而上奏。武帝不以为然。召示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元朔六年,淮南、衡山王谋反事觉,武帝乃“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2]田蚡已死,不及诛,武帝忿忿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3]]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4]]

5月,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御史大夫韩安国行丞相事。堕车,蹇,因病免韩安国官职。

9月,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病愈复起为卫尉。

窦婴,田蚡廷辩。

王太后命族灌夫,并案治窦婴。武帝听之。

[何按:田窦之争,实乃建元以来刘窦两大家族权争之继续。但建元初之争,关系重大政策方针。

王氏、田、窦之争,则重在家族财产利益之攘夺。武帝乃表面超然中立,而阴施以外戚制外戚之策,使其两败俱伤。

灌夫为一时豪强游侠之首。此事件后,窦氏、王氏、田氏三外戚及豪家俱败。]

10月,灌夫弃市。

---

①一说在建元六年。

②《汉书·五行志》。

③《史记·武安侯列传》。

④《汉书·董仲舒传》。

12 月末，窦婴弃市。[①]

[《魏其武安侯传》记田、窦、灌三家相斗事甚详，此乃元光年间一大公案也：

元光四年夏，田蚡娶燕王刘泽子康王刘嘉之女为夫人。王太后诏令列侯宗室皆往庆贺。窦婴挟灌夫俱往。至酒席上，田蚡不为敬。灌夫乃借酒骂座于临汝侯灌贤，并辱与其耳语者卫将军程不识。灌贤乃灌婴孙辈，灌婴则为灌夫父之旧主人也。

田蚡曰："你辱骂程将军，程李俱为御林军卫尉，亦不为李广将军留面子乎？"灌夫曰："今日愿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田蚡乃令家中骑卫扣留灌夫。籍福欲救解之，按其项令向田蚡谢罪，灌夫愈怒，绝不肯低头。

窦婴起去，欲麾灌夫同出。田蚡乃令骑卫押灌夫置警署（"传舍"），召长史（掌事）曰："今日召亲室饮宴，乃奉王太后诏。灌夫骂座，是大不敬。"遂以大不敬论罪，当斩首弃市。灌夫被系于狱中，乃不得首告言田蚡"阴事"。

窦婴乃以金使宾客请托于廷尉，惟诸吏皆为田蚡耳目，莫可得解。

窦婴决志救灌夫。其夫人劝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岂可救邪？"窦婴曰："侯位自我挣得，即自我丢之，无足恨悔！我绝不令灌夫独死，而我独生。"遂转移家人、变散家产，然后潜身出家上书皇帝。

武帝见书召人，窦婴哭诉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失言，而丞相因他事诬罪之。上然之，赐窦婴食。曰："双方都是亲戚，其是非可至太后朝宫（东朝廷）申辩之。"

至王太后宫前，武帝主持，双方陈词。窦婴先为灌夫辩护。田蚡则大毁灌夫平素横行不法事，目无君后大逆无道。窦婴辩不过，自度已不可挽回，因揭露田蚡与淮南王交往受金谋变之阴事。

田蚡跪拜武帝前，曰："当今天下太平，作为肺腑之臣，所好非权力，只好音乐、狗马、田宅、倡优巧匠之属。而窦婴、灌夫则招聚天下勇士、豪强，日夜讲论政局，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即俯画于地，睥睨东西两宫之间，希图天下有变，而欲以废立大功。臣乃不知窦婴究欲何为！"

于是武帝问在座大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灌夫旧有军功，若非有大罪，仅争杯酒不足诛也。但丞相言灌夫通奸猾，侵小民，家资亿万，横行颍川，凌犯宗室，侵欺皇家骨肉，此乃枝大于本，不折必劈。唯明主裁断之！

---

①"将相名臣年表"以元光四年 12 月田蚡死。五年 10 月族灌夫、窦婴。而蚡传记蚡死时病狂，见灌窦鬼事。表误。

内史郑当时欲暗护窦婴,见势不敢坚持。其余大臣皆不敢发言。武帝乃怒斥郑当时曰:“公平日数言窦、田长短,今日到朝廷公论其是非,局促竟如新驾辕之小马驹!我要一并斩灭汝属!”遂罢朝。

帝入东宫请食并汇报于太后。太后盛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已敢如此欺吾弟。我死后,皆鱼肉之矣!难道皇帝是无态度之石人木偶乎?今日皇帝主持,辩论竟无结果!若在你身后,大臣还有可信者乎?”

武帝谢罪曰:“因双方都是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之事耳。”于是召郎中令石建,分别议双方廷辩事。(郎中令,主禁军也。)

田蚡退朝出,候韩安国于宫门,召其同车,怒责曰:“窦婴已是老秃翁,何为惧之,首鼠两端?”安国曰:“今人毁君,君亦毁人,如贾竖妇女争骂,何其无大体也?”田蚡谢曰:“争时慌急,不计所言。”安国任御史大夫,乃田蚡之力也。

又安国曾为梁王相,为梁王事联络长公主,以有能力曾为窦太后及窦氏长公主所倚重。故其临事,两面讨好。

于是武帝命御史,以窦婴当廷所言不实,欺谩君上罪,下狱。窦婴再求见皇帝,皇帝不见。在景帝临终时,曾有遗诏赐窦婴,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窦婴乃使子侄通过陈皇后上书言之,皇帝再召见。

武帝乃命调阅尚书大行(秘书处档案),不见此遗诏原件。惟有诏书藏于窦家,家丞封存,报上。大行乃弹劾窦婴伪造先帝诏书,罪当杀头弃市。遂以十二月晦日,弃市于渭城(咸阳)。]

十二时丁亥,地动。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辛亥),27岁。

“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具次贤良,令与计偕。”

春正月,河间献王刘德薨。

[“德好学。修礼乐,造次必于儒者。道术之士自四方至者,皆得古文之书。来朝,上策问三十余事,具推道术以对,文约旨明,上甚重之。]

诏立其子。来朝,献雅乐。帝命下太乐官(乐府)存习。

春,田蚡病狂,号呼上名服罪、谢罪。上使巫能视鬼者往视之,见魏其、灌夫鬼守之。

3月乙卯,田蚡死。子田恬嗣侯。

使唐蒙通夜郎。使司马相如通西南夷。

夏，以唐蒙发巴蜀卒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发巴、蜀卒筑路，从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安边场)指牂柯江。初唐蒙问蜀商，知枸酱由夜郎(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及四川南部)输南越。蒙上书请通夜郎，欲浮船牂柯江，直抵番禺城下，以取南越。武帝遣蒙赴夜郎，夜郎侯多同问：“汉孰与我大？”遂置犍为郡(治僰道)，开通道路。士卒筑路者多死，逃亡者受军治惩治，蜀人惊恐。武帝遣司马相如责唐蒙等，慰喻蜀人。相如于武帝初年因善辞赋被召拜为郎。”]

秋7月，废陈皇后阿娇。斥疏长公主。

[收其皇后玺绶，置退，废居长门宫。捕为巫蛊者，皆斩。]

8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通先圣之术者，具次贤良，令与计偕。”

诏征文学之士，淄川国复推举公孙弘。对策，天子擢为第一。召入见，拜博士。

[《西京杂记》：“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士所推尚为贤良，国人邹长倩以其家贫。少自资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释所著冠履以与之。”]

[“弘每朝会议，并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谨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悦之。元朔中封弘为平津侯。以布衣治经术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是年，江都易王刘非上书请伐匈奴，武帝不许，以诸侯干政责之。

改革法律。以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议更定诸律令。

[“务在深文。拘守职之责，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深刻自此始。”]

[纳大农令郑当时议，命水工徐伯督卒数万人，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溉田万余顷]。

[是年江都王上书，愿击匈奴，武帝不允。董仲舒废为中大夫，居家。武帝初年，公孙弘曾以贤良文学士被征为博士，并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至是年，复被征为贤良文学，并在对者百余人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壬子)，28岁。

始征商贾车船(对商品征收运输税、财产税)及缗税。

[“初算商车，租及六畜。”以税赋补国用。“一岁之中，甘泉仓满。民不益赋而天

子用饶。"]

[算,即税也。汉初施行财产税,收訾算。服虔说:"訾万钱,算百二十七。"]

[何按:汉初实行抑商政策。《平准书》: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景帝欲变之,后元二年诏曰:"有市籍不得官,无訾不得官,朕甚悯之。"至武帝盐铁令下,民得以金买官遂废旧制。《食货志》:"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春,开渭渠、龙首渠。

[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筰(今盐泽一带)君长请内属。以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为使,置县十余。始税商贾车船,令车"筑"。用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由长安沿终南山到黄河,全长三百余里,三年完工。从此,关东到长安漕运时间省去一半,并溉田万余顷。]

6月,行幸雍。

匈奴入掠上谷。

秋,遣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将军出兵入草原分击匈奴。

[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

卫青兵至龙城,斩首700余级。余军皆失利。

[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赎为庶人。[①]]

冬,匈奴数盗边报复,渔阳尤急。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

[何按:是年改革对匈奴战略:(1)主动出击而非被动防御。(2)长程运动,而非屯兵待战。(3)以骑兵取代步、车成为主力军队。]

钱穆谓:汉武击匈奴,采用三种步骤:

(1)远出东西两翼自侧面迂回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应与兵员援助。(2)正面击其主力。(3)进一步则为渡大漠远征。]

①云中郡治在今呼和特市西南,距狼山口五百多里。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不远。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癸丑),29岁。

冬11月,诏议二千石不举孝廉者皆有罪。

[冬11月,诏公卿、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春,3月,立皇后卫氏。

皇子刘据生,乃卫皇后子。卫氏遂以子贵。卫氏出身卑贱,事帝甚谨。(尊立卫皇后事,主父偃有功也。)

[《枚乘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立皇子祝》。"师古注:"高媒,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媒祠。"]

秋,匈奴二万骑攻入辽西。杀辽西太守,杀略三千余人。

以卫尉韩安国为将屯将军,军代。匈奴重兵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

[安国时仅千余骑,且尽,会燕救兵至,匈奴乃去。]

复召李广,拜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以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远击匈奴。青斩首虏数千人。

[何按:此汉军与匈奴作战以来,第一次杀敌数千人。]

鲁恭王刘余、长沙定王刘发死。

东夷秽君南闾纳质归诚。从主父偃议,初置辽东苍海郡,以备御匈奴之东翼。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东夷秽(又称秽貊)君长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附汉朝,武帝置为苍海郡(今朝鲜临津江、北江原道间);[①]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春罢(完成)。灭卫氏政权后,武帝在其地置四郡:真番(今朝鲜礼成江、汉江间),临屯(今朝鲜咸镜志道),乐浪(今朝鲜平壤市),玄菟(今辽宁东部至朝鲜咸镜道一带,治沃沮城,今朝鲜咸镜志道咸兴)。

自东定朝鲜后,武帝又将汉帝国的影响一直推展到日本。]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徐乐上书: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

①或说地在朝鲜半岛中部,即今日之"汉城"。

千乘之尊、尺寸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吉;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甲寅),30岁。

募民能入匈奴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赀为郎,始于此。

冬,赐淮南王、淄川王几杖,毋朝。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诏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遗。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期然后罢。(《汉书·淮南王传》)]

正月,纳中大夫主父偃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由皇帝定其封号。自是,藩国裁分,诸王子弟毕为侯。

[仲长统《昌言·损益》:"汉之初兴,公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姿,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肉,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规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籍亲属之恩,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坐食俸禄而已。"]

匈奴攻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韩安国卒。

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取河南地。尽逐白羊,楼烦诸部,远征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至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音斗)辟县造阳地予胡。"]

经此役,卫青全部收复秦河南地,置朔方、[1]五原郡。遂据之以为出击匈奴单于王庭之正面根据地。

---

①此乃用主父偃之计。《史记》:"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土,灭胡之本也。"

[钱穆谓:“是时汉都在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威胁。卫青取河南、置朔方,自是长安始无烽火甘泉之警。”

汉与匈奴东西横亘,匈奴单于庭偏在东,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军便于出西。建城朔方,同时弃上谷之渔阳地予胡,此为汉庭弃守为攻之大战略。此后匈奴于两翼皆大受汉军之威胁。]

[元朔二年卫青夺取河南地后,汉武帝曾颁诏嘉奖,道:“今车骑将军事,度西河,至高阙……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奚旧塞,绝梓岭,梁北河。”

《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地理志》云:“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汉临戎县在今日内蒙古磴口市北,其北的“连山”非狼山莫属。汉代“土俗”称狼山“中断”处的要塞为高阙,说明高阙地名在河套一带行用已久,不是史家新造。《水经·河水注》说今狼山口“两岸双阙峨然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汉代至北魏河套一带的居民一向称狼山中断处的要塞为高阙,正是高阙在狼山的强证。

高阙是一处军事要塞,《史记》所述与高阙有关的战事,反映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高阙与河南地区关系十分密切。赵武灵王占领高阙前后,大约河南地已归入赵国版图;战国末年赵国失去高阙,河南地也同时丧失,所以秦统一后有连取高阙、河南地之举。秦末河南地再度为匈奴占据,直到汉武帝元二年才重新收复,而收复河南地的关键仍是高阙的夺取。司马迁把古据高阙当作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功极盛的标志大书特书,字里行间实寓有高阙得则河南地安的含义。战国秦汉时“河南地”的中心区域在河套一带。]

夏,募民十万口徙朔方。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从主父偃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时选强豪大姓不得族居。”(《后汉书》郑弘列传注引《谢承书》)]

关东大侠郭解亦在徙中。郭解拒命,乃族郭解。王太后为郭解请托,武帝从公孙弘议峻拒之。

[元朔二年(前 127 年),大侠郭解被捕获。侦讯表明,其亲手杀人案皆发生于朝廷颁布大赦令前。而在大赦令颁布后他的党羽犯下的杀人案,他则一概不知。按律郭

解应无罪释放。在朝廷议决这一案件时，公孙弘却主张族灭郭解一家。理由是：“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

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族灭了郭解一家。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以武犯禁，无视国家法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班固、荀悦之口肯定公孙弘建议族诛大侠郭解。王夫之则说：“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伟矣哉！”

司马谈以故交，安置郭解遗族于夏阳(韩)。]

[(元朔2年冬)孝武皇帝时，中大夫主父偃为策曰：“古诸侯不过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也。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疆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从，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所愿。上以德施，实封其国，而稍自消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因关马及弩不得出，绝游说之路，重附益诸侯之法，急诖误其君之罪。诸侯王遂以弱，而合从之事绝矣，主父偃之谋也。(新序)]

秋，燕王定国有罪，自杀。国除。

出主父偃为齐相。主父偃跋扈贪赂，收诸侯金。

诛主父偃，族其家。

[“主父偃方贵幸朝，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惟孔车收葬之。武帝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乙卯)，31岁。

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谷蠡，即骨嘟，疙瘩)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降汉，封为涉侯。

三月，诏大赦天下。

王太后薨。

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初设内外朝。遂以卫青主内朝，公孙弘主外朝。

[“汉至武帝以后，柄归中朝，政去两府。所谓中朝者，大司马、大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也。所谓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盖武帝决事禁中，希见卿相。”(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始通西南夷。

张骞自大月氏归，拜为太中大夫。

张骞去国计十三岁。张骞带回匈奴周边及西域形势地图。帝喜庆，令民大哺五日。

夏，匈奴数万骑攻入塞，杀伐郡太守，掠千余人。

秋，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河南地而筑朔方。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掠甚众。

以中大夫张汤为廷尉。

[廷尉，主司法狱政。相当于今之公检法总长也。]

使卫青部将苏建筑朔方城。

命卫尉苏建(苏武之父)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襄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

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凡十万余人。大胜，斩首万五千级。

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 年，丙辰)，32 岁。

冬，行幸甘泉宫。

夏，匈奴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每路各三万骑，杀掠数千人。

以董仲舒为胶西王相。

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丁已)，33 岁。

冬 11 月，免薛泽丞相，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以布衣为丞相封侯自公孙弘始。

[夏六月，诏"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辄罢之。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补右职。"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六月，公孙弘与太常、博士一起上书汉武帝，提出兴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官的建议：

"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治，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

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此外,还有任儒生为左右内史、太行卒史、郡太守卒史、中二千石属,郡属等职的建议。此一上书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为广大儒生入仕开启了一个畅通的门径,使西汉的官吏成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这一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公孙弘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朔五年(前 124 年),弘向汉武帝提出了为太学博士置弟子、复其身和以学业状况任官的一整套建议,得到了武帝的首肯。这样,儒生入仕就有了规范化的门径。随着同刘邦一起创业的武将功臣从政坛上消失, 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成为历史陈迹,一批又一批的儒生跻入汉帝国的庙堂,西汉官吏“彬彬皆文学之士”,文化素质大大提高。

经过卫绾、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使西汉的统治思想基本上完成了由黄老之学到儒学的转变,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此一转变,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孔子、孟子、荀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学与政治的结合还仅仅是大师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那么,到西汉建国伊始,儒学与政治的结合就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叔孙通制朝仪,张苍定章程,使汉高帝刘邦从实用的层面上认识了儒学的价值,因而才出现他以太牢之礼曲阜朝圣的场面。但此后惠、文、景时期由于黄老之学的兴盛,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暂时中断。不过,由于汉初一批儒学大师的努力,使儒学的勃兴形成了不可阻挡之势。而经董仲舒之手推出的新儒学使汉武帝认识到它巨大的思想价值。由此,导致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出台。

在推动此一政策出台和此后实践儒学与政治结合的过程中,公孙弘以丞相之尊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推动了儒学与刑法的结合。此后在两汉司法实践中盛行的“《春秋》决狱”,他应该是重要的启诱推动者之一。汉武帝时期执掌司法权的张汤就以公孙弘为老师,时时请教之。]

[孟祥才云:“公孙弘主要是专以儒术谋求禄利的儒士。不是专治经学的儒学家,不是学者型,是官僚型人物。同学术领袖董仲舒不是同一类型,不是以儒家经义为最高原则,用经义指导政治、规范政治,而是以圣旨为唯一的最高原则,以经义服从政治。”]

[董仲舒以“从谀”斥公孙弘。司马迁、班固评公孙弘“希世用事”,“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公孙弘荐董仲舒出任胶西王相。胶西王乃刘彻异母弟,素霸悍。弘以为非仲舒莫可为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遇之。]

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

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①骑都尉韩说擒获右贤王。

[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大行李息为将军,皆统属大将军。]

[“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亲信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虏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此役俘获匈奴王十有余人。益封青六千户。”]

[“元朔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左内史李沮……太仆公孙贺……代相李蔡……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匈奴右贤王挡卫青等兵。”

(朔方郡,元朔二年置,郡治在今乌拉特前旗东南。)

“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

(卫青“麾下”军与四领属将军的出塞点显然不在一处:前者是从窳浑出发,经高阙出塞;后者是从朔方出发,在朔方以北某山口出塞。两路大军一东一西,对右贤王庭形成钳击态势力。)]

夏6月,颁布《劝学诏》。

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淮南王与衡山王谋反,计未果。

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赃罪,并置武功爵。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时孔安国为博士,传授孔氏所藏《古文尚书》,开拓古文尚书学派。

秋,匈奴万骑入代,杀都尉朱英,掠千余人去。

司马迁仕为郎中。

---

①高阙,地在今内蒙狼山中麓石兰计口。(据唐晓峰实地考记。)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戊午),34岁。

春2月,卫青率六将军骑兵十万,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骑。而汉亦亡两将军、二千余骑。

[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军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前将军赵信兵败,降匈奴。苏建仅以身脱,赎为庶人。]

[赵信,故胡小王,降汉,封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得赵信,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迁北绝漠,以诱疲汉兵。乘弊而击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此役后,大单于将龙庭北迁至瀚海(戈壁)漠北,以避汉军。

霍去病率轻骑八百随卫青出征,立功封冠军侯。

[霍去病,卫青甥,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骁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袭敌立功。]

(《汉书》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何按,牛羊尸腐为病,以播疫病也。此即现代所谓细菌战、生物战也。)

张骞任随军校尉,以知水草地理,使军免饥渴,有功。封博望侯。

6月,有司奏请置武功爵,以荣战士。诏民可买爵赎罪。大犒赏功臣将士。

置武功爵,凡十一级。命汲黯与爵事。

[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已未),35岁。

冬10月,上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11月,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泄,自杀。国除。受牵连而死者数万人。

[下诏曰:"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肢体,肢体伤则心憯怛。

昔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指《淮南王书》)而造篡弑(指谋废立、政变事)。此朕之不德。

命优抚孝弟、力田。孤、老、寡、鳏、独,赐帛人二匹至五匹。八十以上赐米人三石。

有冤失职,使者以闻。”]

12月,大雨雪,民冻死。

济北王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武帝以他邑偿之。

夏4月,赦天下。颁《左官律》、《附益法》。

立刘据为皇太子。以石庆为太子太傅,庄青翟为太子少傅。

5月,匈奴万人入上谷,杀掠数百人。

派张骞从四川四道并出,欲打通身毒(印度),终不能通。至滇,夜郎而还。复事西南夷。

[初,张骞在大夏见蜀布、邛竹杖,闻来自身毒(印度古名),估计从蜀地西南行可至。武帝采纳其说,令骞派使者分道寻访身毒。使者至滇国(在今云南东部滇池一带),滇王当羌亦问:“汉与我孰大?”使者还报,武帝始再留心西南之事。]

以乐安侯李蔡为御史大夫。

11月,严助坐事诛。公孙弘自求免归。武帝作《报公孙弘书》答之。

董仲舒以老病辞免归乡。

[“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据此,《郊事对》及《春秋决狱》应系此时所作。]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庚申),36岁。

3月,公孙弘卒。以张汤为御史大夫。

[公孙弘生于高帝七年(前200年),死于本年。]

[何按:班固写《汉书》,盛赞武帝时人才之盛,共举出14类27个代表人物,而列在儒雅第一位的就是公孙弘。

以儒生出身而登相位,公孙弘在西汉是一个开其端的人物。然而,即使在其生前,对他的评价已颇有争议。《诗》博士辕固骂他“曲学阿世”,[1]主爵都尉汲黯斥责他“多诈而无情”。[2]不过,公孙弘却一直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信任,并得以寿终于丞相任上。

明于慎行:“汉武表章儒术,公孙弘之力也。弘奏请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又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选择,以补右职。由是劝学古文之典,遂为历代

①《汉书·儒林传》。

②《汉书·公孙弘传》。

所祖。其实自弘发之,可谓有功于经术者矣。世徒以其曲学矫情,薄其相业,而不录其功,亦非通论哉!"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①

以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何按:武帝用人不拘常格,然稍失意则以律严诛,杀责甚苛。用法无情,不徇旧恩。如张骞有开凿之功,一旦失期,则废为庶民。汲黯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则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

殊不知此乃帝御下之权术也。举贤招贤,防止英才沦落民间,成为反对力量。用才杀才,防止有才者恃才在朝中结党成为政治力量。一箭多雕之策也。]

春,以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至祁连。历五王国,转战六月,过焉支山千余里。得胡首虏万八千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夏,霍去病与公孙敖将数万骑俱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泽(罗布泊)。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千余人。

匈奴左贤王反攻代郡、雁门,杀掠数百人。武帝命张骞、李广出右北平击左贤王。李广将四千骑先行,张骞将万骑在后。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李广,军失利,死者过半。杀虏亦过当。会张骞军救至,李将军及脱。张骞留迟后期,当死,以金赎为庶人。(后重诏起用。)

[霍去病出河西,深入匈奴地二千里,至祁连山、焉支山。匈奴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千级,俘小王七十余。匈奴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妻女无颜色。"

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浮屠)流通之渐也。"②]

---

①《汉书·公孙弘传》。]
②说详南朝王俭托名班固《汉武帝故事》。

诏益封霍去病二千户。

汉从此遂占有河西地,断绝匈奴西路,打通河西走廊。

(霍去病加封五千户,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

夏,南越献驯象,能言鸟(鹦鹉)。

江都王刘建谋反,事发,刘建自杀。国除。

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余人来降。以其故地设为武威、酒泉郡。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成河上,得浑邪之使,即驰传以闻。

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兵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多而欲不降者,颇遁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

[《汲黯传》:"浑邪王来降。贾人与市,坐当死者百余人。黯曰: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竟绳以阑出财物于边关乎?"(无符出入为阑。)"绳",即商人与浑邪降部私相交易者,皆定为走私罪而杀头也。]

大犒赏功臣将士。

[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辆)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饲)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藏)以澹(赡)之。]

从匈奴俘虏中发现并起用金日磾。金日磾,休屠王王子。

["经过几次对匈奴的大战役,汉得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列置郡县;又逼迫匈奴北徙,使漠南不再有匈奴王庭。

元狩二年(前121)或稍后,汉"筑令居以西",即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向西修筑亭障。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曰,令居亭障西迄酒泉为止。得河西,列亭障至酒泉,才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接着,张骞向汉武帝陈述经营西域方略,进一步提出招乌孙东归敦煌、祁连故地,并主张与乌孙结和亲以"绝匈奴右臂"。《汉书·张骞传》张骞谓:"既连乌孙,自其

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

于是而有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西域之行。”][1]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辛酉),37岁。

夏5月,赦天下。立胶东康王刘寄长子贤为胶东王,少子庆为六安王。

山东大水,民多饥乏。遣谒者劝有水灾郡县种宿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

初算(税)缗钱。

拜卜式郎,赐爵田,布告天下。

物价上涨,发生通货膨胀,造白金及白鹿皮币,面值40万。

[造锡、银合金三种(“白金”三中吕),面值三千、五百、三百。销半两钱(四铢),改铸三铢钱,盗铸者斩。三月,复罢三铢钱,铸五铢钱。而姓以私铸触法者众多。]

令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赈)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可假贷。尚不能可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生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可带财役贫,转毂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赡)用,而摧浮淫关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关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磨)钱质而取谷,钱益累薄而物贵,由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此币,直(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通货膨胀。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钱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鬻(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毫)矣。]

[元狩三年冬,武帝起用大盐业者齐东郭咸阳、大冶铁业者南阳孔仅为大农丞,

[1]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领盐铁事，侍中桑弘羊以会计用事，筹备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是：(1)禁止一切私营盐铁业，没收私营的浮食奇民的生产资料。(2)改为国营。规定盐民不得有自置的煮盐锅，必须使用统一的官器盆。国家供给一定的伙食，至于铁业，从矿山采掘、钢铁冶炼到铁器铸作，全部生产过程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3)国家在产盐铁的山海川泽设置盐官、铁官统管其事；没有矿山的地区设小铁官，统管炼回炉的旧铁、铁器铸作和销售。(4)产品专卖。盐是由国家按官价收购、销售，销售价须由皇帝批准。铁器由官府直接经营，不存在收购环节。]

桑弘羊为侍中，主计算。行算缗令(商人按资产征税)、告缗令。(富人不具实申报资产，经告发，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以其半，赏告发者。)

卜式建议迁有财者助边。

[“河南人卜式，数请输财县官以助巴。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曰：不愿。问有冤乎，欲言事乎？曰：无。问：既如此，何欲而然？曰：灭匈奴而已。上由是贤之，欲尊显以风百姓。乃召拜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

发谪吏于长安郊穿昆明池，作水军演习水战。

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诗赋，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上方立乐府。乐府立“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

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博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

[案乐府者，本源于先秦宗庙閟言中职业歌舞者，男歌往往用瞽，女乐舞者则为“倡”，倡亦即神妓。乐府之制，其来已久，殷有瞽宗，周有大司乐，秦有太乐令、太乐丞，皆掌乐之官也。然乐府之名，则始见于汉。

乐府之官本于乐正。正者，政也。乐政，乐官也。乐官即儒师之本源，《周礼》称“乐胥”，胥者，儒也。

《王制》篇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又《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

比事,春秋教也。"是皆其例也。

而《周礼》六艺之教,乐且居其第二焉,《地官司徒》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

《礼记·内则》亦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孝经》云:"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记》亦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以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论语》:"子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周礼》亦云:"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

乐在先秦,乃所以为治,而非以为娱。乃将以启发人之善心,使百姓同归于和,而非以满足个人耳目之欲望。

自秦燔《乐经》,雅音废绝,汉兴,承秦之弊,虽乐家有制氏,然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故多以郑声施于朝廷,所谓乐教,武帝之立乐府而采歌谣,以为施政之方针,虽不足以语于移风易俗,固犹得其遗意。

《乐记》曰:"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品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姿欲,将欲以为治也。"噫!是亦足以观古今之变也已。]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

武帝与倪宽论经,帝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擢宽为右大夫。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掠千余人而去。

["仆谓佛法之入中国,其来久矣。观《魏略·西戎传》曰:昔汉哀元寿元年,博士景应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又观刘向《列仙传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则知汉成哀间已有佛经矣。观《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上

使依其国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问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时已入中国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国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记仲尼师老聃，师竺乾。审是，则佛入中国又不止于武帝。"]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壬戌），38岁。

据《食货志》，本年再次派卫青、霍去病大出击胡。

春，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击匈奴（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卫青军出定襄至漠北，围单于大破之。

[汉谋曰："翕侯赵信为单于计，居漠北，以为汉兵不能度漠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匹。勇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步兵转者踵军后数十万人，大击胡。

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漠击凶奴。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漠北，与汉大将军接战。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胜汉兵，遂独身与北骑数百溃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之遁走，其兵乱。单于久不与其众相约，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及大单于归，乃去其号，复为右谷蠡王。

骠骑将军出代，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青捕虏知单于所居，自以精兵击之，而令公孙敖为前锋。单于遁走。]

[霍去病出代，率李敢（李广子）、赵破奴等，远驱二千里，大破左贤王军，杀敌七万，俘四王、八十三将。封狼居胥山、单于姑衍，临瀚海而还。

两军共杀虏匈奴九万人。北逐大单于。二人皆以军功加大司马衔。是役乃大破匈奴于漠北也。

自是匈奴北遁今蒙古包楞格河。而后漠南无王庭。汉以骑兵为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循绿洲而进，迫匈奴不能复转侧。]

["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令居，通渠置田，官吏卒置

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元朔五年"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又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自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公元前 128——前 123 年)，汉使卫青、霍去病每年出兵伐匈奴，以至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其间仅此两次捕斩首虏的将士所得赏赐已达七十余万斤。]

[董仲舒曾提出"限民名田"和"盐铁皆归于民"，及"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主张。]

李广出东道，失路误兵期，受谴自杀。①

[广请行。天子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出塞，青令广出东道，东道回远。广自请为前锋，青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敖旧有恩于青。青欲使其立功，故徙前将军广。广军无导，失道。青责广校尉，而以长史持酒米遗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广年六十矣，自结发与匈奴战大小七十余次，败多胜少。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乃引刀自刎。]

[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食货志)

冬，徙关东贫民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诸郡。

匈奴遣使求和亲。廷辩之，以为非计。

[《汉书·张汤传》汤与博士狄山廷辩与匈奴和亲事。张汤、桑弘羊力主再战。狄山丑抵汤，主和亲。

武帝于是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人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乃遣山升障。至月余，匈奴侵斩山首而去。师古曰："障，塞上要险之处。"]

为方士李少翁所惑，上知其诈，乃杀之。

汲黯坐法免官。

---

①武帝时名臣多自杀。如赵绾、王臧、李广、李蔡、张汤、王卿、暴胜之、商丘成等。盖汉儒重气节，可杀不辱之志也。《春秋繁露·竹林》："君子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又引曾子语云："辱若可避，避之而已。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

以王温舒为中尉，掌京师治安。

改币制，令官营盐铁。算贾人缗钱，又税民舟车。

[元狩四年前，凡是以售物得钱的，按其多少出算赋，一算纳百二十钱。是为所得税。其算以业为分，有车船算、关税、盐铁税等七类之多。元狩四年令：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此缗钱令实际是根据盲人之财产多少征收财产税。]

[大农上盐令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机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了禁钱以振(赈)元元，宽贷，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蓄)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辊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虎；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面上籍，及家属，皆无得各田，以便便农。敢犯令，没人田货。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宣判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是岁，汤死而民不思。其后二岁，赤仄(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抵)皆申告。杜周治之，狱少反之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群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蓄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钱红钱之枚，用少饶矣。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斡(管)盐钱官布多，置水衡，欲以盐钱；及杨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

楼船,高十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如,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繇(由)此日丽。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徵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赈)焉。]

是岁,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使命是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西翼之盟,从外交上孤立匈奴。配合军事上对匈奴之作战也。

["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使遣之他。旁国。"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

[丁谦:安息即巴提亚国(Parthia),其王世世以 Arsaces/Arsak 为号,汉人以王号为国名,译称安息、奄兹。何按:自战国末以来以安息/崦兹为极西之地,日之所入处。大夏,即伊朗塞流息希腊王朝。(孙毓棠说)]

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癸亥),39 岁。

春 3 月丞相李蔡有罪犯侵卖园陵道儒地而赐令自杀。

武帝染疾于鼎湖,小愈乃转至甘泉。

[上郡有灰能下鬼神,帝祠之甘泉寿宫,病小痊,幸甘泉。]

罢半两钱,更铸五铢钱。

于是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

拜汲黯为淮阳太守。以故,遂不能与中朝之议。

以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翟为丞相。

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盐铁收为官(国)营(垄断)。

连年征战,天下马少。诏令鼓励百姓养马,上调马价,匹 20 万钱。

初置谏议大夫。

司马相如死。

[司马相如《子虚赋》:"(帝)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也可垦解,悉为农郊,以赡氓隶,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

以李敦为郎中令,司马安为廷尉。

令徙天下奸猾吏民充边。

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甲子),40 岁。

冬 10 月,赐百官、蛮夷金、锦。

令民告缗,以杨可主持告缗。

颁《诏封太子制》。

立皇子刘闳为齐王,刘旦为燕王,刘胥为广陵王,初作诰策。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盗铸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者不可胜计。

六月诏:"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所在。"

6 月,遣使者分巡天下,存问孤寡鳏独,无业者贷与之。

9 月,霍去病病逝,葬茂陵侧,造坟墓像祁连山。

[去病年 18 为侍中,从卫青征,为骠骑校尉,与轻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23 岁封侯(元朔六年)。(元狩二年)浑邪王欲降汉,武帝命去病将兵往迎。去病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见汉军多不敢降,怕被诱歼,稍遁。

去病乃率轻骑入敌阵,与浑邪王见,斩其欲亡者千人,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去病时年 25 岁。

其为人少言,有气敢往。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帝为治第,令视之,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卒年仅 29 岁。][①]

以其弟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是岁,大农令颜异以廉直,因对时政不满,坐腹诽论死。自是有"腹诽"之法。

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乙丑),41 岁。

夏 5 月,赦天下。

大哺天下三日。

---

①黄震《黄氏日抄》:"看卫霍传,须合李广传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则北,困顿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王夫之《读通鉴论·武帝》:"广出塞而未有功,则曰'数奇',无可如何而姑为之辞尔。""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得鼎汾水上,改元。

废济东王彭离。徙上庸。

染重病于鼎湖。

[按:鼎湖,宫名,在陕西蓝田西。《郊祀志》:“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至。游水发根(人名)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

置寿宫、北宫,以礼女巫神君,其事秘,世莫知也。(或言神君即“西王母”。)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丙寅),42岁。

冬11月,御史大夫张汤获罪,自杀。

12月,丞相庄青翟为有贼盗孝文园瘗钱自杀。(张汤传)

起柏梁台(《汉书·武纪》)。“上作承露盘,高20丈,大7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

[何按:此台建成乃在元封三年。台成日,帝召文士大会柏梁台上,赋诗,每句七言。后世称为“柏梁体”。][1]

2月,以太子太傅赵国为丞相。

3月,以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

以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置平准均输法,以通货物。

又征人头税名“口钱”。

[桑弘羊为大农丞,撮(总)诸会计事,稍置均输以通货矣。“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之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重于生子则杀,甚可悲痛。古无之。”《汉书·贡禹传》]

废白金币,悉禁郡国不得私铸钱。

夏,大水,关东饿死者千数。

始令入谷补官,入财为郎。六百石为郎官。

秋9月,诏遣博士分循行天下,吁民相救灾民。谕告所抵:“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纪功。”

---

①宋程大冒《雍录》:“汉武作台,诏群臣二千石能为七言者乃得上。七言者,诗也。后世诗体句一韵者,自此而始,名‘柏梁体’。”(略引)今传柏梁诗,游国恩总考之谓魏晋后人所托,可信。但柏梁台赋诗事,亦可信,惜诗未传者。

张骞使乌孙归。

[又以张骞为中郎将,将 300 人。人配马各二匹,牛羊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组成商队。使之远赴西域,与通商为市,求购其骏马。商队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诸国。由此,西域 36 国与汉始通商路。]

[何按:此即丝绸商路开通之始也。]

封张骞为大行令(外交部长)。列于九卿,岁余卒。"其后岁余,骞所遣使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得大宛汗血马,名曰"天马"。复命使者入西域求之。

[赵翼云:自汉武击匈奴,通西域,徼外诸国无不慑汉威。是时汉之兵力实强,晁错谓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张汤亦谓外夷兵刃朴钝,胡兵五当汉兵一,今颇得汉巧,犹三当一,此可见兵威之足服诸外夷也。而其时奉使者亦皆有胆决策略,往往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

[是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

大兴水利,开龙首,灵轵,成国等渠(运河)。

元鼎三年(公元前 144 年,丁卯),43 岁。

冬,关东大饥,人相食。

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具。

11 月,令民告缗,举者得其半。

[吕思勉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食货志》)。"此政与 20 世纪之打土豪分田地相仿也。]

常山王薨。子有罪,坐废国除。

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在位计十三年。子乌维单于立。

张骞于本年去世。

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位上将军。

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戊辰),44 岁。

冬10月,行幸荥阳,还,至洛阳。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始除告缗法。

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记不达也。”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

二月中山靖王刘胜死。

设立乐府官署。①

[乐府之制,其来已久,殷有瞽宗,周有大司乐,秦有太乐令,太乐丞,皆掌乐之官也。然乐府之名,则始见于汉。乐府之立为专署,则实始于武帝。《两都赋·序》:“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孝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汉书·外戚列传》: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云云。]②

春,命终军使南越。

南越王及太后上表请降附。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王、王太后。

[汉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王赵兴和太后请求举国“内属”,进一步密切和中央政权的关系,使南越的地位“比内诸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诸侯王。但握有实权的丞相吕嘉(越族土著》却不同意,竟杀掉了赵兴、太后和汉朝使者。元鼎五年,汉武帝派兵攻伐,并于次年灭南越,在原地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

元封元年汉师渡过琼州海峡,进入海南岛,并在这里新设置了儋耳、珠崖二郡。《汉书·地理志》说:“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

---

①元狩三年始立乐府,本年复设乐府官署。

②顾亭林曰:“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人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奏昌邑五,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后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傅韦元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日知录》卷二十八)是知乐府者本--制音度曲之机关,其性质与唐之教坊,宋之大晟府,初无大异。惟其职责,在于采取文人诗赋及民间歌谣,被之管弦而施郊庙朝宴,故后世遂并此种入乐之诗歌,亦名曰乐府焉。

珠崖又名朱崖,以位于大海中的崖岸之边、出产珍珠而得名。它的辖境包括今海南岛的东北部,治所在瞫(shēn,音审)都,即今海口市。儋(dān,音担)耳,据说因为当地民俗雕刻脸颊之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而得名。它的辖境相当于今海南岛的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县。]

6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秋,作“宝鼎”、“天马”之歌。

是岁,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造铸。

[《汉武故事》:“上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作‘秋风辞。’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芬,怀佳人兮不能忘,浮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杨素波,箫鼓吹兮发櫂歌,欢乐尽兮忘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方士栾大进言,谓“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仙人可致”。武帝发觉其诈而杀之。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已巳),45岁。

冬10月,行幸雍,祠五帝。

11月,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

[元鼎五年,立太一祠坛于甘泉,五帝坛环居其下:此谒款天神也。元封元年(前110),自登单于台,祭黄帝冢还,幸緱氏,礼祭中岳太室,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此勒功中岳也。遂东巡海上,还至奉高,礼祠地主于梁甫;封泰山,禅肃然:此封禅泰山、梁甫也。太初元年(前104),诏儿宽等议历,司马迁等造历,乃改历,以正月为岁首:此改正朔也。色尚黄,数用五:此易服色也。董仲舒、司马相如等鼓吹于建元至元狩之际(前140-117),而武帝于元鼎四年至太初元年十载之间(113—104)一一行之,其足以鼓舞民心,革新百姓之行止者为何如哉?]

元鼎四年4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王后、王太后。

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出桂阳,主爵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发兵征讨。

[元鼎五年,南越叛汉,汉武帝想从犍为郡征发南夷兵。但当地夷人不从,遂反叛汉朝,杀汉朝使者和犍为太守。

次年,汉武帝征服南越后,派出由巴蜀罪人组成的八校尉军队进击西南夷。结果汉朝将这里大部分地区平定,设置郡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夜郎侯向汉朝投降，汉在其地设置牂牁（治所在今贵州关岭），同时暂存夜郎国号，以王爵授夜郎侯，诸部族豪酋也受册封。]

9月，诸侯贡金（助祭宗庙称酎金），因成色不足，夺爵者106人。丞相赵周因知不报下狱，自杀。

以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封牧丘侯。

桑弘羊为大农丞。

[时国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倪宽等擅文学，皆为九卿，更进用事。]

西羌联合匈奴，以10万人攻安故，围枹罕（地属陇西郡）。

匈奴攻入五原，杀太守。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庚午），46岁。

春，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扬仆等八校尉出兵（自昆明），击破南越。

平南越，置南海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兵改制，建常备军：期门军、羽林军、屯骑、步兵、越骑、长水（水军）、射声（生）、虎贲、胡骑七校尉。又设“执金吾”。（即执金钺也。）]

[《郊祀志》：既灭南粤，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进。召见李延年妹李夫人。]

冬10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中尉，河南、河内卒10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置护羌护尉。

纳左内史倪宽议，开六辅渠。

以司马迁为郎中，奉使巴蜀、滇中。

秋，东越王余善反。遣龙颜侯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破东越。

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

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郡。自令居以西向居延泽（罗布泊）建立军事障塞，以卫护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

[元狩二年，匈奴西方主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本年分武威为张掖，酒泉为敦煌。均乃月氏故地也。此为河西郡，乃开通西域之道（丝绸之路）。而匈奴与西羌之交通遂绝。迫使匈奴再向西迁。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

斥塞卒六十万人屯田之。而敦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上令诸儒采《尚书》、《周礼·王制》,草封禅仪,数年不成。武帝乃亲自制仪,以采群儒,或曰不与古同。于是尽罢诸儒。]

李夫人死。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喜歌舞,武帝爱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妙丽善舞,由是乃幸,生一男,是为昌邑王。李夫人少而早卒。上闵焉,图其形于甘泉宫。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文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相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载?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见。上曰:夫人第(但)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主帝,不在一见。上复言,夫人遂转向嘻嘘不言。上不悦而去。夫人姊妹让之曰: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非畏恶吐弃我,意尚肯追思闵我兄弟哉?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李夫人言:宫中多蛊气,必伤圣体。言终而卧,遂卒。既殡,香闻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空棺无尸,唯衣履存焉。起通灵台于甘泉,李夫人葬云陵上。为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御鉴一百三十六类聚九十一初学记十。)]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辛未),47岁。

10月,武帝巡边陲,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率十八万骑,北巡至朔方,临北河,以威匈奴。

匈奴王庭迫于汉军攻势,远迁大漠以北。

遣使告谕匈奴单于臣服。

[派使臣告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单于能战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也。不能即南面而臣。何徙远亡走,匿于幕北苦寒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何按:匈奴之患至元封王庭北迁,已告解除。武帝对匈之战争,至此后而乃由防

御转为开拓,即“开边”,占领土地,运行商业,以求搜求远方异品奇货。卫太子(包括卫青)不赞成之,要求转变路线。]

春正月,东巡海上,令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人。

上以卜式不司文章,贬为太子太傅,以倪宽为御史大夫。

汉兵入东越境。东越人杀东越王余善降汉。

迁其民人居于江淮间。

夏4月,封禅泰山。大赦天下。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

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归于甘泉。

《后汉书·郊祀志》:“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诸儒,多言不合古。于是置诸儒不用。三月,上车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颠,遂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

[何按:武帝尊儒而斥黄老。黄老之学退出政治,而其中言天道者乃与方术修仙炼丹之学(邹衍之学)相融合,尤盛于东。武帝中年后多病,为长寿求仙而进用方术之士,遂亦大受其惑。武帝之后,方仙道术之学传习于民间,至汉末而兴起为天道教及天师道教。此即道教之起源。]

[元封元年,武帝始建汉家之封,而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遂发愤死。将死,执其子迁之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不得从行,是命也!”]

司马谈死于本年。

5月,以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丞,尽管天下盐铁。于郡国设均输机构,设均输盐铁官,主盐铁专司,置平准于京师,督天下运输,货物统购统销,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稳定物价。罢告缗法。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郡国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员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仰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傍)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溢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者再百焉。

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为御史大夫。

(武帝后)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定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盐铁政遂废。]

齐王闳死,无子,国除。

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出丹东,击胡鲜。

["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至玄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为言。"]

是岁,赵信死于匈奴。

乌孙王遣使献马,并求通婚于汉。

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壬申),48 岁。

至瓠子,视察黄河决口处。沉白马、玉璧于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卒填决河。作"瓠子之歌"。

以司马迁继父司马谈为太史令。

[《廿二史札记》:"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年,迁为太史令,即细石室金匮之书……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任安得罪将死之时),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原名"太史公记")前后共十八年。"]

筑甘泉宫通天台、长安宫飞廉馆。

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募天下死罪囚徒攻朝鲜。

作"芝房之歌"。

派郭昌、卫广为将,入巴蜀平定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

[“滇王者庄跻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割牂牁、越嶲各数县配之。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以杜周为廷尉。

[周外宽,内深刻,其治大体仿张汤。时诏狱益多,食二千石俸禄涉案人员不减百余人。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捕至六七万人,官吏因之益加十万余人。]

[周为廷尉,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旨意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安在乎?前王所是著为律,后王所是书为令。当时为是,何法之古乎?”]

设益州郡。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癸酉),49岁。

十二月,赵破奴攻破车师国,虏楼兰王。复封浞野侯。(楼兰西域国名,后更名鄯善。)

柏梁台建成。“元封三年,作(成)柏梁台,召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者,乃得上座。”[①]

“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七言诗自此始。”[②]

初作角抵戏、巴俞戏。(角读为决,较也。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汉后更名为平乐观。)三百里内民皆入京来观。

夏,朝鲜国相斩其王右渠归降汉朝。诏以朝鲜地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

绥国遣使通译于汉。[③]

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左将军荀彘坐争功弃市。

7月,嫁江都王刘建女细君公主与乌孙,遂与乌孙王结盟。

[乌孙使使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乌孙以子匹聘汉公主,汉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昆莫为右夫人。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为左夫。

---

①《太平御览》卷352引《东方朔传》。又见《初学记》卷12。

②《世说新语·排调》刘孝标注引《东方朔传》。

③《后汉书·地理志》。

细君悲歌曰:“吾家嫁我天一方,远托异国乌孙王。穹庐为室毡为墙,以肉为食酪为浆。居常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何按:据近人考证,乌孙族原活动在河西,汉初,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为当时西域之最大方国。日人羽田亨认为,乌孙语属突厥语。其种属,为高加索人种。唐颜师古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焦氏《易林》:主:“乌孙氏女,深目黑丑,是其形异也。”乌孙产马,马质优良,今传伊犁马。文帝前元四年为匈奴征服合并,至此乃与匈奴相分离也。]

元封四年(公元前 107 年,甲戌),50 岁。

冬 10 月,上南巡行至雍。祠五帝。

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至河东。

诏赦死罪以下,赐无出今年租赋。

匈奴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匈奴使者病死长安。匈奴单于以为汉拘禁之,乃用赵信议,遂扣留汉使路充国。数以奇兵犯边。

武帝遣将军郭昌、浞野侯赵破奴屯朔方备胡。

作为元狩、元鼎以来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和擅的结果,元封四年(前 107)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引起了政局的动荡。

[“元封四年(前 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谪之。”

由于连年兴兵和重赋,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亡。加之以“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愁,盗贼公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如果官府处置不慎,势必进一步“摇荡百姓”,其后果武帝是知道的。所以他下令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并重责丞相石庆,以图平息事端。][1]

赵信死于匈奴。

---

①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乙亥),51岁。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冬,武帝南巡,望九嶷山,登天柱山,泛长江,近枞阳,北到琅邪,观东海。

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面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上幸河东,所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浮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兮发棹歌,极欢乐兮哀情多。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御览八十八)。]

3月,封泰山,加封禅。还京住甘泉宫。4月,赦天下,所幸县免岁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者粟。

大将军卫青卒,命起冢置茂陵,象庐山。

[初,上年29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已。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战,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之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

[尤侗《艮斋杂说》:“自武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父子立异。安能无巫蛊之祸乎?”“《周礼》一书,诸儒皆以为周公作,然武帝独谓其渎乱不经,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

4月,全国分为十三州郡,每州置刺史,直接向皇帝奏事。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诏以六条问事。

[六条:(1)劾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2)二千石背公徇私,侵渔百姓。

(3)二千石不恤疑狱,肆意杀人。

(4)二千石选举不平,亲阿所爱,蔽阻贤路。

(5)二千石子弟依仗权势,请托所监。

(6)二千石阿附豪强,害损政令。触之皆案灭三族。]

董仲舒死,享年93岁。

将军苏建死。

[苏建语司马迁云:“吾常责大将军至尊重,宜择贤。大将军谢曰:自昔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仿此意。”苏建,苏武父也。]

是岁,下求贤诏书,令州郡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时汉廷已乏人材矣。)

[武帝本年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不羁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章太炎云:“汉之地图,盖甚精审。《武帝记》: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在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按舆地图乃及匈奴之一井,则其精审可知。”]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丙子),52岁。

冬,外巡归。

春,作首山宫。

3月,巡视河东。祠后土。作“秋风辞”。

[《汉武故事》:“上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作‘秋风辞。’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芬,怀佳人兮不能忘,浮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杨素波,箫鼓吹兮发棹歌,欢乐尽兮忘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益州、昆明反,遣军击之。

秋,乌孙使者以汉广大,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

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

[“昆莫年老,言语不通。昆莫欲使其孙岑娶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武帝。

武帝答书曰:‘宜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

昆莫死,其孙岑娶代立,为昆弥。"]

汉使西逾葱岭,抵安息。

安息使以大鸵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乌维单于死,子乌师卢单于立。匈奴迁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汉令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以待之。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丁丑),53岁。

冬十月,巡登泰山。十二月,东临渤海。望祠蓬莱山。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

二月,起建章宫。

[《汉官仪》:"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军。又取从军死烈士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后汉书》顺帝纪李贤注引)]

五月,故丞相公孙弘、太中大夫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所改订新历法完成。此即"太初历",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此前沿用秦正,以十月为岁首)。采用"五行",色尚黄,数用五,重定宗庙百官之仪。协音律,以为典常,垂之后世。

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武帝本纪)改尚右为尚左。①

[汉初,沿用秦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但到汉武帝时,由于所代久远,日月差数无法校正,甚至出现"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情况。

于是由司马迁、落下闳、唐都、邓平等人创制新历,并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由皇帝颁行,称为《太初历》。《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并规定无中气(每月两个节气,月初为节气,后半月的为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还记有日、月食周期。《太初历》是中国历法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共实行了一百九十年。]

七月,东巡至泰山。

八月,命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

[《大宛传》:上欲侯宠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以往伐宛。]

[先,汉使入宛求马。宛不予。杀汉使,取其财物。

天子怒。掌使宛者姚定仪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可尽虏

①商人尚右,周人尚左,但中原商之遗族仍尚右。楚尚左。秦尚左。汉初尚右,汉武帝改尚左,用周制也。

矣。"帝欲侯宠姬李氏,乃拜李氏兄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以郡国恶少年无赖数万人,往伐。司马光曰:"其意以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

关东蝗灾,西飞至敦煌。

司马迁于是年迁太史公,纂《史记》。(年42岁)

始设大司农。

[《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于是谕次其文。"]

[元光二年,《汉书·五行志》记:"自是(案指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萧望之传》张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谓三十余年,具体说是三十二年。《汉书·西域传·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

[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前102),是西汉历史上的重要年代。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管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

[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治理的。

武帝一生绝大多数事业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116—111)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可以说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或云董仲舒死于本年。以高寿86-88岁,寿终于家。]

太初二年(公元前 103 年,戊寅),54 岁。

正月,丞相石庆薨。

三月丁卯,以公孙贺为丞相。

[“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苛严。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数。公孙贺大哭,不乐受印绶。”]

[“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顿首涕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受,出曰:我从是殆矣。”]

2 月,武帝巡视河东。祠后土。

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无功而返。兵还至敦煌。武帝怒,使使至玉门传诏:“军有敢入关者则斩之!”

[李广利不知兵。“贰师将军之西也,既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城守,不给食,攻之不能下。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瘦,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甚众。引兵还,至敦煌,士余什一二。”]

秋,遣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里,击匈奴。军去不还。

[匈奴八万骑围击之,绝汉军水源。赵破奴率小队亲自夜出觅水,匈奴闻知掩捕,生得之。因急击其军,军遂没于匈奴。]

冬 12 月,御史大夫倪宽卒。

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已卯),55 岁。

春正月,东巡海上求神仙。

4 月,封泰山。

是岁,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于五原塞外,筑城列亭障千余里。

使路博德筑城居延泽上。

以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

匈奴儿单于死,子年少,立其季父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

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掠数千人。行破坏徐自为所筑城亭列障。军正任文击救之,匈奴失所掠而去。

[公卿议请罢征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以宛小国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

马不来。遗外国笑。

乃案治言罢宛者邓光。赦囚徒,发恶少年没边骑,复出敦煌六万人。

贰师将军复围宛。宛城无井,出水工断其所开水路。天子增发甲兵十八万,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卫酒泉。发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故有市籍者凡七科,谪为兵。悉给贰师。]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庚辰),56岁。

复下征匈奴诏。

[本年武帝伐匈奴诏:"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李广利破大宛,得汗血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斩大宛王首。然汉军马损失数量远过所获者。

["贰师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攻不下。破而屠之。至宛,兵到者三万。攻之四十余日,宛内乱。求降,献马。汉军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三千余匹。罢兵。"]

春,汉军捕得楼兰王。是岁,大宛破后,汉自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起亭障。于轮台、渠犁置屯田。每屯田率数百人,军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远至赤谷(今中亚伊塞克湖南岸)。

李广利回京师,途中所过西域小国,听说大宛被攻克,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入京师为人质。

四月,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

[武帝日夜思念李夫人不已,为作诗曰:"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又为作"秋风赋"悼之。《外戚世家》:"李夫人早卒。其兄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佞幸传》:"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久亡,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姿。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杀延年兄弟宗族。"《功臣表》:"广利封海西侯,在太初四年四月。则延年兄弟坐奸族,当在太初二、三年;李夫人之卒,亦当在其时也。"]

匈奴欲发兵阻李广利征大宛,闻大汉兵盛,未敢动。

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皆得职。

[余嘉锡论武帝求马此役曰：

汉武帝使李广利将兵伐大宛，取善马，太史公极非之，故以微文讥刺。传中盛陈出兵时牛马杂畜兵弩粮草之多，以见其劳民伤财，疲弊中国以事四夷，死士卒数十万，而所得善马不过数十匹，所以讥汉武者深矣。王允谓司马迁作谤书，不虚也。

桓宽《盐铁论·西域篇》曰："有司言外国之事，议者皆徼时之权，不虑其后。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心焉，乃大兴师伐宛，历数期而后克之。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

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

当此时，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赖先帝圣灵斐然，其咎皆在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为主计若此，可谓忠乎？"此其归咎武帝，与司马迁之意同，后之论史者莫不从之。

余以为迁责汉武骚动天下，及广利不爱士卒，皆是也。独谓伐宛之役为闻天马而甘心，一似武帝有爱马之癖者。夫武帝虽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用汲黯语)，亦一世英明之主也，岂其因欲实天厩，备法驾，遂以数十万人之命，易数十匹之马，贵人贱畜，一至于是哉。且贰师出兵用马至三万馀匹，而所得宛马不过三千馀匹，是时方患马少，以十易一，智者必不为也。

盖匈奴行国，人人便骑射，汉兵常出塞数千里，与之鏖战于沙漠之间以争胜负，其势不能不多用骑兵，欲练骑兵，不能不养马。

中国之马，本不如匈奴所产之良，故晁错曰："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汉书》晁错上书言兵事。)

是则汉与匈奴，不必交战，固已情见势绌矣。况又屡经战阵，马之死亡且尽，故武帝大修马政，广求善种以求其蕃息孳生，其闻天马而其心者，欲得汗血之种也。司马迁非不知之，而言之不明，遂使后人莫知汉武之用意耳。

今以《汉书》考之，武帝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见《食货志》。)卫青、霍去病之伐匈奴，所将少者万骑，多者十馀万骑。(见《卫霍传》及《匈奴传》。)

元朔六年，卫青比岁击胡，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见《食货志》)。志承《史记平准书》之旧，叙事不明载年岁，第云其明年或后几年。今据颜师古注及《平准书》注补载年号，注所无者，以前后事推定之。

元狩二年，马生余吾水中。(见《武纪》)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长安者数万匹。三年，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见《食货志》)四年，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大出击胡，出塞之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二万匹。(见《食货志》及《卫霍传》)

又《匈奴传》云，“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自此至青之卒，凡十四年，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故也。(见卫、霍传)青以元封五年卒，自元狩四年至此凡十四年。其后又三年，是为太初二年，始遣赵破奴将二万骑伐匈奴。

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见《武纪》)元鼎二年，乌孙发使送张骞还，因献马数十匹报谢。(见《张骞传》及《西域传》)

四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礼乐志》作元狩三年，此据《武纪》。

《史记·乐书》云：“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大一之歌。”其歌辞与《礼乐志》不同。

五年，令民得畜边县。(注：孟康曰：“令得畜牧于边县。”)官假牡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六年，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官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见《食货志》)

“元封元年，帝巡边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威震匈奴。”(见《武纪》)

“盖自元狩四年后，未尝与匈奴战，至是经十年之畜牧，始稍蕃息矣。然去年尚言车骑马乏，今年何遽多如此，盖汉时养马常至三十余万匹。十八万骑，未为多也。故亟亟焉求马于西域。会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乌孙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见《西域传》)

徐松补注以为事在元封初，今从之，故次于此。大宛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始为武帝言之。(见《西域传》)

天子好宛马，使壮士持千金及金马请宛善马，宛王爱其宝马，不肯予。(见张骞传及西域传)太初五年秋，遣李广利伐大宛，四年春，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

西极天马之歌。(见《武纪》)言西极天马者,以别于元狩四年所作之天马歌也。(礼乐志无西极字,史记乐书所载歌辞与礼乐志不同。)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见《张骞传》)

计武帝凡四得善马,其生渥洼水中及得自乌孙大宛者皆号天马。

元狩四年"天马歌"曰:"沾赤汗,沫流赭。"是渥洼神马亦汗血。又当时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故与大宛汗血马,同得天马之名。初得乌孙马,亦以天马名之,独生余吾水中者无闻。盖自武帝以后,汉所养马固多名马种矣。

向非武帝求马于四方,则死亡羸瘠之馀,汉之战马,岂复可用乎。]

[元光六年卫青改变战略,长程出击,兵至龙城。

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河南之战)两年后复出高阙,破右贤王部。

元朔六年,出定襄渡大漠,回击破大单于本部,迫使之庭北迁。(渡漠之战)

元狩二年,霍去病渡漠,直取河西,过焉支山千里。击破匈奴左部。打通河西走廊。(河西之战)

太初四年,复下征匈奴诏。李广利破大宛。开拓西域。(大宛之战)]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辛巳),57岁。

因连年苦旱,改元"天汉",以祈甘雨。

春正月,巡幸甘泉宫。

三月巡行河东。祠后土。

匈奴句黎湖单于死,匈奴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3月,匈奴使使来献大羽、白牦。派中郎将苏武遣送匈奴在汉使臣。

苏武持节被拘于匈奴,流放于北海(贝加尔湖)。

[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尽归所拘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曰:"我儿子,汉天子我丈人也。"

上嘉单于之义,遣中郎将苏武送汉所拘匈奴使者,厚聘单于,答其善意。既至,单于大骄,非汉所望也。

匈奴中被虏汉故将及浑邪王姊子,及卫律部下,阴与武副使张胜谋,欲劫单于母

阏氏(南宫公主)归汉。卫律者,父故长水胡骑将。与协律都尉李延年善,延年荐律使匈奴。闻延年家败,遂降匈奴。单于厚爱之,与谋图事,立为丁零王。

后月余,单于出猎,张胜等劫阏氏欲发,单于子弟发兵与战,俘虞常张胜。单于使卫律治之。

武恐辱国,引刀欲自杀,不死。卫律抱救之,单于壮其气节,欲降之。武不屈。 囚武大地窖中,绝其饮食。

天大雪,武卧寒地,啮雪与毡毛咽之,十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武坚不降,乃徙武北海无人之地,使牧羊。曰公羊有奶乃放汝归。武持节牧。]

[《前汉书》载苏武在匈奴。卫律白单于,幽武大窖中,绝不与饮食。天雨雪。武卧齿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刘向《新序》又载武在匈奴,卫律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当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剧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剧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饱食安眠于广厦之间,隆寒盛暑,优游自得,而犹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苏武者,故左将军平陵侯苏建子也。孝武皇帝时,以武为移中监,使匈奴。是时匈奴使者数降汉,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当。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武不从。乃设以贵爵重禄尊位,终不听。于是律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又当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称曰:“臣事君,上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守节不移,虽有鈇钺汤镬之诛而不惧也,尊官显位而不宋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余岁,竟不降下,可谓守节臣矣。《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苏武之谓也。匈奴治言武死,其后汉闻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义,归武。汉尊武以为典属国,显异于他臣也。(新序)]

赵破奴自匈奴逃归。

5月,发谪戍屯五原。夏,大旱。

以济南太守王卿为御史大夫。

河间献王德及孔安国献古文经传。

[何新按:今古文之争,是汉初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继续。古文派在政治上的最大支持者之一,是河间献王刘德,武帝之异母弟。大量收集古文经典,并多次来献古文经,希望武帝据“周礼”及周公古义而改制度。武帝冷遇之,将其所献经典束之高阁。又讥讽他说,汤武周公,都起家于百里之地,你努力吧!献王闻言惶恐忧惧,不久病死。

[蒙文通言：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长时间在经文上所存在的今古文学之争，便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今文学上承孔子、子夏、荀子传自先秦儒家，其学术各有师授。古文学上承周公，鄙薄孔子；创自西周末，其讲论是笃守旧典。故今文学所讲是理想制度，古文学所讲是历史陈迹，两者迥然不同。然而却又都在六经的旗帜下讲论学术，当然就要形成誓不并存、互相攻击的局面了。古文学家说今文学家"信口说而违传记"，"怪旧艺而善野言。"但是，正是这些"口说"和"野言"中包含着今文字不敢公开宣讲而抨击时政的微言大义。

六经是"旧法世传之史"，六经之能脱离旧法世传之史而上升为"圣经贤传"，成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的学术体系的经学，则正是由于今文儒生们依附六经灌注了自己的思想，依附六经寄托了自己的整套理想制度。

今文学的理想及选举、任贤是一个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全国普遍建立学校是在受教育和作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禅让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议论政治上的平等。

在这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再以才德的高下来判分其地位，才德最高的人可以受命而为天子，其次可以为诸侯、卿、大夫、士，其不称职者可以黜免，同时又还有辅助政府的议政机构。从形式上看，应当说这是一个气魄雄伟、规模宏大的有理论根据有具体办法的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

[今文、古文争得很剧烈。西汉立的十四个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时才立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对古文经学成为官学。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曾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博士。

(1)古文派主张封国的大小不能变更：一定要分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

今文派注重现实，主张分三等，把公与侯的封国面积一律缩小为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与男的一律缩小为方五十里。

(2)古文派坚持山泽皆入官，自然资源如山林川泽之利，他人不能利用，平民或工商业者不能采取。

今文派主张山泽无禁，自然资源公开。古文派重传统形式，举行丧礼，不惜尽量铺张浪费，也就是主张厚葬。今文派反此，主张薄葬；而且把日期缩短，也就是所谓短丧。

(3)古文派主张封国割据称伯(霸),各伯(霸)一立。

今文派与此相反,主张统一尊王,也就是所谓“王天下”。

(4)古文派既主张各伯一方,则天子巡视各国的次数,便愈少愈好,主张十二年才巡视一次,也就是十二年中,上级只巡视下级一次。今文派认为上级巡视下级的次数要多,主张五年巡视一次。古文派凡高位如“卿”之类,主张世袭,也就是权利不外溢,父死子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且卿的名额乃至大夫、士的名额都可以无定。

今文派不然:既反对“卿”的世袭,要用选举;而且要限定卿、大夫、士的名额,不许增多。

(5)古文派既重割据称伯,地区较小,所谓社稷之祀的对象,便多带地区性,以“人鬼”为对象。

今文派是主张“王天下”的,要用代表性的较大的“天神”代替“人鬼”,作为社稷之祀的对象。

(6)古文派重传统的形式,所谓七庙之祭,日、月、时(四时)都要举行。

今文派不然:反对传统的形式,尊重当前的现实,对七庙的祭祀,大加简化,只要时祭一种。

(廖平(季平)在《六译馆全书》之一的《今古学考》里列举了五个不同之点。)]

[汉代所立十四博士都是今文派。十四博士的次序,依周予同《经今古文学》里的安排稍加简化如下:

《诗经》有鲁(申公)、齐(辕固)、韩(韩婴)、三家。鲁诗、韩诗,文帝时立博士。

《尚书》三家同出于伏胜。武帝时立书欧阳氏博士,宣帝时添立大、小夏侯。

“礼经”有大戴(德),小戴(圣)二家。(此外还有庆普一家,因庆普未立博士,故略去)诸家同出于高堂生,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为二家。

易经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四家同出于田何。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为施、孟、梁丘三家,元帝时又立京氏。

春秋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二家同出于胡母生、董仲舒。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

上面这十四位,无一例外,通通是今文博士。汉初民间已流传和教授《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传》等古文经传,但未得列于学官。

《今古学考》说:“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西汉之时,天子喜经文之利己,遂并其籍而崇之。”]

[发明植物纤维纸的时间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近年出土的“灞桥纸”(麻纤维制)为武帝时物。]

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壬午),58 岁。

春,巡行东海。

夏 5 月,命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击胡。贰师将军击右贤王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匈奴大军围李广利,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军陷重围,假司马赵充国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阵,李广利随而脱。汉武帝在行辕视赵充国创伤,嗟叹之,拜为中郎。

李广孙骑都尉李陵,主动请缨,愿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策应贰师。北行 30 日击匈奴,至浚稽山,被匈奴大单于自率三万骑兵包围。李陵奋战,矢尽道穷,不获救兵,投降。

司马迁为李陵进言。

[陵者,李广孙,敢兄当户之子。上使陵为贰师将军督辎重。陵稽首曰:“愿得自当一队。”上曰:“吾无骑与汝。”陵曰:“不用骑,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遇,以骑三万攻陵。陵千余弩俱发,应弦皆倒。虏还走上山,陵追击之,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贤王,驰兵八万骑攻陵。陵且战且却,南行数日,抵山谷中。复大战,斩首三千余级。

引兵东南,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烧陵,陵亦令军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自步斗树木间,复杀虏数千,因发连弩射,单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单于曰:‘此汉精兵也,晶夜引吾南行近塞,得无有伏兵乎?’诸军长皆曰:‘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胜,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是日,战数十合,复力战,杀伤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中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大喜,进兵使骑并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趋降!”遂庶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尽,即弃车去。士卒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单于人遮,从山上坠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败,吾死矣!”军吏或劝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壮士也。”陵叹曰:“使人有数十矢,足以免矣,今无兵复战。”令军士人持三升火米,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虏鄣相待。陵与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数十人。虏千骑追之,延年死。陵曰:“无面目以报陛下!”遂降。士卒

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塞百余里。

单于以大女妻陵,立为右校王。上闻陵降,大怒,大臣忧惧。太史公司马迁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遣贰师将军出时,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持,而贰师无功。上以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陵闻之曰:"教单于为兵者,乃绪也,非陵也。"李绪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绪诛,乃使人刺杀绪。(《汉纪》)]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郡、国二千石为治吏大抵多酷吏。以酷法严治贵戚、权贵及豪强,法诛并用,饮食连坐。

[《廿二史札记》:《杜周传》:"武帝时诏狱益多, 二千石击廷尉者不下百余人,其他狱案一岁至千余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既到,狱吏责如章告,不服,则笞掠定之。于是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赠犹相告言,大抵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是可见当日刑狱之滥也。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

"东方群盗起"。泰山,琅琊农民暴动起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出兵弹压。拜直不疑为青州刺史。

[时关东农民起义军纷起,大者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小者以百数掳掠乡里者不可胜数。泰山、琅邪有徐勃等,南阳有梅免等,楚有段中、杜少等,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等。起义历经数年。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赴各地镇压。暴胜之奏杀(经奏报批准而杀)二千石、诛(不经奏报而杀)千石以下,及与起义军通行、饮食而连及者,大郡至万余人。作"沉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所捕人数不足)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主管之人)皆死。"以后地方官与小吏多隐匿不报,以全身避法。]

颁《沉命法》,凡二千石以下察捕盗贼不力者,皆处死。

[赵翼论曰:"汉武时,酷吏盛行,民轻犯法,盗贼滋起,大者至数千人,攻城邑,掠库兵。帝使光禄大夫范昆、[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发兵,斩首或至万数,并诛通行饮食者。数年稍得其渠率,而散亡者又聚党阻山川。无可奈何,乃作沉命法,盗起不发觉,觉而勿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后小吏惧诛,虽有盗不敢发,恐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益多。"

《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天汉暴动较详,认为主要原因是酷吏专断,"吏民益累犯法,盗贼滋起"。《汉书·王莽传》则认为连年征伐是天汉暴动的直接原因。大抵天汉暴

动是元封流民骤现形势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来势更猛。]

秋，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

派直旨绣衣使者，持节，虎符，以监郡守。

以匈奴降将成娩为骑将，率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驰援，汉兵不利。引去。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癸未），59岁。

正月，陵兵败书闻。廷辩，司马迁为李陵进言，获罪下狱。

2月，初榷酒酤。

3月，东巡求神仙，封泰山。

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

怠厌方士怪迂语。然犹希冀能见仙人，得长生不老术。

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弃市。

以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

[（杜周）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天汉四年（公元前99年，甲申），60岁。

春正月，朝诸侯于甘泉宫。

春3月，巡行泰山。

夏四月，立皇子刘髆为昌邑王。

5月还京，居建章宫。

9月，令罪人入钱赎死。

派李广利，路博德，韩说将十万人击匈奴。不利，还。谣传以为李陵为匈奴练兵。

[春，李广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击将军韩说出五原。因杆将军公孙敖出上谷，皆击匈奴。]

[遂下诏，族李陵家。其实被俘而教匈奴兵法者，降将李绪也。武帝灭李陵族后，李陵恚恨，乃杀李绪。]

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进言，罹罪当死。家贫，不能自赎，乃以身赎为宫刑。（是年迁约48岁。）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弓,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圣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①]

单于以女妻李陵,立为右校(贤)王。

匈奴大阏氏(汉南宫公主)欲杀李陵。单于匿之于北方。②及大阏氏死,乃还。

太始元年(公元前 96 年,乙酉),61 岁。

春正月,因杅将军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立钩弋夫人。

---

①《汉书·司马迁传》。王夫之对此颇多讥议:"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逆也,固非迁之期得而为文焉者也。"(《读通鉴论·武帝》)

②李陵入匈奴后,被封为右贤王。《新唐书·回鹘传》:"黠戛斯(吉尔吉斯),古坚昆国也。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部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宋书·索虏传》:"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李陵之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多立名者,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魏虏传》:"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我疑西周时之姞姓戎,即黠戛斯种也。)

[《汉书·外戚传》:"孝武钩弋赵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居钩弋宫,大有宠。"]

[倢伃位视上卿,比列侯,第二十级爵。]

[云阳陵,汉钩弋夫人陵也,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钩弋赵婕妤,昭帝之母,齐人,姓赵。少好清静,六年卧病,右手卷,饮食少。望气者云"东方有贵人",推而得之。召见,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钩。后生昭帝。武帝末年杀夫人,殡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时乃止。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

任命司马迁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

[《百官公卿表》有中书谒者,即中书令。中书令之职,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汉旧仪》:"中书令须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又称尚书令。]

太始二年(公元前 95 年,丙戌),62 岁。

春正月,行幸回中。

3 月,诏更黄金为麟趾金币,以班赐诸侯王。

凿白渠贯渭,长 200 里。可灌田近 5000 顷(29 万亩)。

秋 9 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御史大夫杜周卒。

以赵人江充为水衡都尉。旋拜为直指绣衣使者。

使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中意。

[江充,赵邯郸人。曾为赵敬肃王客,得罪赵太子丹,乃诣阙举报太子阴事。太子生废。上召充入见,由是有宠。]

[何按:江充,疑或匈奴敌谍也。

《汉书》充传:江充,字次倩,赵邯郸人也。充本名齐。有妹,善鼓琴,歌舞。充媒嫁之赵太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

久之,太子疑齐以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遂绝迹。

亡,西入关,更名充,诣关,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书奏,天子怒,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廷尉杂

治之，法至死。赵王彭祖，武帝异母兄也。上书讼冤，不许。竟败赵太子。

帝召充，自请愿以日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谷单衣，曲裾后垂，交输。(张晏：曲裾者如妇人衣。如淳曰：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案：即燕尾服。)冠禅丽步曰摇冠，飞翮之缨，(何案，疑实为胡冠。王先谦注谓步摇冠别名慕容。慕容，胡语。此冠乃燕代乡俗。)充为人魁岸，容貌甚状，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充至，问以当世政事，上悦之。

充言自请愿使匈奴。诏问其状，曰："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不可预图。"

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旨绣衣使者(何案：锦衣卫前身)。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

[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奏"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请求愿入钱赎罪，上许之。输钱北军凡数千万，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

皇子弗陵生。母赵婕妤，居钩戈宫。妊身14月而生。上曰"似尧"。乃命其所居门曰"尧母门"。

[何按：赵地近匈奴。而江充、赵倢伃皆来自赵地。此二人对武帝后期政治变动影响关系至大，导致了卫氏及卫太子的倾覆。其来历颇不寻常，岂偶然乎？]

秋，大旱。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首起池阳谷口，尾入阳渭中，袤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成云，决渠为雨，水流窀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百万余口。"言此两渠之饶也。

["郑国，昔韩国之小水工也。韩患秦东伐，欲罢劳之，乃遣郑国说秦，令凿渠引泾水自中山以西抵瓠口为渠，缘北山，东注洛水，三百余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万余顷，收皆一亩一钟。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之忧，秦以富强，因以名为郑国渠。"]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丁亥)，63岁。

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来客。

2月，令天下大哺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

冬,赐所行过户五千钱,鳏寡孤独赐帛,人一匹。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戊子),64岁。

春3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12月,行幸雍,祠五时,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已丑),65岁。

[何按:以“征和”为年号,取“政和”即政通人和、和平之义也。又,征和,息征和平也。以征和为年号,表明武帝此时已有转变内外政策之意。]

夏,巫蛊祸始起。

[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龙华门,疑刺客,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上疑以为奸鬼为祟,疑为巫蛊。

丞相公孙贺夫人卫君孺,卫皇后之娣。贺子敬声为太仆,骄奢无法,擅移北军钱千九百万,下狱。是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贺请上逐捕安世以赎敬声,上许之。果捕得安世。

安世入狱,笑曰:“丞相灭族矣。”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使王当驰道埋偏人,诅上,有恶言”。上令案验之。]

冬11月,发三辅骑士搜上林,闭长安城门大索。戒严十一日。

大搜上林苑刺客,又搜长安城。(公孙敖)坐妻为巫蛊,族。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巫蛊之祸起于武帝征和元年十一月,整个事件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以丞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为标志。事件的起因是当时诏捕京师大侠朱安世不能得,贺自请逐捕安世为其子敬声赎罪,安世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及使巫祭祠祝诅,并在甘泉当驰道埋偶人,公孙贺因而被族灭。第二阶段是整个事件的高潮,酿成了戾太子、卫皇后母子的悲剧。征和二年,江充等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少傅石德惧诛,劝太子收捕江充等。太子发兵斩充,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城中五日,最后败亡被杀。第三阶段主要以丞相刘屈氂腰斩而告终。征和三年,刘屈氂坐谋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诅,腰斩东市。此后巫蛊案虽时有余波微澜,然均无关宏旨。

巫蛊之祸延绵数年，牵连死者有戾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如石德、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江充、韩说、章赣、苏文、商丘成、张富昌、李寿、莽通、景建等。］

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庚寅），66 岁。

春正月，帝阴疑皇后、太子、宫人不忠，又避长安时疫，帝体亦不痊，乃迁居。行幸常驻于甘泉。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

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

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群臣宽厚长者附太子，而用法深酷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皇后、太子宠渐衰，常有不自安之意。

上与诸子疏，皇后久不得见。近臣常于武帝前谗毁之。"］

江充奉诏治公孙贺牵连巫蛊事，公孙贺下狱。死狱中，族其家。

［征和二年春制诏："故丞相贺，倚旧故，据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

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以困农烦扰富者，重马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离。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狱已正于理"。云云"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

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屈氂乃中山靖王刘胜子。刘胜好内，多子，诸子计一百二十余人。刘屈氂亦庶子也。曾任涿州太守。其子娶李广利女儿，因得重用。

夏闰 4 月，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罪死。

司马迁完成《史记》。

武帝命刘屈氂及御史章赣督察巫蛊事。刘屈氂乃与江充合谋。欲废卫氏，而立昌邑王刘髆。

秋 7 月，江充掘皇后太子宫。太子斩充，炙胡巫上林中。时武帝久居甘泉，太子假诏起兵。

[何按：其时，长安流行瘟疫。死者多，人心不安。民间及贵族皆信巫术。

《史记·龟策列传》："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

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之族。"

睚不快，因公行诛，姿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

"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鬼)道祝诅。"(《汉书》戾太子传)

"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牦车以渡弱水来献香云，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两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凡月余日，香由(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博物志·卷二)

《通鉴》记："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卢植曰：左道，谓邪道也。)变幻无所不为。

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则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

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蛊，字通诅、咒)。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巫蛊及夜祠，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逼之。民转相诬，吏则劾以大逆无道。

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充既知上意，因胡巫(匈奴)檀何言：'宫中有蛊气，邪不除之，上疾不瘥。'上乃使充入宫，掘地求蛊，黄门苏文等助充。

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坐床处。"太子乃起兵诛江充。]

[《盐铁论·国疾》贤良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汤)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谪)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

江充禁服，指的就是江充为使者禁察轩服逾制之事，在贤良看来，这事远远不是一种权宜督察的细小事故，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相当；而江充其人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杜周、杨可并列的重要政治人物。

张汤系自杀死，杜周病死，杨可不知所终，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杀死的。]

武帝令左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于长安。兵败，亡去。皇后卫子夫自杀。

[《史记·外戚世家·钩弋夫人》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可

见卫皇后之死为必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洪迈《容斋续笔》："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

8 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

["治随太子反者，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慰，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搏太子急，太子自杀。"（通鉴考异一。）]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长秋门。因长御倚华，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大乱。黄门苏文逃归甘泉，报太子反。乃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城，归报谎云"太子欲斩臣，臣逃归。"上怒。丞相屈氂闻变，脱身逃。上问："丞相何为？"乃赐玺书令平叛。

太子宣言告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危，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亲驾，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令丞相将之。

太子亦遣使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长安囚人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太子立东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营门不出。

太子引兵，驱长安衔市人，集数万众，至长乐宫西阙下。逢丞相等，会战。计五日，死数万人，血流御沟中。庚寅，太子兵败，南奔杜门（复盎门）。

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诸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太子逃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

8 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自经。]

9 月，以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

北军护军任安牵连卫太子案，以不忠下狱。任安赠书司马迁。

[关于卫太子事变概述：

武帝晚年多病，疑惑有人用蛊道诅咒，令江充"穷治蛊道"。江充说宫里有蛊气。于是武帝就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共同协助江充，到太子宫里，在御

座下面，掘出桐木人子几个。武帝原是卧病在长安西北甘泉宫(陕西淳化县西北地)，皇后和家吏请问，都不得回报。太子“收捕江充”等，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以帝卧病甘泉，江充等谋反，杀江充。章赣和苏文两人逃回甘泉，说太子反了。武帝一听太子谋反，命丞相刘屈氂发兵，和太子交战。他又从甘泉疾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表明了太子说他甘泉病卧，并非实事。戾太子在部署将帅的时候，召监北军使者任安，给以符节，叫他发北军兵助战。可是任安受节闭门，没有发兵助太子。

太子和丞相在长安城里交战五六天，死五六万人，太子终以不能取胜，从复盎门逃走了(长安城南门，又名杜门)。他逃到长安东方偏南的新安县附近的湖县(今河南闵内乡县地)，借住在一个卖草鞋人的家里，不久就被人发觉了。新安县吏亲自带了军队，去逮捕太子。太子的主人保护太子，战死。太子不得已，在八月辛亥日，自经而死。武帝从甘泉回到建章宫以后，愤怒城门司直田仁放走了太子，当即把他诛死。又愤怒御史大夫暴胜之当时阻止丞相直接斩田仁，说“司直是二千石的官，应当请示再加刑”，因此“切责胜之”；暴胜之自杀。

武帝回到长安，赏赐那些击捕太子的人；凡是随从太子的，或是替太子作战的，统统治以重罪。

壶关三老，上书给武帝，说太子当初是受困于“奸臣江充，不能自明，冤结在心，无处告诉，因此忿而发兵，诛杀江充；子盗父兵，并无他意。”高庙令田千秋(即车千秋)上书，申讼太子冤枉。他马上就擢千秋一直升为大鸿胪，后来不久又升为丞相，于是“以事族江充之家，焚苏文于横桥”。武帝心中，悔恨悲痛，达到极点，“深怜太子无罪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武帝原先认为任安是卫青大将军荐举的（卫青是戾太子的舅父），对他不次起用，竟然“坐持两端，以观成败”。因此他对任安不加原谅，而处以极刑大辟。]

11月，武帝将幸甘泉，命司马迁从驾西行。

[赵翼谓，司马迁于本年作“报任安书。”略曰：

“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祥，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1]

①《汉书·司马迁传》。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完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①]

征和三年(公元前 90 年,辛卯),67 岁。

正月,武帝行幸甘泉。

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军北至燕然山(今杭爱山)。

6 月,丞相刘屈氂因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被腰斩,其妻枭首。

[“贰师之出也,丞相为祝道。遂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之。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子。广利女为丞相子妻,故谋焉。时内谒者令郭穰在侧,归告帝:‘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将军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按验,罪大逆不道,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收广利妻子。”]

同月,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

[广利与匈奴战,初胜,有斩获。后妻子被收,传至军前。广利不安,内生变。匈奴乘机集大兵围之。广利遂降。]

9 月,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书,讼太子冤,武帝感悟。征拜田千秋为大鸿胪。

同月,灭江充九族。

焚苏文于渭桥上。

①《汉书·司马迁传》。

武帝怜太子无辜，于长安作“思子宫”、于湖县太子死处作“归来望思之台”。

司马迁著《太史公记》(《史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汉书·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名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司马迁父子之所作也。”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先人，司马谈也。因书为两代人所纂，故不无舛误矛盾不合之处。《汉书·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1]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壬辰)，68岁。

3月，躬耕巨定。诏罢劳民伤财及神仙之事，驱逐方士。

诏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船，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于下愁苦，所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拜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侯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拜千秋为丞相。”]

[上召见群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皆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何按：由此可见，武帝之所以尊崇方士，与当时瘟疫流行有关。)

[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新序)]

夏6月丁巳，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心，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二千石以上俱寿颂德，美劝上。

上报曰：“朕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毒士大夫。至今余巫

---

[1]《汉书·东平王思传》：“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后汉书蔡邕传》引王允曰：“武帝不杀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

颁脱不止，朕甚愧之，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

（何按：于此言，似可知巫蛊之祸非仅江充事，背后犹有李广利及刘屈氂之阴谋也。盖李广利欲立李夫人之昌邑王为太子，乃与江充阴谋，以察巫蛊案延祸于卫皇后及太子刘据。后乃为宦者郭穰所揭露。）

[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寤上意，数月得宰相，封侯。汉使往匈奴，单于问新丞相事。曰：“苟如言，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也。”

使者归告单于语，帝怒，以为辱命，欲杀之，良久，乃释之。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优于前任。]

同月，颁“罢轮台戍哀痛之诏”(轮台诏)。向全国民众表示忏悔。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又曰：“方今之务，在于励农。”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

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1]]

[征和四年武帝下轮台诏略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足置长城下，驰言：秦人，[2]我与若马。’又，汉使者久而不还(谓苏武等)。

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弘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骊山，诏之必毋深入，乃不效。及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使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戍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

①引自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②秦人，即西语 China 之源，来自匈奴语也。译音即“秦那”，“那”为匈奴语之“人”称。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励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备而已。”]

[田余庆说: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的事。汉得河西走廊以后,约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泊地区。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隐·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在西汉势力向西域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继之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后,即遵循上述程序进行活动;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遂“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①]

同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赵过改革犁耕,及耕制,教农为“代田法”。

[汪篯曰:“汉武帝时赵过改进的耦犁,可能就是大犁的一种。据《汉书·食货志》记: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古制,九夫之田为一井,三夫之田为一质,一夫为田百亩,即一顷,十二夫共耕田十二顷。古以百步为亩,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古之十二顷,当汉制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其效率相当于古之十二

①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夫,这是生产力的大提高。”]

秋八月,李广利死于匈奴。

[“卫律害贰师之宠,会匈奴单于母阏氏病。卫律赂赏胡巫进言:“得贰师以祠社,可却母病。何故不用?”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单于遂收之祠社。是岁冬,匈奴遇大风雪,会连雨雪数月,畜死,人染疾疫。单于以为广利所诅,乃为广利立祠。”]

[韩儒林论武帝对西域之开拓:

“匈奴是行国,只要使其漠南无王庭,汉人便可以高枕无忧。西域可就不同,那里是城郭国家,是匈奴的附庸和近邻;倘若汉人不屯兵防防,则匈奴铁骑一至,城廓诸国仍要倒戈相向,听匈奴的指使了。汉代参谋部要想达到凭借西域东制匈奴的目的,必须切断匈奴的右臂非在西域树立一个中心据点不可。

欲征服西域,首要问题是必须解决给养的困难,减轻国库的负担。汉家在西域载设屯田,乃是一件军事上必须贯彻的国策。

大青山、天山乃是我国古来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界,这几个山系附近的地域,如归绥、后套、宁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土鲁番等地,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自古以来,西北比较适于农耕的地域也只有这几处。所以这几个地方在我国历史上也就成了汉家和匈奴军事上必争的要点了。

这几个要点倘若落在匈奴手里,那未,不惟我国西北边陲人民不能安枕,中原人民的安全也要受严重的威胁了。反之,倘若这几个要点汉家都能守住,匈奴便不敢南向牧马,大青山下也决不会看见夜宿的毡车了。

汉代经营西域的目的既在凭西域以制匈奴,所以在河西开设四郡,肃清东西交通的大道后,便开始在西域的中央开设屯田,确立经营西域的根据地。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有渠犁、轮台、伊循、乌孙、车师等地,而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则为渠犁(吐鲁番),后来又迁移到车师。质言之,西汉经营西域,初以渠犁为中心,东向以争车师,及车师既得,即进而据之以威迫匈奴。屯田区域是自西而逐渐东移的。

按西汉国都远在东方长安,何以其在西域屯田不因近就便,自东而西,反而自西域的中央由西而东呢?我们在分别叙述西域的屯田和要害的争夺之先,不能不先解答这个问题。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下列几件事情是应该首先知道的。

(一)西域南道诸国与北道诸国之间是一片大沙漠,汉朝势力到了北道后,就把匈奴与南道诸国的交通切断。南道诸国既然孤立,他们在西域军事上的地位便无足

轻重。

(二)北道诸国的地位便不同了,他们与匈奴为近邻,离合向背能直接威胁汉人在西域的地位。所以都护郭舜说: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书·西域传》"康居"条)因此,汉朝经营西域便特别重视北路,假若不在北路设立根据地,便不能得到稳定城郭、监视匈奴的效果。

(三)远交近攻是秦汉两代对付敌国的传统政策。汉人要利用西域夹攻匈奴,当然须在北路诸国寻求与国。

迨西汉与乌孙和亲,北路诸国闻风内附之后,为实现发动城郭诸国兵卒以东制匈奴的目的,自然需要在汉与匈奴势力范围之间选择一个西域根据地。

我们翻开地图一看,这两个势力范围间的渠犁乃是最理想的地点,因为玉门关——楼兰城——渠犁是一条直线,渠犁以西都是与国,渠犁东南一千一百多里就是南北两道分歧点。楼兰对内的交通既便利,距匈奴的根据地车师又远,是最好没有的了。

(四)在关西域设立都护之前,车师以东均在匈奴日逐王手中,汉朝没有法子从敦煌进兵北攻车师。要想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自然要以凭借西域诸国的人力和物力,东向与匈奴争衡为最便了。

汉家在西域的势力既然是逐渐东进,匈奴的势力当然是逐渐东退了。当汉家势力未达到西域的时候,西域诸国本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有僮仆都尉,住在焉耆一带,征收诸国的赋税。《汉书·西域传序》说: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这个匈奴经营西域的专官,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城郭诸国悉归附长安,汉家在西域设立都护的时候,方才撤消了。

(五)匈奴经营西域的中心,是先由焉耆一带迁到车师。西汉为驱逐匈奴的势力计,自然要东争车师。匈奴为要保持他们在西域的势力和利益,当然也不甘轻易放弃。所以与匈奴争夺车师,前后竟达五次。

渠犁一作渠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曾来贡献。这个国家在今天山南麓策特尔(Chadir)及车尔楚(Charchi)之间。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说:

'(策特尔及车尔楚)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塔里木)河者,渠犁故地,北近

(天)山者,乌垒故地。'这个地方十分适于耕稼,他的农业价值,汉武帝时桑弘羊已说得很清楚:

'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

渠犁既具备这样优越的农业条件,当然可作为经营西域的根据地,所以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便选择这个地方开始置校尉屯田。

纪元前126年,张骞自西域归,汉人对西域始获得明确的知识。从此,降昆邪王,取得通西域的道路(前121年);虏楼兰国主(前108年),安定了敦煌西域间的交通;结乌孙(前105年),得到匈奴西方的与国;破大宛(前102年),威震西域。汉朝前后不过经营二十五年,便在西域获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渠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钦佩汉廷削弱匈奴的迅速及其所得效果的伟大。

西汉与匈奴王争车师的成绩,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已经明白指出了。现在我们把各次战役经过略述于后。

(1)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遣赵破奴破姑师(即车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不过当时西域还没有通,汉廷对车师尚无力控制,可以不算。

(2)天汉二年(前99年),汉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路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结果是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兵士死了十分之六七,李陵食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为匈奴发数万骑救车师,也不利引去。"此汉争车师者一,汉未得车师。"

(3)征和四年(前89年)汉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北击匈奴。莽通军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兵切断莽通的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服。尽得其民众而还。"此汉争车师者二,汉得车师。"

(4)车师是西域的门户,匈奴决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到昭帝时候,匈奴又遣四千骑田车师。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遣常惠使乌孙,乌孙连年为匈奴所侵暴,因请求汉廷发兵夹击匈奴。汉朝远交近攻的目的这时才达到了。

(汉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犁,积谷,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

这是汉与匈奴第四次争车师，车师屯田亦自此始。

(5)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元康元年)果遣骑来击屯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

诏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

第五次争夺车师的结果，只好放弃了车师的土地，尽徙其国民于渠犁，土地虽为敌占领，人力可不致资敌。

(6)这时匈奴渐弱，内部也发生了破裂，由全盛时代逐渐衰落了。匈奴方面，经营西域的是他们西边的日逐王。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先贤禅与单于有隙，想率其部下降汉，使人到渠犁向郑吉通款，这算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吉遂发渠犁、龟兹诸国兵五万人，迎日逐王，送他到京师。汉廷除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外，并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兼护南北两道，吉即择定渠犁北三百三十里的乌垒地，为都护治所，作为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从此"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

质言之，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扫荡净尽，城郭诸国完全听受安的号令了。武帝以来切断匈奴右臂的大业，到这时才由郑吉完成了，上距张骞通西域，才不过六十七年。]

后元年(公元前88年，癸巳)，69岁。

后元元年春正月，昌邑王刘髆薨，谥曰哀王。

[孝武皇帝生有六子：卫皇后生戾太子刘据，赵婕妤生孝昭帝刘弗陵。王夫人生齐怀王刘闳，孝姬生燕刺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李夫人生昌邑衣王文髆。]

6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

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反。

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光禄大夫霍光，太仆上官桀讨之，伏诛。

[初，马何罗与江充善，而马通以诛太子时有功封侯。及上灭充家，何罗兄弟惧。遂谋反。

《汉书·霍光传》记："后元年，侍中莽(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

［"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因诛太子时力战得封侯。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羽。

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

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

明旦，上未起，何罗从外入，日磾心动，立入，坐内户下。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日磾得抱何罗，围住曰：马何罗反。上惊起，擒之。"］

7月，削燕王旦三县。

是月，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因其年小母少，恐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先赐弗陵母赵婕妤死。

［《汉书·外戚传》："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清儒杭世骏以为无杀钩弋事：

"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者。考之《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从事甘泉，告上曰：'妾相运为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得为矣。愿自爱。'言终而卒。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发冢开视，惟衣履存，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是岁，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

后二年（公元前87年，甲午），70岁。

正月，朝诸侯于甘泉宫。赐宗室。

司马迁失官，后失踪（遁隐？）。①

迁遗一女，适平通侯杨敞。著《太史公记》百三十篇传世，即《史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

①说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

《后汉书·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传于后世。"

[何按:关于司马迁卒年,史无明文。

但武帝未杀司马迁,亦未禁毁其《太史公书》。疑马迁之失踪或遁隐与霍光有关。武帝死后,昭帝以幼冲之年临帝位,大政托孤于霍光,霍光是去病之弟,卫皇后、卫太子及卫青宗亲。他执政不久,即发动政变,黜夺田千秋、金日磾等托孤重臣的权力。又以勾结燕王谋反之可疑罪名逼死上官桀、桑弘羊等旧臣。霍光最终立卫太子之孙为宣帝,从而为卫氏家族全面平反。卫青生前与李广有隙。司马迁亲近李氏家族,由于为李陵辩冤而获罪,《史记》中明显贬卫霍而扬李广。所以霍光必不能容之。因此,司马光在昭帝朝的神秘隐遁或失踪,必然与霍光的柄政有直接关系。]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子长游踪"条:

"(司马迁)既座刑,乃卒述黄帝至太初,则书成时,必六十余矣。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参世家》末言参之五世孙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即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诛,而《史记田叔传》及仁死事,且云予与仁善,故述之。又《报安书》作于安下狱将论死之时。则'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

[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子长《史记》,全是愤激,杂以游戏。以'项羽本纪'列高祖之前,固为无礼,又不为惠帝立纪。至'孝武本纪',但述其神仙祷祠之事,而政令无闻焉。不过为文成、五利作一外传耳。传之后世,以为何如主?殆以此报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与孝景皇帝者,同是轻薄语。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纪。尚未有谥,故刘知几谓褚先生补作。以此传疑。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

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出，'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褚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少孙若作'武纪'，何不历叙元封以还，讫于后元，续史公论赞后，如诸传例乎？知几之言。未可为信。

班马优劣，论者互有异同。大约右马而左班。张圃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

御史大夫商丘成击卫太子有功。坐于文帝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2月，武帝病重五柞宫。

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二月已巳，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宅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命三人共协霍光辅佐太子刘弗陵。

[二月，武帝病重，诏立弗陵为皇太子，年八岁。以霍光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幼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1977年8月，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一批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上有一篇诏书。1984年整理者发表了这篇诏书的释文：[①]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嗣)，如朕曾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胥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从(终)身毋失。[②] 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③]

①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此字所见摹本或隶作"久"，不可读。当作"失"。

③木简抄写年代在"元元年"(前74年)前后。(元元年四月，昭帝死。六月，立昌邑王，旋废。七月，宣帝立。)

[何按:诏文中“胥士”,即“儒士”。我早年曾作“儒名考”,谓儒即《周礼》之胥,此简提供一佐证也。胥,或作谞。]

“这篇诏书即汉武帝临终之遗诏,是当时一个戍卒手抄,抄录不全。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

遗诏封金日磾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是武帝遗诏中应还有封霍光等为侯的内容。”]

[上官桀曾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视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外戚传》]

[“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若死矣!可立钩弋太人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时上年六十余,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御览》八十八。)]

丁卯,帝崩于五祚宫。

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3月甲申,葬武帝于茂陵。

[《晋书·禀林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二供宾客,三充山陵。汉武帝享年日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武帝身后留下三子,太子弗陵,燕王旦及广陵王济。

关于燕王旦: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

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待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画龙点睛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

公户满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所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内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

东方朔于武帝死后亦遁隐,不知所终。

[刘向《列仙传》:"东方朔者,平原厌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释为郎。

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庸人,作深沉浅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帧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武帝全盛时期,"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人,汉极盛矣"。(《地理志》)其中官奴婢约二十万口。何炳棣计算,国土面积近 700 万平方公里。

[赵翼论武帝之善用人曰:"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

或奋身死事,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禄者,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

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禄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奋之以成其气。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

其驾驭豪杰如此，直所谓条旋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怯者，则诛无赦。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赏罚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何按：刘彻有复兴华夏文化之功。《艺文志》："汉兴，承秦之败，乃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事传说，皆充秘府。"刘彻平生手不释卷，雅好辞章，诗赋俱领一时之寇。招揽文学才士，厚禄以待。《楚辞》屈赋，赖之流传。]

[在政治制度上，由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其原型多来自武帝时期所创制。]

清赵翼论秦汉以来政制之变云：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而

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

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书·贡禹传》论武帝云：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立，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人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薄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

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尊于官。

故俗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官。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司马光论汉武帝曰：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疾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守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杜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朱熹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当时已自知其罪。”

[何按：武帝为抑制贵戚、权贵、豪强、民变，推行其政令，使用酷吏及峻法治天下。《韩非子》：“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

武帝治国，阳儒阴法，以儒典为文饰，政术所行乃法家之道也。

汉初约法省刑，元光元朔间，张汤为太中大夫时，受命与中大夫赵禹论定律令，恢复了汉初曾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增设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条令苛密，汉法从此严酷化。《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断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

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以法治国，视法度高于一切，不仅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实践上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司马光指出，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才大抵多酷暴。”

贡禹评论武帝时政云：

“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敢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酷吏搏击诸侯王、豪族强宗、富商大贾、不法官吏。如义纵任长陵和长安令，行治不避贵戚，曾惩处王太后的外孙修成君子。迁为河内都尉，族灭豪强穰氏。杜周任南阳太守，即捕县官后家居而横行郡中的宁成；南阳豪强孔氏、暴氏因此逃窜。周阳由治郡必灭豪强，尹齐斩伐不避贵势。凡治诸侯王狱，武帝多委任酷吏，如张汤、咸宣治淮南狱。御史也多以酷吏担任，所以刺史六条所察的对象，也就是酷吏所搏击的对象。二是“督盗贼”，就是镇压吏民暴动、起义。如当“郡国盗贼并起”，武帝迁“以杀伐为治”的田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明倩起义，田广明觉知，发兵捕斩，血腥镇压。

[《汉书·酷吏传》，武帝朝酷吏九人，即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广明，以及张汤、杜周计十一。其中最著名者为张汤、王温舒、杜周、宁成等。]

[张汤出身长安史，曾为宁成掾，田蚡征为丞相史，又由于田蚡的推荐，补侍御史。

元光五年，武帝命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大事株连，杀三百余人。迁为太中大夫。元朔三年(前126)，武帝重用张汤为廷尉。

[汤见武帝好文学，就用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

张汤内修私德，居官廉洁，又善处理同僚关系，调护故人子弟及穷兄弟，造谒诸公不避寒暑。

元朔三年(前126)，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责斥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导天下的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出空，为什么要乱改高皇帝的法度？我看你从此要灭种了！”张汤巧言善辩，汲黯辩论不过，怒不可遏，骂：“天下人都说刀

笔吏不可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这个张汤,要弄得天下人心怀惧,仄目而视!”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又因张汤治淮南、衡山两狱有功,进一步提升他为御史大夫。自此以后,“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

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时,打击“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郡中无犬吠之盗”。元狩三年(前120)迁为中尉。

元封二年(前109),杜周继王温舒为廷尉。杜周概以武帝意向治狱,从不依法,凡武帝想打击的,就罗织以罪,武帝想开释的,就拖延审理,一点一点地显示他的“冤状”。宾客问杜周:“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答:“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公孙弘曾对汉武帝谈论宁成,说:“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武帝用宁成为函谷关都尉。吏民出入关者皆畏之,云:“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何按:武帝一朝削平了困扰文景时代的同姓王问题,极大地加强了君权。但其结果,却使得皇帝孤立,失去了外部的屏藩,导致士人阶层及行政官僚集团的权力强大。皇帝不得不依靠外家即舅氏通过控制军权屏藩王室,又不得不加强宦官的权力(此武帝晚年的办法),即以内朝去监督和控制外朝行政官僚,又以酷吏去监督内外臣官僚。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矛盾(最激烈者即演为东汉党锢之祸),遂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一代常困扰以至汉朝亡国的根本政治问题。]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曾说:“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帝者极多。”其略述曰:

“一、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帝王有年号始此;

二、是年诏郡国举贤良方正进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擢广川董仲舒为第一。科举之法始此;

三、仲舒请不在《六世》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议立明堂,遣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迎鲁申公。专用儒家始此;

四、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征匈奴始此;

五、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信之。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之黄金矣。方士求仙始此;

六、是年女巫楚服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诛楚服等三百余人,废

皇后陈氏。巫蛊始此,废后亦始此;

七、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置苍海郡。开朝鲜始此;

八、是年诏吏通一《艺》以上者,皆选择以补右职,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始此;

九、六年,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藏罪,置赏官,名曰开功爵。级十七,各有定价。卖官始此;

十、南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以叛。秋,将军路博德等讨南越,斩吕嘉,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开南蛮始于秦,今再复之;

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叛汉,自称武帝。将军杨仆击东越,斩余善,遂徙其民于江淮间,其地遂虚。开闽越始此;

十一、元封元年,春正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禅泰山下东北肃然山。封禅始此;

十二、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皆始此。

是中国之政治于汉武者,凡一十二事。"]

[何按:夏说遗漏设中书以内官参决机要,[1]设十三部刺史建立地方官吏监察制度,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铸五铢钱、以马蹄金改革币制统一金融,租及六畜、告缗(征财产税)等;以及由汉初节约自持,优礼宰相,垂拱无为的政治,演变为扩张皇权,收揽一切权力于君主的"大有为"政治。]

[汉武帝很重视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的作用。元狩元年(前122年)平定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后,兴起大狱,为了表示与民"更始",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后三年又派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即冬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又后三年即元狩六年,又派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举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元鼎二年(前115年)江南水灾,又派遣博士"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汉书·武帝纪》)。从元鼎四年起,武帝就多次亲自大规模出行,也或称为"巡狩"。当他一开始出巡,就发现郡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有的太守因此自杀,有的太守因此被诛。《史记·平准书》载:

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

---

①史称"武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后汉书·宦者列传》)

卒(仓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

既然太守这样失职,监郡的御史又不举发,要天子亲自出巡方才知道,说明监御史形同虚设,所以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就废去监郡御史。大典本《汉旧仪》说:"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到元封五年,就创设十三部刺史,这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郡国的监察工作。

刺史制度有下列五个特点:

第一,刺史为中央派遣常驻在监察区的监察官,设置固定治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

第二,刺史隶属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纯为监察官性质,对于所监察的郡守等二千石地方官,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相关的利害关系,做到了《商君书·禁使篇》所说"监"与"官"的"别其势",权势各自独立而分开,便于发挥监督和检举的作用。

第三,刺史只是监察而不是行政长官,它和秦代有兵权、人事权的监御史不同,而且刺史有规定的监察范围。

第四,刺史秩卑、权重、赏厚,使便于监督察,乐于劾举。

第五,刺史定期巡行所部郡国,叫"行部"。通过"行部"可以考察守、相治迹,广泛接触吏民,了解下情,因而对守、相的劾举,往往有事实依据,可以击中要害。

设置刺史确是当时比较有效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在创设刺史之后十七年,又设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本为督捕诛杀巫蛊而设,后来就督察三辅、三河、弘农,成为类似刺史的官职。武帝也还为临时发生的天灾或事件,派出使者"巡行天下",先后有四次之多。此后长期沿用这种制度。这种临时派遣的使者所担负的任务,多数属于慰问救济性质,所谓"存问致赐";或者附带督察吏治,选拔人才,所谓"举贤良"、"举茂材异伦之士"、"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等等;或者着重平反冤狱,例如五凤四年(前54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帝纪》)。鸿嘉元年(前20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汉书·成帝纪》)。这些平反冤狱的使者就带有监察性质。]

[武帝之孙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武帝所行之政术,外儒内法。所谓王道,即董仲舒所说"孔子主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王道,即国家

主义。诸子皆私学，而儒学乃王道也。霸道，法令权术也。]

贺昌群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为儒家思想，实际上则为儒道法三家所综汇。

儒家之王道，道家之无为，法家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中国古来第一流的政治家，莫不兼有这三种精神。如果缺少一种，或偏重一种，未有不失败的。

[何按：武帝以酷吏行苛法重点打击宗王外戚显贵，又外施仁义而杂用王霸，改革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由汉初崇尚黄老，尊儒兴学，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全面崇兴学术文化。以经过改造的今文经学为主导思想，并延用法家集中权力的国家主义；遂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国宗法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古精绝国)遗址出土武帝时代武士织绵吉祥护臂，织绣凤凰、鸵鸟、獬豸、白虎、四灵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语。盖汉初以五星聚于东井为吉祥也。

毛泽东论汉武帝谓：“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①]

咏汉武帝

[清]王昙

一

祖龙而后得驱除，　千古雄才断不如。
一统早收南越地，　六经始重圣人书。
求言帝度容方朔，　问道儒公用仲舒。
五十四年文治日，　天山犁得幕庭虚。

二

求贤初诏下金门，　一榜贤良百十人，

①毛泽东1957年6月17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容得马迁留谤史，　　育成苏武做忠臣。
张汤峻法刑名好，　　汲黯狂言戆谏真。
明说才赋无大用，　　邹阳枚马任沉论。[1]

三

西域流沙古未开，　　氂牛边堠接轮台。
扫空瀚海长城外，　　断得匈奴右臂来。
和议终非中国计，　　雄兵方逞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　　难得英雄靖九垓。

四

壶关一悔奈匆匆，　　思子归来仅有宫。
名将不曾封李广，　　用才毕竟误江充。
神仙大药无消息，　　方士招魂亦凿空。
不有茂陵遗恨事，　　怎教后人泣秋风。

2002年3月初稿
2002年6月第四稿补于上海
2004年7月第九稿于北京
2004年10月改定于沪上云水山庄

①枚，枚皋。马，司马相如。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NEW STAR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风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雄·汉武大帝新传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